

炎黄春秋

第 **11** 期
2014年

高清杂志网
WWW.GJZZW.COM

社会转型与反腐对策笔谈

林彪“散记”中对毛泽东的思考

张闻天夫人谈外交部的人和事

有关大饥荒的新谬说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

目 录

一家言

社会转型与反腐对策笔谈

- 1 转型国家反腐任重道远 尹保云
- 3 各级人大要让贪官闻之丧胆 蒋劲松
- 5 韩国的腐败与法治 詹小洪

沉思录

- 8 有关大饥荒的新谬说
——从四川官方数据看“营养性死亡”250万人的荒谬性··· 洪振快
- 18 周永康案的反思与建言 崔 敏

亲历记

- 21 刘英谈外交部的人和事 何 方
- 29 “休闲江青”与“毒药事件”
..... 周淑英、赵柳恩 口述 阎长贵、李宇锋 整理
- 38 文革中我与枪的五种关系 丁学良
- 45 随卫毛主席江青 华方治

往事录

- 47 林彪“散记”中对毛泽东的思考 李根清
- 54 计划经济时代的“黑孩”问题 杨支柱
- 56 阳江“乱打乱杀事件”始末 陈宝德 李学超
- 58 熊大缜冤案平反经过 王端阳

求实篇

- 60 马骞的检举信与七千人大会 董忠义
- 64 地下党“不能承认党员身份”的纪律 孙丹年
- 68 红军指导员李传书之死 胡发云

品书斋

- 72 《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读后 李玉贞
- 79 普京时代对斯大林的评价 马龙閃

故纸堆

- 84 富田事变时刘敌给中央的信 景玉川

海外事

- 89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 陆南泉

顾问

杜润生 李 锐

本刊创始人、名誉社长：杜导正

编委会(以姓氏笔画为序)

方 实	王俊义	冯 健	冯其庸	卢跃刚
曲润海	何 方	吴 象	吴明瑜	宋木文
张文彬	张岂之	张希清	张荣华	张惠卿
杜 光	杜导正(召集人)	李大同	李冰封	李冰封
李步云	李宝光	李维民	杨天石	杨奎松
杨继绳(副召集人)	沈志华	苏双碧	陈 敏	赵德润
邵燕祥	周瑞金	金冲及	胡德华	凌 云
保育钧	钟沛璋	郭道晖	袁 鹰	袁伟时
展 江	徐小岩	秦 晖	钱理群	章诒和
高 放	高尚全	陶斯亮	曾彦修	鲁 諲
萧蔚彬	韩 钢	董 健		
雷 颐	魏久明			

社 委 会 杜导正(主任) 吴 思(副主任) 杨继绳
李 晨 徐庆全 胡竞成 张晓鸥

社 长 杜导正

法定代表人 常务社长 吴 思

副 社 长 杨继绳 李 晨

社长助理 胡竞成 张晓鸥 杜明明

总 编 辑 吴 思

副总编辑 徐庆全

执行主编 洪振快 黄 钟

总 经 理 李 晨

副总经理兼网络总监 张晓鸥

财务总监 胡竞成

发 行 部 孔 屏(主任)

办 公 室 王海印(主任)

理 事 长 杜导正

副理事长 莊其環 李 琼

秘 书 长 吴 思

副秘书长 杜明明

主管主办单位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本刊常年法律顾问

张思之(吴栾赵阁律师事务所010-68083211)

步凌云(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010-85869163)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100045

网 址 http://www.yhcqw.com

编辑部邮箱 yanhcq@sina.com

yanhcq@gmail.com

发行部邮箱 yhcqfxb01@126.com

电 话 发行部 010-68532048

编辑部 010-68534879

68523512

68539058

财务部 010-68525374

办公室 010-68522852(兼传真)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0296号

印 刷 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单本定价 10元 全年定价 120元

转型国家反腐任重道远

○ 尹保云

反腐败历代都搞,从封建社会到现在的民主国家都要反腐败。中国目前反腐任务艰巨、道路漫长,我觉得应该从3个方面来认识:

大正明公

一九七三年五月十六日
大总统 朴正熙

第一,经济体制问题。

一般说来,私有化比较彻底、市场经济比较规范的国家,反腐败就比较容易。日本、韩国、新加坡及中国台湾、香港都是如此。相反,国营企业和国有资产多的“混合模式”,反腐败就比较困难,印度及东南亚很多国家都是这种情况。智利是拉美地区私有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不仅在经济上后来居上,廉洁度排名也远远高于拉美其他国家。在欧共体众多国家中,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希腊等国有企业比重较大,它们在欧共体中不仅经济排在后面,廉洁度也在低档。意大利二战后一直在发展国有企业,导致国企在很多领域的垄断达100%;希腊国有企业在90年代占国民总产值的比重高达50%。这两个国家的廉洁指数排名在欧共体中最低。

国有部门过大的“混合模式”,市场经济就难以规范化,法律体系常被人为扭曲,国有企业与资产多了,官员的权力范围就大,滋生腐败的土壤就广阔。我国在这方面的问题是比较突出的,除了政府对各个行业包括教育、文化产业的广泛垄断和控制外,还有产权不清的土地所有制。要在这样一个经济体制的平台上彻底清除腐败,的确很难。

第二,民主制度建设。

中央现在正在酝酿“法治”建设。“法治”的内涵不光是指依法治国、加强法律建设、利用法律管理等内容,真正的“法治”还包括民主制度,有民主选举、分权制约、言论自由等民主的形式要素。所以,不能把“法治”简单地理解为“法律治

理”(rule of law),而应该理解为“按照宪法和法律治理”。要建立一个廉洁社会,政治体系的变革至关重要,它需要现代化,要形成相互监督的、透明的和大众

参与的机制。有人经常以印度为例来贬低民主制度,说它对于反腐败没有作用。其实,印度只是“初步民主”,搞了半个多世纪,它目前的水平还低于中国台湾,再加上它的国有部门很大,一个初步民主自然起不到反腐作用。从世界范围看,只有在民主成熟后,它才能起到约束腐败的重要作用。而建设民主政治,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却是十分困难的。

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联系在一起:国有企业和资产减少了,建立起规范的市场经济,政府的权力范围缩得很小,腐败土壤就减少;再加上民主法治的建立,使各级权力得到有效监督、各项法律公正执行、经济透明度高,这两个条件的配合,就能慢慢培养出“廉洁文化”,整个社会的道德和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美国等西方国家较高地达到了这种境界;日本、韩国也达到了;中国台湾可能比韩国略差一点,但也不错。

第三,对打击腐败常态化的认识。

中国历代皇帝都打击腐败。孟德斯鸠曾指出:中国的皇帝之所以不断地反腐败,那是因为中国人口多、生存压力大,不打击腐败政权就难保,但这样一来,政治制度就难免变得越来越“凶暴”。撇开孟德斯鸠对制度的看法不论,单就反腐败而言,应该说“凶暴”是正常的,现代民主国家的反腐同样是凶暴的而且是常态化的,一个小小的贿赂就会让一个人失去职位甚至锒铛入狱,而在封建社会制度下,反倒没有这么“凶暴”,因为它制度松懈并缺乏现代技术条件,没有能力管到很小的问题。

向民主制度过渡的“威权体制”，它虽有宪政框架，但民主不太充分和成熟，所以，反腐败更多地依靠廉洁领导人的作为。新加坡的特点是国营企业比较少，外资企业比较多，并且它国家规模小、人口少，靠领导人强力推行反腐就能达到很好的效果。韩国及中国台湾就要相对困难一些，因为它们的人口规模相对较大。

在威权时期，朴正熙和蒋经国都是铁腕反腐败的。有些人喜欢夸大韩国威权时期的腐败，其实它并不严重。卢泰愚和韩国第三大财团SK集团的总裁是连襟，不需要个人发财。全斗焕在90年代审判中被揭露出一大批“黑钱”，那是他的执政党募捐的“政治资金”。募捐是合法的，由党的专门机构管理，只是在他下台后没有及时移交，但谁也没敢动用，因此也很难定为贪污罪。至于朴正熙，清廉和铁腕反腐是他的突出特点。他能铁腕反腐，一方面决定于他的个人品格，另一方面也受到宪政制度的支撑。韩国在“威权体制”下政党竞争很激烈，这是反腐常态化的重要机制。反对党紧紧盯着执政党的官员，时刻想抓执政党的腐败劣迹，执政党也是同样，这就使反腐常态化了。朴正熙不像人们说的那么“独裁”，反对党议员在国会中敢指着鼻子责问他，选举的时候专门找他的腐败问题，他之所以几次竞选总统胜利，是因为人们找不到他的任何腐败。反对党的监督，也是对朴正熙铁腕反腐的支持。没有反对党的压力，反腐就难以坚决彻底，很难反自己的手下和亲近人的腐败。中、韩的有些学者常把韩国“威权体制”和中国体制看作一回事，这是不严肃的。中国改来改去，目前还没有脱离苏联模式的政治框架，而韩国则是在宪政制度下，不是一码事。

台湾地区的“威权体制”要比韩国落后一些，它在《戒严法》下实行党禁，选举只是在县以下搞。因此，反腐更加依赖政治领导人的作为。台湾的经济制度的平台和韩国一样，除了大山、河流、湖泊等之外，土地都私有化了，各级政府搞卖



朴正熙

地财政的余地很小；台湾地区的经济自由度比韩国还高，同时，台湾地区的出版社、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文化产业的管理也遵循着现代国家的一般规范，它们都是民间企业，政府机构不可创办，政党也无权干涉，只按照法律规定管理，这样的一些条件，使官员搞腐败的机会很少。当然，政府还有其他各种权力，台湾反腐任务也很重。在这方面，蒋经国的意志和铁腕胜于朴正熙。他在人们心中树立了一个“圣贤”形象，作风清廉，生活简朴，他居住的二层小楼规模都很小，陈设极其简陋，他的卧室只有十几平方米，一张和医院病床样大小的单人床，他从晚年到去世都睡在这张床上。这些品格决定了他对腐败的极度厌恶。蒋介石活着的时候他就负责反腐，他只要听说某个官员一点儿不好的口碑，这个官员就别再想升迁。他利用这样的铁腕手段，维持了政府机构的廉洁和效率。

对以上3个方面问题的思考，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目前反腐的艰巨性。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领导的反腐败在力度上和广度上均前所未有。我认为这是很好的开端，感到高兴。反腐巩固了中央的权力中心，加强了权力集中，这并非不是好事。没有强大的权力中心，深化改革就推不动。即使是搞民主也要有强大的力量来保证不发生社会崩溃，从而使政治家、官员和普通民众在民主框架下得到慢慢的训练和适应。事实说明，十八大以来，一边强力反腐，一边倡导二十四字核心价值观，不仅很大地改善了官场风气，也对社会精神的变化产生积极影响。

另一方面，任务艰巨、路途遥远。前面说明，建立廉洁社会，除了强力打击腐败外，还需要规范市场经济的平台和法治建设。这就需要坚定不移地深化经济和政治的改革，朝着现代性方向变化，而这又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作者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黄 钟）

各级人大要让贪官闻之丧胆

○ 蒋劲松

一年多以来反腐败成效显著,值得肯定。目前反腐败如果说还有不足的话,主要是腐败只由党反。在官员的眼里,他们害怕的老虎就一个:中纪委。人大在腐败官员的眼里像是黔之驴,熟了根本不怕。

腐败要从两方面来治,在党治之外,要强调法治。一定要在腐败官员心里树立两个老虎:一个是纪委,一个是人大,这是今后的方向。

宪法在治腐败方面和其他法律相比,应起带头、表率的作用。不少国家的宪法做得比较好,最早有美国宪法,其第2条第4款规定了总统和他以下的官员,如果有哪些罪行的话,就由国会弹劾,其中一个就是贿赂。这是可以直接适用的法律。众议院不需要翻刑法或者其他下位法律相关的规定,只需要依据宪法第2条第4款就可对他进行弹劾,这是宪法明确治理腐败的条文,可以直接适用。

其他后起国家宪法治理腐败方面比美国宪法走得更远,做得更好。

一个是巴西宪法。巴西宪法第2章第3节专门规定:共和国总统应负责任的行为。有7种行为中的任何一种就要受到追究,其中一个就是违反预算。总统违反预算的行为,由宪法定名为违宪罪。违宪罪的后果是由国会众议院提起弹劾,参议院审判。

还有一些当代新兴的国家,比如肯尼亚,它们的宪法高度重视治理腐败,专门有一章或者一节规定领导人行为规范。

我记得国内前些年热议巨额财产来历不明问题。人家是用宪法直接来治,治的

措施有两个:一是就职之前要做财产宣告,比如我2014年当总统,就任之前个人合法财产有5万美元,向世界人民宣告就这么多钱。卸任之际接受审计,查你的财产有多少,如果查出有5000万,就是巨额财产来历不明。所以宪法在官员入口上设一个关卡,要求你公布自己的财产。宪法设定了行为规范,照这个规范去做基本上就能把控,就不大可能出现巨贪、巨腐。

你当官了,行使职权,用官职的名义到处活动,这些活动要遵守哪些行为规范,宪法有直接规定。比方说出访人家非要送礼物和礼金,或者在国内人家非要送贵重的礼品和礼金,你该如何处理等等。该如何认识礼品的性质,宪法有规定:送你这些礼品是对你这个国家的尊重,要这么认识,接下来你就知道应该要上缴,不能自己留下来。

肯尼亚宪法从第73条到第80条,是专门治理腐败的。据我所知,像肯尼亚宪法专门一章规定领导人行为规范和防止腐败的,还有四五个国家。

再谈选举法。因为有宪法的严格规定,选举法就可以有理有据,有相应的规定。比如接受候选人提名后,会让你填报一些材料,有些是个人

情况,如个人财产,或者是过去有没有比较良好的个人声望等等,选民和选举管理机构要从严审查。如果发现过去有劣迹,在候选人这个环节就淘汰掉。众目睽睽之下,难以蒙混过关。所以,在高官的位置上大肆腐败,就不可能了,这是选举法在入口上的把关责任。要说法律如何治理腐败,选举法在入口把关的角色很重要。接下来是上了台的官员腐败如何治,任务量就减轻了,这

案例1:证券交易委员会某雇员及其配偶收到一家被监管的公司的代表的邀请去看百老汇的演出,每张戏票的票面价值为30美元。此次提供的礼物的市场价值总计为60美元,比每次只能接受20美元的礼物的规定超过了40美元。雇员不可以接受这场作为礼物的娱乐活动,除非他支付60美元,他和他的配偶才能去观看演出。

案例2:国防制图局某雇员受制图者协会的邀请就该机构在导弹技术发展过程中的角色发表演讲。在他演讲结束时,该协会赠送给他一个价值18美元的装框的地图和一本价值15美元的关于制图历史的书。该雇员可以接受地图或书,但不可以都获得,因为两个实物的总价值超过了20美元。

摘自美国《行政部门雇员道德行为准则》。该《准则》规定:雇员每次可以从一个来源接受非索取的、总的市场价值不超过20美元的礼物,但是从任何一个人获得的单项礼物的总的市场价值每

第73条 领导责任

- (1) 分配给国家官员的权力——
- (a) 为公共信托，其行使方式应当——
- 符合本宪法的宗旨与目的；
 - 表明对人民的尊重；
 - 为国家带来荣誉，为职位带来尊重；以及
 - 促进公众对职位廉正的信心；以及
- (b) 授予国家官员，其责任在于服务于人民，而非以权力来管制人民。
- (2) 领导与廉正的指导原则包括——
- (a) 基于个人廉正、能力与合适性之上的选拔，或者基于自由与公平的选举；
- (b) 客观与公正地作出决定，确保决定免受偏袒、偏见、其他不正当的动机或者腐败活动的影响；
- (c) 基于公共利益而无私服务，表现在——
- 恪尽职守；以及
 - 说明其与公共职责可能相冲突时的个人利益；
 - 以其决定与行为向公众负责；以及
 - 在服务人民时遵守纪律与承诺。

第74条 国家公职宣誓

在成为国家官员或者履行公职之前，任何人都应当按照本宪法附件3或者国会法律规定的方式和形式进行职位宣誓。

第75条 国家官员的行为

- (1) 无论在公共与官方生活、私人生活中，还是在与他人协作时，国家官员应当避免——
- 个人利益与公共或者官方责任的冲突；
 - 损害公共或官方利益而追求个人利益；或者

(c) 贬低其担任的职位。

(2) 任何违反第(1)款，或者第76条、第77条或者第78条的人——

- 应当受到相关部门的纪律惩戒；以及
- 依据(a)项规定的纪律惩戒程序开除或者以其他方式免除其职务。

(3) 因违反第(2)款规定的条款而被开除或者以其他方式免职的人，丧失任职于其他国家职务的资格。

第76条 国家官员的廉洁

(1) 国家官员在公共或者官方场合收到的礼物或者赠礼为赠送共和国的礼物与赠礼，除非国会法律另有规定，否则都应当上缴国家。

(2) 国家官员不得——

- 除国会法律另有规定外在肯尼亚外有银行存款；或者
- 在损害国家官员廉洁的情形下寻求或者接受个人借贷或者利益。

第77条 国家官员行为的限制

- 全职国家官员不得从事其他任何带薪职业。
- 被任命的国家官员不得担任任何政党职务。
- 在公共财政领取退休金的退休国家官员不得在下列机构中作为主席、董事或者雇员而同时担任两种以上的带薪职位——

- 国有公司或者国家控股公司；或者
- 国家机关。

(4) 除了第(3)款规定的情形外，退休国家官员不得从公共财政中获得报酬。

现行肯尼亚共和国宪法第六章部分条款

样的人就少多了。

预算做得好的话，各个部门、各个官员一年可以花哪些钱，规定得死死的。而且预算又是法律，一旦制定颁布，就照预算执行。所以预算是治理腐败的常规武器，专门治官员滥用官职、挥霍公款的行为。

从国外的经验来看，现代的反腐败和过去的反腐败本质的区别有两点。一个是反腐败的主体到底是谁。二是依据什么规范反腐败，法律依据在哪儿。就是这两点，将过去时代的反腐败和现在的反腐败区别开来。

过去反腐败是君主本人对反腐败的态度如何，如果宽容，睁只眼闭只眼，言官再怎么想反腐败也推行不开。现在有很多国家机关要承担反腐败的责任，比如新加坡的贪污调查局，专职的反腐败机关义不容辞。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个国家机关承担着首当其冲的职责：代议机关。代议机关的重要性在哪儿？由它带头来反国家元首政府成员这样最高级别的官的腐败。最高级别官的腐败活动控制住了、遏制住了，其他机关的反腐败的任务减轻了很多，也好做了很多。如果代议机关顶不住、治不了，那在法治条件不太健全的国家、地方，刑事机构、专职机构彻底反腐败很难做。过去反腐败的依据主要是刑法。现代反腐败当然也用刑法，但在刑法之前还有宪法、选举法和预算，而且首先要用这三种法律。

就我国的反腐败来说，国外的两个经验直接搬过来用还很困难。

一是我国宪法与其他很多国家的宪法效力不一样。我们的主流观点是我国的宪法不可以直接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是这么看的，宪法学者一般也都这么看。宪法不被当作判案的依据，得下面刑事法律做了相应规定后，法官才可以引用刑法作为判案依据，这是我们宪法的尴尬，叫法但不可以直接适用。这样尴尬的状况造成宪法不可以直接治腐败。

二是选举法、预算还缺乏反腐败的意识，选举法、预算在治理腐败方面失职了。因为立法机关没有这样的认识，所以直接适用选举法和预算治理腐败，操作起来很困难。

三是领导党与国家的反腐败的关系没有理顺。中国的反腐败跟其他国家反腐败，要说最大的区别就在这一点。我们实行党管干部。在这样的制度下，官员做了坏事、腐败了，主流观点是党能管，但人大不能管。所以目前为止，党和国家在反腐败方面是这么个关系，这是不顺的，不符合民主制度要求的。

以后该怎么做？我有几个建议：一是需要抓准我国反腐败的根本命题。我们的根本命题是领导党制度下如何理顺党委反腐败与法律反腐败二者的关系。没有意识到这个根本命题，绕开它谈治理腐败，恐怕就做不到腐败法治。

观念上还要努力地灌输宪法是可以直接适用的法律。做这个事需要很长时间，需要多少年才能见效不好说，但这是该做的一件事。

二是要理顺领导党与国家的反腐败关系。有些关系已经理得比较顺。比如党委对党内领导干部先行审查，检察机关接下来办以后的事，这个关系已经很顺了。没有理顺的是党委治理腐败与人大治理腐败的关系。我们要承认党管干部的原则，同时要充分认识宪法规定的人大制政体：一府两院的组成人员对人大负责是基本原则。政府、法院、检察院的组成人员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我们要把这个宪法原则认识透，用透。正确的做法是党委、人大治腐败相互分工，两者并列。党委治专门

韩国的腐败与法治

○ 詹小洪

一、韩国大概算得上中等腐败的国家

反腐败国际非政府机构——国际透明性机构自从1995年开始,每年都会发布按国家排列的“国际透明性机构腐败认识指数”。以10分为满分,数值越趋近于零,排名越靠后,就说明越腐败;数值越高,排名越靠前,表明越廉洁。4分以下表明整个社会都很腐败,而7分以上则说明整体上比较廉洁。

多年来,韩国总体上处于4~7分,排名多在40~50位,属于中等程度腐败国家。而且有朝廉洁国家发展的趋势。得分逐渐提高,排名趋于靠前。如果说在全球排名中,韩国腐败指数还算

中等的话,那么在富国俱乐部,即在经合组织(OECD)26个成员国中,就算腐败程度相对很高的国家了。在能够得到的几年资料中,韩国都处在22~24位。就是在韩国得分最高的2008年的腐败指数中,韩国为5.6分,也不及经合组织平均得分的7.11分。2008年,新加坡9.2分(第4位)、中国香港8.1分(第12位)、日本7.3分(第18位)、中国台湾5.7分(第39位)。

二、韩国腐败的表现

1. 为选举募集政治资金。

韩国政界选举很多:总统大选、国会议员选举、市和道(相当于中国的省)地方首长选举、地

在党内任职官员的腐败行为;凡是人大选举产生的官员有腐败行为,由人大来治。

党委治腐败,主要运用党纪、党规。人大治理腐败,就要用另外一套规范,即宪法、选举法、预算,还有组织法等法律。这样的法律如果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语境来说,可以把它们组成的法律部门叫作代议法,专门规定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力职责。所以人大治理腐败的根据是代议法,党委治理腐败的根据是党章、党规。这是党委治腐败与人大治腐败的基本分别。

代议法里我认为有三个法律要马上行动起来:一个是选举法。应该制定一个统一的、长期实行的国家机关领导人产生办法的法律,这个法律除了规定谁有权选举产生哪个级别国家领导人之外,还有一个明确意识,即选举产生国家领导人的过程就是治理腐败的开端,要按照这样的意识制定长期有效的国家机关领导人选举法。

另外是预算。预算应该把水分挤得干干净净,每给你一分钱,都要用在指定的工作上,挪用了,工作没有做好,马上暴露,人大、审计等机关

就要来查,但我们现在没有做到这一点。这是以后预算要完成的任务。

第三是监督法,里面规定了7种监督程序,但因为以前彭真委员长说人大不管人事监督,所以监督法上的7种监督程序没有一种用来治理腐败。不过,第7、8、9届全国人大的15年里曾有一些努力,人大监督工作有一部分内容就是要监督官员,监督他们行使职权的行为,包括有没有腐败行为。现在虽然监督程序齐全,反倒没有一种用来治理腐败,这是错的。其中,质询程序、预算执行监督程序等都是完全可以而且应该用来治理腐败的。用好这些程序后,不至于面对贪官污吏无能为力,人大有办法有工作方式治理腐败。这是用现成程序的问题,不需要再修改了。

这是我对以后反腐败该怎么改的想法。总之是一句话,我国反腐败的改进方向是多用代议法治理腐败,使人大成为腐败官员畏惧的第二个老虎。■

(作者为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黄 钟)



全斗焕(右)和卢泰愚在法庭上

方议员选举等等。选举就要有各种费用,而且费用高昂并逐年升高。募集多种多样的选举资金就成了韩国腐败的一个直接动因。企业为政界选举提供非法政治资金是最典型、影响最大也最为国民所痛恨的腐败。

虽然韩国的《政治资金法》规定,国家财政要为参选的党派及候选人提供一定的选举费用,公营的媒体要为他们刊登一定数量的竞选广告,目的也是防止他们向企业伸手要钱。但是财政给的钱根本满足不了竞选人的需要。第十六届总统选举时,大国家党候选人李会昌的幕僚崔某收受SK财团100亿韩元非法资金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2002年总统大选动员时,大国家党的选情看好,极有可能上台,该党选举对策委员会就向SK财团提出了赞助要求,SK财团就派人将100亿韩元分装在多个购物袋中,分几次用汽车送到崔的私人停车场。

韩国之所以不断发生企业向政界行贿,在于企业从未放弃过利用政治献金轻易获利的想法。因为收受了企业献金的党派的候选人上台后肯定会“投桃报李”,一般是通过政府隶属机构或金融机构给予企业优惠贷款和减免税务方式报答。2000年议会选举时,现代峨山集团支援

给执政的民主党的资金为200亿韩元(检方仅查出的部分),和同年南北方首脑会谈之际替政府向朝鲜秘密汇款5亿美元。以此为代价,现代峨山集团从政府得到的回报可谓丰厚:高达33万亿韩元直接和间接的金融支援即优惠的贷款。这一切均是由于东窗事发后,现代峨山公司董事长郑梦宪的自杀,由于检方的介入才真相大白的。韩国企业提供非法政治资金有时是不得已,但韩国政企在腐败问题上谁是主犯谁是从犯是很难说清的,公众也很难判断政界和企业谁更腐败。

应该说,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在总统选举或议会选举时收受的企业献金一般都还是作为政党经费使用,毕竟绝大多数资金还没进入个人腰包,属于集体腐败。

2. 官手党现象。

官手党的意思是,政府高官退休以后或者被总统空降到国有企业去当董事长、总经理,或者是被民营企业招募到自己旗下,安排在重要的位置上。官手党是韩国社会深恶痛绝的现象。

3. 用人注重血缘、地缘、乡缘、学缘。

韩国实行政治民主化以来,共选举产生了7届总统,其中有6个来自庆北地区。韩国3所最著名的大学,即汉城大学、高丽大学、延世大学。毕业后在事业上,校友之间互相帮衬、互相提携。还有每届总统选举后,有大批的幕僚班子,总统当选了就论功行赏,幕僚出现了很多腐败现象,例如:李明博上台后,所任命的青瓦台首席秘书官们和各部部长多有“高所望”背景(指高丽大学、所望教会、岭南出身的人)。

归纳韩国媒体的看法,韩国腐败的根源在于下列原因。

首先,韩国一直实行的是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在民主化以前的年代,大至制定国家产业政策,小至企业的外汇、银行贷款、海外投资、原材料供应,政府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国内有研究韩国问题的学者说,韩国的大企业的董事长实际上是政府,业主只是扮演了管理者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的政治情结很浓,摆脱不了依附权贵最后自己成了权贵的角色。十几年来民主化并没使情况有根本的改观,企业对政府的依赖,企业家向政界靠拢、“商而优则仕”的现象仍不少见。

其次,韩国有贪渎文化的土壤。不管哪个政府部门都有贪污的公务员,连司法、警察、监察部门也不例外。2003年,韩国反腐败委员会进行的一个民调显示,58%的受访者认为“公务员腐败”,其中最腐败的部门依次是:建筑75%、税务61%、法律事务57%、警察55%、国防及兵役48%。在2002年反腐败委员会发表的《2001年71个公共机构清廉度》报告中,排在第71名的竟是中央检察厅。

三、韩国政府的反腐

应该说,韩国政府及社会防止腐败措施是严格且完备的。

1. 严格的议员听证制度。

自从2000年起,韩国实行了对任命部长以上的官员先要进行由国会议员听证的制度,即国会议员们要对候选人就纳税、兵役、房地产投机乃至论文发表有无作弊行为诸问题,进行极其严苛的答辩听证。很多候选人通不过听证关而不能上任。近年更甚的是,有不少候选人畏惧听证,自动放弃部长或者总理候选人的资格。

2. 反腐败机构的建立。

2002年2月,建立了直属于总统府的反腐败委员会。

2004年,在反腐败委员会下面另设“高级公务员腐败调查处”,专司调查总统亲属、国会议员、高级检察官、大法官和国家情报院高级官员的贪腐情况。

2004年底,反腐败委员会改名为“国家清廉委员会”,每年颁布“韩国社会清廉指数”。

3. 反腐败措施。

从1993年起,韩国开始实行公务员财产公示制度。由公务员伦理委员会负责监督公布。每逢公务员的财产比上年有明显增加或者反常增加,就会引起公务员伦理委员会高度关注。会要求当事人就财产剧增原因在20天内提交书面解释及凭据材料。如逾期不配合,要被罚2000万韩元(时约合2万美元)。必要时,公务员伦理委员会还会要求当事人提交近3年的财产相关资料。金大中政府以后,还将高层公务员的财产申报对象扩大到他们的直系亲属。

韩国历届政府都注意对公务员转岗就业或退休后工作的限制。如禁止因腐败而被处罚免职的公务员到相关企业就业。对正常退休或转岗的高层公务员和国会议员任期结束后,到相关领域的企业任职和就业也有限制。

4. 对腐败的惩罚。

2008年4月,韩国政府颁布了《腐败公务员处罚强化对策》,规定并公布了腐败量刑标准。行贿所受的惩罚轻些,但只要超过了2亿韩元,就要无条件判处实际刑罚。对于行贿与受贿的中介人量刑标准为,超过1亿韩元,可判处实际徒刑。

从2008年7月,韩国国务会议通过《特定经济犯罪加重处罚法》。为了杜绝公务员的腐败之风,对利用职务便利贪污公款或收受贿赂的公务员、国企干部、金融机构的干部职员在受到刑事处罚被关押的同时,还要被追讨贪污受贿金额2~5倍的罚金!这一招可真得叫腐败者倾家荡产了。

韩国也不光是惩罚贪腐的公务员。如2004年国会议员选举前,针对各种选举时的拉拢选民的买票卖票的贿选行为,检察机关规定,如果选民接受了30万韩元(时合2100元人民币)以上的财物,就会被拘留。选举委员会还向媒体公开接受财物的选民名单,通过这些手段,来确立“在选举时接受钱财或向别人要钱,就会被社会抛弃”的法律意识。

5. 奖励举报。

韩国在严惩贪腐的同时,大力奖励举报。早在2002年开始实施的《防止腐败法》就规定,国民举报公职人员腐败行为,因此增加了国家财政的收入,可获得最高达2亿韩元的奖励和彻底的安全保障。对举报腐败的奖励上限超过了举报敌谍(1.5亿韩元)和逃税犯(1亿韩元)的奖励。

必须说明的是,近几年的国际透明性组织的“腐败调查指数”,我国得分都比韩国低,腐败排名都比韩国靠前。我国近几年反腐败揭露和清查出来的大案要案比韩国的情况严重得多。我们绝没有“一百步笑五十步”的理由。■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黄 钟)

有关大饥荒的新谬说

——从四川官方数据看“营养性死亡”250万人的荒谬性

○ 洪振快

继2013年8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刊登江苏师范大学教授孙经先文章,称“三年困难时期”只有250万人以下的“营养性死亡”之后,今年9月22日,该报再次刊登署名“北原”的文章,称“三年困难时期”的大饥荒是“一种探索性质的错误”。^①此类严重违背历史事实、突破良知底线的谬论一再出笼,并被视为“真相”加以推销,如不对其严加驳斥,将会是非混淆,谬种流传。在大饥荒研究中,孙经先用“学术”进行包装和伪装的所谓“研究”尤其起到混淆是非的作用,本文将用确凿的史实,驳斥其制造的谣言和谬论(以下简称“孙氏谬论”)。

一、“孙氏谬论”之结论:四川一省的死亡数据,即可证其荒谬

孙经先在《红旗文稿》2014年第2期刊发的攻击杨继绳的文章中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个数学公式是不是正确,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这话没错。我们就按这个标准,来检验孙氏的“营养性死亡”在250万人以下、“‘饿死’(完全性饥饿死亡)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的“研究”结论是否可靠。

1958—1962年间发生的饥荒,全国各地情况很不一样,差异非常大,非正常死亡最严重的省份,有四川、安徽、河南、甘肃、贵州等省,其中四川尤为严重,饥荒持续时间最长,非正常死亡人数最多。

关于大饥荒的争论,是从1983年《中国统计年鉴》(以下简称《年鉴》)公布的数字开始的。《年鉴》仅提供1959、1960年底总人口分别为67207万人和66207万人,刚好减少1000万人;《年鉴》未提供1960年死亡人数,只提供死亡率为25.43‰。1988年出版了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公安部三局编的《中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

(1949—1985)》(以下简称《汇编》),死亡率与《年鉴》完全一样,为25.43‰,死亡人数是16934400人。由此可知,《年鉴》和《汇编》的数据是一致的,《汇编》是《年鉴》数字的底本,它们都是公安部门的户口统计数据。《汇编》的全国总数,是各省加总的。根据《汇编》,四川省1959、1960年死亡人数分别为1409387人、3398274人。然而,这两个数字都是被缩小的死亡数字。

大饥荒期间,四川到底死了多少人?

上世纪80年代初,谭启龙任四川省委书记期间,曾让省委研究室整理有关材料,后成《四川省情》一书,于1984年出版。该书提供了部分年份的死亡人数和死亡率,如1957年死亡84.6万人、死亡率12.06‰,1960年死亡364.7万人、死亡率53.97‰,1962年死亡94.6万人、死亡率14.62‰,其数据来源注明是“根据四川省公安厅1982年年底统计”。^②但由于1958、1959、1961、1962年的数据未公布,四川大饥荒期间死亡情况仍未得其详。

1988出版的《中国人口·四川分册》是在国家教委、国家计生委、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领导下组织编写的“中国人口”丛书中的一卷,该书提供了1950—1982年四川省人口的自然变动表,其1957—1962年的死亡人数分别为84.63万人、178.18万人、328.20万人、364.74万人、192.36万人、94.65万人,死亡率分别为12.07‰、25.17‰、46.97‰、53.97‰、29.42‰、14.62‰,可见其与《四川省情》是一致的,其资料来源标明是“四川省历年人口统计报表”。这意味着,四川公安部门和统计部门掌握的是同一套数据。

从《中国人口·四川分册》可以发现,1959年四川死亡人数高达328.20万人,而在《汇编》中仅为1409387人,两者相差将近187.3万人。这意味着,如果《中国人口·四川分册》数据可靠,则《汇编》严

重缩小了死亡数字。同样,1960年也缩小了24.9万余人。两年合计,缩小212万余人。

那么,为什么“根据四川省公安厅1982年年底统计”的《四川省情》,根据“四川省历年人口统计报表”的《中国人口·四川分册》,这两个代表四川官方的数字,与本来应该是根据四川官方上报的国家统计局、公安部公布的数字,存在如此大的差异?两套数据哪套更可信?

为此,需要搞清楚《四川省情》和《中国人口·四川分册》的数据源头。据《四川省志·公安司法志》介绍,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农村人口大批外流。不少地区出现浮肿病,一些县人口死亡率大幅度上升,使全省人口连续四年出现负增长。同时,有的地区和单位为多领粮食、多购副食品而浮报人口;部份地区为掩盖问题,弄虚作假,谎报人口。致使人口统计数字失实,1961年初统计中,全省短差人口上百万。”^[3]为了解决这一问题,1961年冬至1962年4月,四川省公安厅“根据公安部的通知和中共四川省委指示”,对全省人口“以公社为单位,逐队逐户逐人地全面登记核实,然后层层统计汇总”,“弄清了全省从1954年以来历年的总人口数,人口出生数和死

亡数,查清了人口统计上的差错数字”。^[4]

四川这次人口核查的详细数据,至今未见公开。但是,其档案已为研究者获得,香港大学教授冯客在其《毛泽东的大饥荒》一书中已有介绍^[5],档案部分内容也已收入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出版的“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根据这份档案,可知四川省统计局在1962年5月—6月整理完成了一套人口变动核查表,对1954—1961年的人口数据进行了核实,其中值得关注的是数据中存在“原报数”和“核实数”两套数据。

所谓“原报数”,应为公安部门原来逐年所报户籍人口数字;而“核实数”,则为此次全省人口核查所得的统计数字,不是户籍数字。将这两套数据与《汇编》《四川省情》和《中国人口·四川分册》进行比对,可以发现“核实数”与《四川省情》《中国人口·四川分册》相符,这就证明它就是《四川省情》和《中国人口·四川分册》的资料来源;而《汇编》则与之不符,甚至比“原报数”还要缩小,如1959年死亡数字,《汇编》数为1409387人,“原报数”为2103147人,而“核实数”为3304430人,这意味着,1959年四川死亡人口经“逐队逐户逐人地全面登记核实”的结果(即“核实数”)是330.4万人,而原先各地所报数字是210.3万人(即“原报数”),但公安部的数字仅为140.9万人(即《汇编》数)。

表1 1958—1961年四川三种人口数据

年度	项 目	总 人 口		出 生		死 亡		
		总人口数	比上年增减数	人 数	‰	人 数	‰	
六十年	原报表	68,149,216	-3,188,648	-4.7	1,093,339	1.57	3,398,238	4.87
	核实数	66,198,348	-2,776,424	-4.02	792,955	1.17	3,647,368	5.40
	比原报增减	-1,951,868	-	-2.81	-300,384	-0.40	-549,130	-0.83
	原报表	64,672,499	-3,437,711	-5.05	773,371	1.16	1,859,696	2.80
六十年	核实数	64,591,786	-7,006,562	-2.43	712,558	1.18	1,923,031	2.94
	比原报增减	-80,713	-	-0.12	-83	-0.02	163,935	0.14
	原报表	67,410,284	+627,027	+2.30	846,816	3.09	3,322,211	1.22
	核实数	68,603,573	+5,707,700	+2.17	7,780,471	2.83	2,735,988	1.00
六十年	比原报增减	+746,711	-	+1.08	+711,349	+0.26	+604,243	+0.22
	原报表	67,007,758	-7,066,034	-2.53	5,787,441	2.05	866,786	3.10
	核实数	67,635,361	-6,218,349	-2.20	4,444,000	1.64	10,657,261	3.94
	比原报增减	+1,372,397	-	+1.99	+1,352,821	+0.41	+2,004,675	+0.54
六十年	原报表	67,409,021	-837,657	-0.32	1,429,067	2.57	10,974,977	2.17
	核实数	68,492,467	-718,370	-0.20	13,214,877	2.24	13,392,229	2.46
	比原报增减	+7,083,446	-	+1.53	+20,346,170	+0.37	+7,398,232	+1.29

年份	出生人数			增减数	
	《汇编》	原报数	核实数	核实-原报	核实-《汇编》
1958	2248196	2248196	1701515	-546681	-546681
1959	1876748	1672335	1167392	-504943	-709356
1960	1093339	1093339	792955	-300384	-300384
1961	773371	773371	772508	-863	-863
合计	5991654	5787241	4434370	-1352871	-1557284

年份	死亡人数			增减数	
	《汇编》	原报数	核实数	核实-原报	核实-《汇编》
1958	1260447	1291705	1781832	490127	521385
1959	1409387	2103147	3304430	1201283	1895043
1960	3398274	3398238	3647368	249130	249094
1961	1859696	1859696	1923631	63935	63935
合计	7927804	8652786	10657261	2004475	2729457

上述1961年四川人口普查,是“以公社为单位,逐队逐户逐人地全面登记核实”为基础,“然后层层

四川省1954—1961年人口变动核查表(档案,四川省统计局,1962年5—6月)

统计汇总”，即从公社到县，从县到专区，逐级统计上报，最后汇总到省里。档案中另有四川18个地级单位的人口统计数据，其中死亡情况如下：

表2 1954—1961年四川各市、专区、自治州死亡人数表

	1954年	1955年	1956年	1957年	1958年	1959年	1960年	1961年
全省总数	557900	616750	714998	846320	1781832	3282022	3647368	1923633
重庆市	47295	40071	64018	43569	74686	108649	103190	94799
成都市	13424	14556	14109	17576	21778	24944	31967	31613
自贡市	2040	2071	2805	5153	10295	12227	14613	14794
江津专区	48613	48942	53313	65809	116438	176506	211740	179088
万县专区	36836	38837	46083	60585	145226	344232	287942	97942
涪陵专区	37523	42465	48404	61530	128892	442096	397273	130038
内江专区	44777	57708	67613	89583	232458	364494	493347	208213
宜宾专区	67212	81075	80420	95201	195741	267683	469436	347468
乐山专区	58466	64277	49231	50220	116093	214205	285121	121552
温江专区	34499	36979	42673	56153	123382	260999	266521	130599
绵阳专区	55586	65010	78435	99935	242455	354816	377061	185180
南充专区	37944	45427	54393	72535	158923	251824	273473	135625
达县专区	55204	58283	61148	76368	131636	298210	229666	112936
雅安专区	7166	7395	8670	11868	21357	65120	54493	34681
西昌专区	11315	13654	11102	22422	39846	59428	87098	52382
阿坝自治州			7386	4933	5748	9026	11388	10466
甘孜自治州			8474	5268	5360	5274	4908	7715
凉山自治州			16721	7612	11518	22289	48131	28542

说明：此表中1959年死亡总数比表1少22408人，原报表中有改动（成都市死亡人数），且《中国人口·四川分册》等均以此为准，故下文采用此数。

从中可以看出，死亡总数与上文“核实数”相符，所以这份表格应该就是各地的死亡人口统计表。各市、专区、自治州所属各县的详细数据，目前还未看到相关档案，为此，笔者费时数月，在国家图书馆查找地方志，拟按1960年四川行政区划将数字拼凑完整，努力的结果，是发现虽有部分县志有意回避而未记载1958—1962年的完整死亡数字，但仍有113个县的记载是完整的，占1960年四川173个县级单位的65%，即约2/3。根据县级数字加总，有几个各县数字完整的专区、自治州，如雅安专区、凉山自治州等，结果显示与上表的总数相符，这就证明，上述数字是各县汇总的结果。一个县内部的死亡情况，目前所知以涪陵专区彭水县档案资料最全，研究者根据档案也了解到县内58个公社的具体数字，当年部分公社、管区（如龙洋公社岩角管区）的人口核查数字还完整保留着，从中可以了解到“以公社为单位，逐队逐户逐人地全面登记核实”的具体情况。^{注6}

由此，则四川在大饥荒期间的人口死亡数字已

经确凿无疑，1958—1962年死亡人数分别为178.18万人、328.20万人、364.74万人、192.36万人、94.65万人，合计1158万余人。那么，这些死亡人口中有多少属于非正常死亡呢？

杨继绳先生以1955—1957、1963、1965—1966年6个年份的平均死亡率为正常死亡率，超出正常死亡率的为非正常死亡，计算的结果是非正常死亡约797万人。

据档案中的“核实数”，四川省1954—1957年死亡人数分别为55.8万、61.7万、71.5万、84.6万人，1957年已有明显的非正常偏高。如果以1955—1957年平均每年死亡72.6万人为正常死亡，则1958—1962年的非正常死亡为795万人；即便以1957年的偏高数字为正常死亡，1958—1962年的非正常死亡也有735万人。

此外，四川大饥荒期间的非正常死亡还有其他算法。如人口专家李若建根据1953、1964年两次人口普查期间各年龄组的人数变化及生存概率，推算四川省“大跃进”期间的非正常死亡人

人口普查变动登记表									
月	姓	名	性别	年龄	职业	何时何地何原因死亡	死亡日期	死亡原因	备注
99	周	明金	男	61	中		60.7.10	饿死	
	周	明	女	12			60.12.12	全死	
	胡	玉香	女	43			60.7.7	饿死	
	周	喜菊	男	9			60.3.14	饿死	
	周	润	男	83			60.3.8	饿死	
	周	前	男	8			60.9.14	饿死	
	周	长	女	17					
	周	世	男	21			60.10.10	饿死	
100	周	海	男	27	兵		60.3.10	饿死	绝户
101	周	理	男	61			60.4.10	饿死	
	周	金	女	43			60.10.7	饿死	
	周	志	男	15			61.4.10	饿死	
102	周	世	男	60			60.7.7	饿死	
	周	厚	女	41			60.1.1	全死	
103	周	世	男	41	复中		60.10.10	饿死	
	周	世	女	38			60.8.1	全死	
	周	中	男	17			60.1.1	全死	
	周	喜	女	13			61.7.7	饿死	
104	周	明	男	31	兵		60.12.10	饿死	
	周	明	女	20			60.8.1	饿死	
	周	春	男	7			60.10.10	饿死	
	周	翠	女	19			59.12.10	饿死	
105	周	世	女	18	中				
	周	康	男	21					
	周	彩	女	53			57.3.10	饿死	
	周	化	女	50			60.3.10	饿死	

四川省彭水县1961年人口普查登记表 该登记表证明了大饥荒的残酷性，大部分人于1960年死于浮肿、干瘦病，全家人饿死的“绝户”情况并不鲜见。

口,其结论是:“如果把四川省人口作为一个封闭人口看,非正常死亡人数不超过752万人。扣除50万左右的外流人口,四川省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不会超过700万人。”^[27]这里所说的“不会超过700万人”,实际是指大约(但不会高于)700万人。其据以计算的1957年四川省人口死亡率12.07‰,恰好与上述“核实数”计算所得死亡率相同。因此,其结论是比较可信的。

由上可知,以不同方式推算,四川大饥荒期间的非正常死亡总数相近,应该是七八百万人。至于非正常死亡的方式,除了因浮肿、干瘦死亡外,还有吃观音土(白膳泥)胀死、中毒死、累死、打死、逼死、折磨死等各种各样的情况。

仅四川一省情况,即证明孙经先的所谓“研究”结论已经完全违背历史事实,其荒谬已显而易见。必须说明的是:四川的上述数字,是人口死亡统计数字,与人口迁移等因素无关;该数字是“逐队逐户逐人地全面登记核实”得到的(即“核实数”),并不是公安部门原来申报的户口统计数字(即“原报数”)。这就证明,孙经先以所谓人口迁移中户籍重报、注销、漏报、补报等原因解释“人口异常变化”,并由此得出“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只有250万人以下的“营养性死亡”是如何荒诞,因为根据上述四川省死亡数字,无论如何也得不出只有250万人以下的“营养性死亡”的结论,而这还只是四川一省的情况。

二、“孙氏谬论”之论据:漏洞百出,完全违背历史事实,将严肃的历史变成数字游戏

孙得出“营养性死亡”250万人以下的荒谬结论,与其论证逻辑有关。因此,不揭示其论证逻辑的荒谬,孙及其支持者仍会认为没有受到“实质性质疑”。

孙根据1983年《中国统计年鉴》,认为自己“发现”了一个“秘密”,从而揭开了他人所不知道的“真相”。这个所谓的“秘密”,是表3中D栏所示的“人口异常变化数”。A栏人口总数抄录自《年鉴》;B栏指该年相比上一年的人口总数增减;C栏指当年出生人口减去死亡人口得到的人口自然增长数。按照“人口平衡公式”,即在不考

虑人口迁移的情况下(当时国际移民很少,所以从全国层面可以忽略),按道理B栏数字应与C栏相等,但实际上出现了不相等的情况,即D栏所示的“人口异常变化数”(D=B-C)。孙称,合理解释这个“人口异常变化数”,是揭开1960年总人口比1959年净减少1000万的“秘密”之关键。为此,他发明了E栏,即以D栏加上E栏上一年的数字,得到一个“人口异常变化累计数”,他称自己“发现”了“秘密”,就是E栏在1960年及之前为正值,之后变为负值,直到1982年归零。他这样解释该“现象”:

一,由于工业发展和“大跃进”,1954—1959年(因为E栏中1955年为负值,解释不通,所以改为主要是1956—1959年)有3000万以上的农村人口迁移到市镇,在这一过程中出现1162万(即E栏1959年数字)的重报(或虚报)户籍人口,即双户口(户口从农村迁入城镇,但在农村没有注销户口)。这是所谓“第一个基本结论”。

二,1958年1月《户口登记条例》颁布后没有实施,到“1960年前后的三年困难时期”才得以实施,1964年实行人口普查,上述1162万人在1960年到1964年被注销。这是所谓“第二个基本结论”。

三,1960年下半年到1964年由于大规模精简城镇人口,3000万人以上的城镇人口被精简回农村,这一过程中有1482万人(即E栏1964年数字)没有及时在农村办理户籍迁入手续,成为没有户籍的人。这是所谓“第三个基本结论”。

四,上述漏报户籍的1482万人在1965年至1982年间重新登记了户籍(由于1979年数字已很小,有时也称是1965—1979年)。这是所谓“第四个基本结论”。

孙认为,由于上述二、三原因,造成1960—1964年户籍减少2644万(1162万加1482万)人,这些减少都仅仅是统计数字的减少,而不是实际人口的真实减少,由此得出结论:1960年人口统计数据减少1000万中,有696万(即D栏1960年数字)是由于人口迁移造成的,与人口死亡无关。由此进一步推论:根本没有什么大饥荒,所谓的“大饥荒”,实际上是由人口迁移过程中户籍重报、注销、漏报、补报造成的,所以“饿死三千万”是一个人为制造的“重大谣言”。

表3 孙氏所谓1954—1982年我国人口异常变化数^{注8}

单位:万人

年份	A栏 岁末人口数	B栏 人口总数 增长数	C栏 人口自然 增长数	D栏 人口异常 变化数	E栏 人口异常变 化累计数
1953	58796				0
1954	60266	1470	1466	4	4
1955	61465	1199	1233	-34	-30
1956	62828	1363	1270	93	63
1957	64653	1825	1479	346	409
1958	65994	1341	1124	217	626
1959	67207	1213	677	536	1162
1960	66207	-1000	-304	-696	466
1961	65859	-348	249	-597	-131
1962	67295	1436	1794	-358	-489
1963	69172	1877	2270	-393	-882
1964	70499	1327	1927	-600	-1482
1965	72538	2039	2026	13	-1469
1966	74542	2004	1928	76	-1393
1967	76368	1826	1927	-101	-1494
1968	78534	2166	2121	45	-1449
1969	80671	2137	2076	61	-1388
1970	82992	2321	2114	207	-1181
1971	85229	2237	1954	283	-898
1972	87177	1948	1910	38	-860
1973	89211	2034	1842	192	-668
1974	90859	1648	1574	74	-594
1975	92420	1561	1438	123	-471
1976	93717	1297	1178	119	-352
1977	94974	1257	1138	119	-233
1978	96259	1285	1147	138	-95
1979	97542	1283	1125	158	63
1980	98705	1163	1160	3	66
1981	100072	1367	1440	-73	-7
1982	101654	1469	1461	8	1

绝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1959年净减少1000万人是由饥荒引起的,主要是死亡人口过多及死亡漏报所致。孙用上述逻辑反驳其他研究者。

孙的上述“论证”,包装得很“学术”,看起来煞有介事,实则完全脱离实际,其对“人口异常变化”的解释完全不符合历史实情:

第一,以不可靠的数据得出的结论自然不可信。

学术研究必须遵循基本的学术规范,在使用数学工具进行推理、演算之前,至少得把有关数据弄准确,保证数据的可靠性。在不可靠的数据上推演,无论你数学能力多么强,都得不到符合实际的结论。孙号称数学家,却连这样简单的常识都不遵循。

孙的“论证”,是以《年鉴》数据为前提的。这个数据是否准确,严谨的研究应先追究其来源,考证其准确性。全国统计数字是由各省汇总而成的,全国总人口一年中减少1000万人,到底是哪些省份减少的?实际上,一旦深入各省,问题

就会变得明朗。以下是人口变动最大的5个省,从中可以看出,光是四川,一年中人口就减少了518万余人,加上安徽减少约360万人,两省导致的总人口减少已达878万人,已经接近全国减少1000万人的数字,因此,破解全国减少1000万人的谜团,关键是解开四川和安徽人口减少之谜。

表4《汇编》数据显示的“人口异常变化”情况

单位:万人

地域	1959年 总人口	1960年 总人口	总人口 增加数	1960年人口变化			人口异常 变化数
				自然增长数	净迁移(迁 入-迁出)	总变化数	
全 国	67207	66207	-999.9	-304.1			-695.8
四川	7372.3	6854.0	-518.3	-230.5	12.1	-218.4	-299.9
安徽	3445.5	3085.6	-359.9	-127.1	-86.7	-213.8	-146.1
河南	5040.0	4846.3	-193.7	-125.3	-11.0	-136.3	-57.4
山东	5402.5	5219.1	-183.4	-21.7	-114.4	-136.1	-47.3
湖南	3711.9	3589.4	-122.5	-36.0	-53.1	-89.1	-33.4
5省合计	24972	23594.4	-1377.6	-540.6	-253.1	-793.7	-584.1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9、10、268、280、991、994、995、997、1000页。

根据表4,可知按照《汇编》,当年全国“人口异常变化”-696万人中,5省占到-584万人,其中仅四川就占-300万人,占到全国总数的43%,全国“人口异常变化”主要是四川及安徽等数省的问题。

但是,四川的人口数字,已如表1所示,存在三种情况,《汇编》数是一个严重不符实情的数字,是不能采信。比对《汇编》数与“核实数”,可以发现如下问题:

1. 出生数方面:1958—1960年,《汇编》数比“核实数”多报出生155.6万余人(其中1959年多报最多,约71万人)。

2. 死亡数方面:1958—1960年,《汇编》数比“核实数”少报死亡约266.6万人。其中1959年少报最多,四川省内各地区已经向公安厅少报120万余人,四川向中央报告时再减69万多人,造成一年内就少报189万多人的严重漏报现象。

从1954年到1960年,四川因为多报出生、少报死亡,造成了500多万的统计数字误差,这导致了在与历年总人口比较时,出现了所谓的“人口异常变化”。在《汇编》中,四川总人口1960年比1959年净减少达518.3万人,而自然增长仅减少230.5万人,而该年四川人口迁入多于迁出,这里的“人口异常变化”已达约300万人。《汇编》中的四川人口数字之不可靠,由此可见一斑。

安徽方面,《汇编》显示1958年末总人口为

3426.7万,1961年末为2987.7万人,1959—1961年三年中净减少人口439万人。而自然增长方面,三年净减少仅为103.5万人,加上迁移方面三年迁出人口76.8万人,其中存在258.7万人严重的“人口异常变化”。就目前公开的资料,这里面1960年少报死亡人口确凿无疑。《汇编》显示安徽1960年死亡人口是1638422人,而《安徽省志·人口志》显示安徽省公安厅掌握的数字是2218280人,少报了约58万人。这个2218280人的数字,《汇编》中作为“调整数”列入,应该是后来安徽向公安部提供的。

表5 《汇编》中的1959—1961年安徽人口数据

单位:人

	总人口 (万)	出生	死亡	自然增长	净迁移
1959	3445.5	678238	570080	108158	128855
1960	3085.6	367140	1638422	-1271282	-866883
1961	2987.7	372151	244420	127731	-30357
3年合计		1417529	2452922	-1035393	768385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8—11、278—281、991页。

四川、安徽的例子证明,《汇编》中的全国人口统计数据严重失实,在此基础上推算出来的所谓“人口异常变化数”本身就离事实甚远,孙并在这个“人口异常变化数”基础上再推出所谓的“人口异常变化累计数”,又在此“累计数”的基础上做出所谓的四个“基本结论”,这些“结论”之脱离实际、毫无学术价值,就不言自明了。而孙在研究中,连核实《汇编》中的数字差异(如安徽),以及《汇编》数字与各省提供的数字(如四川)哪个更符合事实都没有做,其“研究”之不严谨、不可靠,也是不言自明。

第二,孙所称的“人口异常变化”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也不是孙的“新发现”,而是公安部早就注意到并试图解决的问题,并因此导致了1964年人口普查。

孙称“人口异常变化”是自己的“新发现”,这是不扎实研究历史而自我标榜的可笑现象。

公安部掌握的人口数据是各省上报的,像四川1960年出现了总人口减少518.3万、“人口异常变化数”近300万人的情况,难道公安部就没有看出来?也不去追问为何产生这种情况?据《四川省志·公安司法志》介绍,四川1961年冬至1962年4月进行的核查,是四川省公安厅“根据

公安部的通知和中共四川省委指示”,才对全省人口进行核查的。由此可知,该次核查是公安部的要求。公安部为何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合理的推测,便是因为发现了上述人口数字异常情况,才要求四川方面核查的。

《安徽省志·公安志》也提到:“1959年至1960年,在‘左’的错误影响下,全省户口管理工作发生了一些失误。特别是农村人口变动统计数字严重失实。”^[29]所谓“农村人口变动统计数字严重失实”,也是注意到了人口数字变化异常情况。

1963年11月16日,公安部向中央、国务院呈递报告,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于当月20日向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人委,西藏工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发出这份报告。该报告说:

现在各地人口数字不准确的现象,还是比较普遍。江西、甘肃两省,今年上半年进行了人口普查,查的结果,江西的总人口,比原来报的少了20万,占1%,甘肃少了27万,占2.2%。根据上半年统计,全国自然增加的人口为1204万,但是,总人口只增加825万,少了379万。河南省总人口的增加数,比自然增加人口少了42万,山东少了36万,新疆少了6万,其他各省都有类似情况。

总人口的增加比自然增加少的原因,除了统计工作中的差错之外,主要是一些基层单位过去多报了人口。多报人口现象,前几年比较严重,1961年后,逐年有所减少,但始终没有彻底清除,现在全国6亿8100万人口中,估计还有1%至1.5%的虚数。

公安部上述报告呈递上去后,次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即向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人委,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国家统计局转发该报告,里面说:“几年来,很多地区的人口数字忽高忽低,不够准确,有些地区还相当严重,给国家计划经济造成一些困难。”“这几年的人口数字为什么总是搞不准确?除公安机关对这项工作抓得不够,很多公社、大队没有专人负责以外,还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是现在很多物资的分配是按人口计算,有些社、队、企业,甚至某些县,为了‘小集体’和个人利益多报人口,多分物资;二是有些地区为了某种‘需要’,随意指使统计单位多报或调整人口数字,很不严肃。”“这种情况,必须迅速改变。中央已决定在明年6月底进行全国人口普查。”

由此可知,1964年的人口普查,主要就是为了查清“人口异常变化”情况,以消除公安部报告中所说的“多报人口现象”,避免“给国家计划经济造成一些困难”。孙不了解这些情况,还自称“人口异常变化”是自己的“新发现”。

第三,“人口异常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多报出生、少报死亡,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上述公安部的报告说明,公安部 and 中共中央、国务院对“人口异常变化”的事实是清楚的,对于原因,公安部的报告主要归结为多报人口,原因是在物资靠计划分配的情况下,多报人口可以多获物资。公安部报告中详细列举了各省情况:

不少基层干部为了多领布票等东西,他们就有意多报人口。例如,甘肃省秦安县西川公社,62年底人口统计时,各大队多报681人,公社多报571人,共多报1252人,占全社总人口16.6%。今年上半年多领布票4945尺,棉证343斤,该社川口大队文书宋国宗一人就贪污布票176尺,棉证12斤8两。江西省吉水县今年3月普查时,查出各社、队过去多报5000余人,占总人口2%。该县枫江区,62年6月底多报642人,冒领布票1900余尺,仅区委书记周雨顺就贪污1000余尺。这个县普查后,6月底人口统计时,各社、队又多报2000余人。安徽省淮南市郊区耿集公社的谷湖等四个大队去年10月以来,多报出生74人,冒领布票1258尺,糖148斤,棉花74斤。河南省信阳专区今年上半年检查,共查出基层单位多报14万人,占全区总人口1.7%,几乎每个大队都有多报人口。光山县晏河公社群生六队实有786人,上报为1291人,多报了505人。有些县也多报人口,湖北省黄陂县,1953年人口普查时,实有719000人,县长示意报为819000人,多报10万,至1960年才查出纠正;61年统计时,县委示意公安局多报35000人;去年底,该县程志德副县长又指示公安局多报6500人。江西省永新县副县长王承安,今年普查后还要公安局多报2000余人,公安局不同意,他批评说:“是我听你的,还是你听我的”,结果还是多报了2000人。(作者按:原档案中数字均为中文数字,为全文统一及阅读习惯改为阿拉伯数字)

公安部报告强调“人口变动异常”是多报人口,这点出了事实的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是

地方官员瞒报、漏报死亡人口(如上文四川情况),公安部报告中没有提及,但未必不知情。

从地方看,四川、安徽二省“人口变动异常”情况最严重,官方对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认识也是一致的。

《四川省志·公安司法志》介绍该省1961年冬至1962年初的全省人口核查原因时说:“有的地区和单位为多领粮食、多购副食品而浮报人口;部分地区为掩盖问题,弄虚作假,谎报人口”,“致使人口统计数字失实”。^[10]所谓“部分地区为掩盖问题,弄虚作假,谎报人口”,显然是指地方官员为了掩盖大饥荒的严重问题,减少自己的责任,而有意弄虚作假,“谎报”实即隐瞒死亡人口。从核查结果来看,如上所述,仅1959年一年就瞒报了120万人,1958—1961年共瞒报200万人。而“浮报”,则是为了“多领粮食、多购副食品”,而多报出生人口或虚报不存在的人口,仅1959年就多报出生50余万人,1958—1961年共多报出生人口135万余人。因隐瞒死亡人口和多报出生人口,“致使人口统计数字失实”。核查的原因,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安徽,《安徽省志·公安志》在说明1959—1960年“农村人口变动统计数字严重失实”之后,也解释了其原因:“当时,外流人口激增,非正常死亡情况严重。但是,在户口变动登记中,未能及时准确地反映;在城镇,由于粮、油、棉等计划供应物资紧张、户口划分过大等原因,致使户口登记管理制度松弛,虚报、多登记户口现象严重,以致全省统计数字失实。”^[11]这段话表明,安徽官方对“农村人口变动统计数字严重失实”的原因是清楚的,主要是“非正常死亡情况严重”而没有在户口变动登记中反映出来,实即瞒报死亡人口,以及为了多得计划供应物资而“虚报、多登记户口”。

关于虚报人口的原因和具体做法,1964年11月27日新华社《内部参考》对石家庄在该年人口普查中发现的“半数以上的大队虚报人口”问题的报道有代表性。内参说:“河北省石家庄地区在人口普查工作中,共发现有虚报人口问题的生产大队2435个,占大队总数的55%,共多报人口110500人,占总人口的2.22%。无极县207个大队中,203个大队虚报人口,多报21312人,占该县总人口的7.41%。新乐县正算公社正算大

队多报414人,占该村总人口的15.4%。虚报人口,几乎百分之百是基层干部为了多留口粮或多分国家物资而搞的。他们虚报人口的手段大体有五种:多报出生;少报死亡;迁出不销;假立户头;大、小队干部往下分摊虚报人口任务或层层加码。”该报道表明,虚报人口的主要手段是多报出生、少报死亡,目的“几乎百分之百是基层干部为了多留口粮或多分国家物资”。这是1964年人口普查时查出的结果,载在新华社内参里面,没有理由怀疑其可靠性。

在大饥荒期间,农村人口为了获得粮食以增加生存机会,瞒报死亡是不得已的举动。各地档案中,多有死亡不销户口而冒领粮食的记载,如1962年1月11日甘肃省委转发的报告中说:经过普查核实发现,“这次全省查出了人死了不销户、粮关系继续买粮的事件达二千多起”;四川民政厅涪陵工作组1962年1月30日的一份报告说:涪陵“死人不报活人吃死人粮等情况相当严重”;等等。^{注12}

了解上述历史实情,再回过头来看表3的D栏反映的“人口异常变化”,对其中的规律就可以有合理的解释:从1954年到1959年总体呈正数增长,主要原因应是1953年实行统购统销,之后又实行棉、油等统购统销,计划物资控制趋紧,地方上为了多得物资而多报出生、虚报人口所致;1960年起转为负数,主要是1959年全国范围进入大饥荒后非正常死亡人口急剧增加,地方官员为了推卸政治责任而瞒报死亡人口所致;到1965年基本趋零,是因1964年进行了人口普查,多报和漏报都被注销,从而归零。从1965年起,总体上又转为正值,这说明由于粮油棉布等计划供应的政策没有改变,多报出生以获得计划物资的动力仍在,普查过后重新出现,故而该现象一直存在,直到1982年人口普查又重新注销、归零。因此,“人口异常变化”的数字,与历史事实紧密贴合,其阶段性和1964、1982年的人口普查相关,与孙的所谓户籍人口迁移原因无关。

从“人口异常变化”的数字大小来看,1965年前有两个顶峰:一个是1960年-696万人,占总人口之比为1.05%,这一误差,从四川的情况看,是此前数年多报出生、1959年开始大规模非正常死亡被瞒报引起;第二个顶峰是1964年,为-600万人,占总人口0.85%,这主要是该年人口普查查出此前

数年多报出生、漏报死亡人口所致。

综合言之,无论是1960年还是1964年的“人口异常变化数”,占总人口的比率不过1%光景,是因此前的多报出生、少报死亡所造成的误差,均在可以理解的范围之内,也没有超过公安部报告中列举的各地严重情况,深入历史实际,不难得到解释。而孙却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提出一个毫无道理、脱离实际的“人口异常变化累计数”(E栏),并以此为基础,认为不存在大饥荒,“人口异常变化”是由人口迁移中的户籍重报、注销、漏报、补报造成的,这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荒谬见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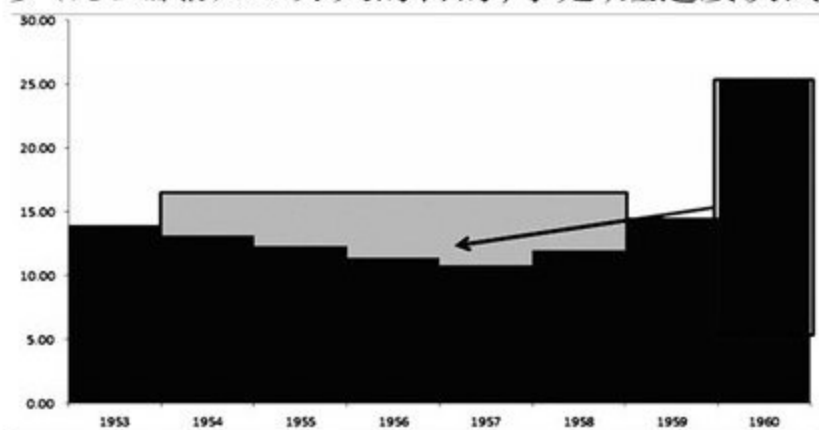
孙经先关于户籍重报、注销、漏报、补报的“论证”漏洞百出,经不起检验,限于篇幅,此处仅例举一二以证其谬。如孙的“第二个基本结论”,称1958年1月《户口登记条例》颁布后没有实施,到“1960年前后的三年困难时期”才得以实施。《安徽省志·公安志》明确记载:“1958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颁布。安徽各级人民政府和公安机关采用各种形式对《条例》进行广泛宣传,并逐步在城镇建立健全常住、暂住、出生、死亡、迁出、迁入、变更更正等7项登记制度,在农村实行常住人口登记和出生、死亡、迁出、迁入等4项变动登记制度。”^{注13}可见《户口登记条例》颁布而未实施是孙的臆想。

三、“孙氏谬论”之手法:为了掩盖历史真相,不惜随意“抹掉”675万死亡人口,缺乏基本的史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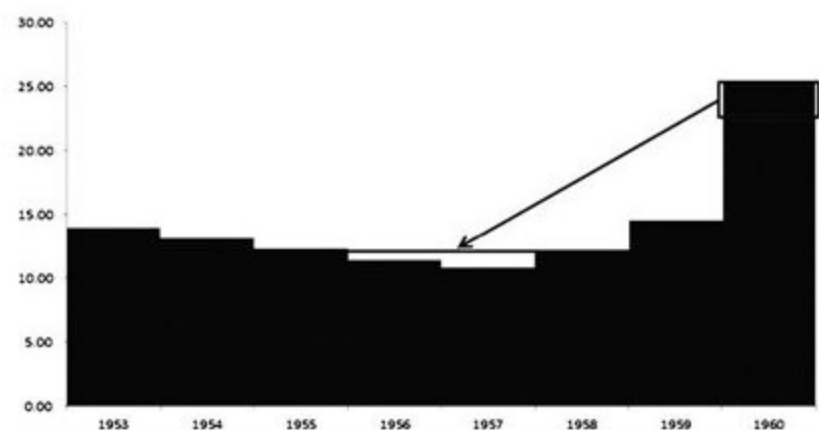
孙在提出上述一套人口迁移中的户籍重报、注销、漏报、补报的“理论”时,无法解释另一个事实:即1960年的高死亡人口和相应的高死亡率。根据《年鉴》和《汇编》,1960年全国人口死亡16934400人,死亡率25.43‰。实际死亡人口当然更多,因为安徽一省即少报约58万人。即使仅以死亡1693万人来计算,它比灾前的1955—1957年每年死亡700万人上下,比灾后各年(1962—1982年,除1964年外)死亡均在700万人以下,仍存在非正常死亡约1000万人的事实,其“营养性死亡”在250万人以下的结论,关于户籍重报、注销、漏报、补报的论据都无法成立。为

此,他采取了“抹掉”这些死亡人口的“策略”,通过调低1960年死亡率的“办法”,让675万死亡人口无端消失。且看他是怎么做的。

网友 chenqin 在知乎网上发文,揭露孙之“策略”,如下图(图A、B):孙将1960年的部分死亡率“调整”到1954—1958年,最终1960年的死亡率由25.43‰被“调整”为15.55‰,下降了9.88‰,调低了38.85%,死亡人数减少到1018万人,无故减少675万人。这675万人被孙当作1954—1958年间的“死亡漏报”,这些“死亡漏报”又在1960年全部“补报”,这样全国统计数据中1960年死亡的1693万人就有675万是1954—1958年的,而不是1960年死亡的,这样饥荒也就没有了。那么,孙的这种“调整”,依据是什么呢?孙说:“我们把1954—1958年期间死亡漏报率暂定为12%,这是保守的估计(按照科尔和蒋正华先生的估计,这一期间的死亡漏报率高达40%以上)。如果我们把这一期间死亡漏报率由12%继续向上调整(我们倾向于这样做),则1959—1961年期间的死亡率就要继续下调。”^{注14}之所以要定为“12%”,是必须定为这个数字:因为如果调低太多,则1960年死亡率比其他年份还要低,这显然脱离实际太远,欺骗马上被揭穿;但如果调低太少,又达不到减少(死亡漏报)675万人的目的;于是,经过屡次试



A.多削死亡率的情况



B.少削死亡率的情况

验,孙将之定为“12%”。然而,这个“12%”有什么依据?实际上完全没有依据,就是孙需要,于是他就“创造”出来,并将之当作“历史真相”。

网友 chenqin 总结说:“为了削平60年的死亡率高峰,孙先生创造了一个没根据的概念——死亡漏报、补报;创造了两个不存在的参数——54—58年每年漏报12%,在60年一次性补回。但事实上,这三个条件既没有根据,又对结论有极大的影响,它们的组合可以创造出任何结论。孙经先只是在经过大量调试之后,选择了最适合自己结论的一组数据。按照孙的‘模型’,别说削平60年死亡率了,再狠心点,孙甚至可以声称59—61年的死亡全部来自解放前的死亡漏报(把59—61的死亡率波峰给填到解放前去),因此三年里一个人都没死。”^{注15}

孙的“创造”,存在种种问题:比如,按孙的这一“创造”,因存在死亡漏报,则其前述人口迁移中的户籍重报、注销、漏报、补报的数字全部需要调整,所谓的四个“基本结论”都要调整、重新算过,而这,正是杨继绳质疑他忽略死亡漏报造成谬误的理由。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孙又在“调整”的基础上推出“经调整的人口异常变化数”。比如,调整后1960年出生率21.21‰,死亡率15.55‰,自然增长率5.66‰,人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长371万;又比如,调整后1964年的“人口异常变化数”达到-1482万人,1965年达-1470万人,1964年的人口普查,已经注销了此前人口数据问题,基本上已归零,孙居然“创造”出将近1500万的“人口异常变化数”,那岂不是说1964年的人口普查等于白费力气,没有解决人口数据存在的问题,反而扩大了问题?

此外,孙的这一“创造”,完全经不起事实的检验。孙在全国数据上做文章,因全国数据没有参照,问题被掩盖,一旦将其落到地方,问题马上就会显现出来。比如四川,历年死亡数据已如上述,假如孙所说为实,那么1960年死亡364.7万人就要减少,因为其中有不少来自1954—1958年,问题是,四川1959年死亡328.2万人,无论孙怎么调,都不能既把1960年调低,又把1959年调低,这样四川数百万的非正常死亡就无法否定。四川数百万的非正常死亡无法否定,其“营养性死亡”在250万人以下的说辞仅四川一省就可戳

穿,其谬误也就不言自明了。这种随意“调整”死亡率和死亡人数的做法,说穿了就是一个为了预设的结论之需要而采用的数字游戏。然而,在人命关天的大问题上缺乏对历史事实的基本尊重,随意玩弄数字游戏,正说明其缺乏基本的史德。

四、“孙氏谬论”之意图:掩盖真相、混淆是非,拒绝历史反思

1958—1962年发生的大饥荒,由于档案未全面公开,真相仍未完全揭示,也留下了一些争议的空间。以大饥荒中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总数而论,大部分研究者认为应为两三千万人。据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提交给2007年9月在延安召开的第七届国史学术年会的论文介绍,国内外学者根据户口数据和1982年10月起陆续公布的1953、1964、1982年三次人口普查数据及1‰生育率抽样调查数据,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关于大饥荒中的非正常死亡(也称超线性死亡)人数的估计,从1500万到4000多万人不等。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

党和政府部门的出版物和官员个人的观点: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提出,“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约1500万人”(1989年);《中国人口(总论)》认为,1960—1962年三年中“非正常死亡人口总数约为1858万人”(1991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廖盖隆认为,“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达到4000万人”。

国内专家的研究成果: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著名人口学家蒋正华认为,“在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总人口约为1700万人”;李成瑞自己认为,在1958—1963年间,“超线性死亡人口(即非正常死亡人口)为2158万人,约为2200万”;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兼任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人口专家委员会委员)彭希哲认为,非正常死亡人口数约为2300万;任职于上海大学的学者金辉,认为“非正常死亡的绝对数字,低限值也在4000万之巨”;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曹树基认为,1959—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3250万”;中山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李若建认为,三年困难时期因饥荒而死亡的人口数在1530万到2470万之间;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认为,“三年的大饥荒造成的人口过量死亡至少要超过1530万”;党史专家韩钢表示,“个人对二千万以下

的数字都持怀疑态度”。

国外学者方面,美国人口与人口学委员会主席、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斯利·科尔认为超线性死亡为2700万人(1984年);美国人口统计学家朱迪斯·班尼斯特认为非正常死亡为3000万人(1987年);费正清认为约有2000万到3000万人由于缺乏营养在饥荒中丧失;麦克法夸尔认为非正常死亡人数有1600万到2700万人。^{注16}

上述数字,均指因大饥荒而导致非正常死亡,人口出生减少等损失未计在内,其数大多认为在1000万到3000万人不等。

李成瑞文中没有提到的还有两个代表性观点:一是杨继绳认为非正常死亡3600万人,一是香港大学教授冯客认为“非正常死亡人数被确认为不少于4500万”。

从上述总结来看,大饥荒导致两三千万人非正常死亡是主流,而且这是经不同的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有些研究者认为非正常死亡总数在3000万或以上,目前还未能得到档案的证实或证伪,只能算是个人学术观点。对个人学术观点可以商榷,但不能背离史实太远。以孙经先为代表的一类人,“研究”认为只有250万人以下的“营养性死亡”,如此背离史实的荒谬“研究”结论能够出笼,并得到支持和广泛传播,实有其他更深层次的原因在。

大饥荒中发生严重死人事件的各地干部,在后来的追查中,大都承认了自己的罪恶,比如,1960年12月5日,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在西北局书记处会议上做检讨时承认自己“确实造成了罪过”^{注17},1961年1月7日,凤阳县委书记处书记赵玉书代表县委在五级干部扩大会议上的检查材料中承认“拿人命当儿戏,我们有罪”^{注18}。然而,时至今日,竟然还有人意图否定曾经发生大饥荒的事实,他们漠视千万农民的生命权利,置他们的无辜死亡而不顾,仍试图用各种伪学术来掩盖历史真相,甚至“创造”出让人惊愕的“探索性错误”提法,其缺乏基本的学术良知和对普通老百姓生命权利的最基本的尊重已不言自明。这些人之所以如此,其意图无非是为了给某个人、某个时代辩护,因而不顾历史事实,意图掩盖真相、混淆是非,拒绝历史反思。■

注释:详见本刊网站。

(责任编辑 黄 钟)

周永康案的反思与建言

○ 崔 敏

最近,政治局前委员、中央政法委员会前书记周永康被查处。这样一位要员事涉贪腐,堪称特大号的超级大老虎。能够把超级大老虎关进笼子,表明了党中央反腐败的勇气与决心,对提升民气和增强凝聚力有极大好处,对中国的法治建设更是一大助力。深入剖析周永康严重违纪问题发生的深层次原因,深刻反思,切实改善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革除体制方面的弊端,才能真正走上依法治国的康庄大道。

一、周永康主管政法10年,中国法治建设是前进还是倒退

这是极具争议的一个话题,人们的评价截然相反。必须以充分说理的方式正面回应。

应当肯定,自从十五大把“依法治国”确立为治国方略,十六大、十七大一再强调“推进司法改革,保证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过去的10多年,我国的法治建设取得了不小进步。但是,对于这些进步不可估计过高。事实上,法治建设遇到很大阻力,举步维艰,总是在进进退退间曲折前行。下面,从几个侧面做一点分析:

(一) 思想作风溃散,大轰大嗡导致虚报浮夸成风

周永康担任公安部部长伊始,发布了“5条禁令”,当时确实产生了相当大的震慑作用,但其最大的功效是树起了周永康的权威。随后,连续开展的“大讨论”“大练兵”“大接访”等活动,浮夸和吹嘘的成分较多,对于提高实战能力作用有限。例如,“大讨论”主要是学习周永康的“重要讲话”;“大练兵”多是应付检阅的队列操练;“大接访”更是华而不实的花架子。一面宣传“大接访”,宣称“人人受到局长接待,件件得到妥善处理”,一面又鼓吹“零上访”。实际的情况是,在局长接访日,事先把难缠的上访

户控制起来不许他们“搅局”,媒体只报道光鲜的一面,使“大接访”成了掩盖矛盾的表演秀。

在周永康主政时期,出台了许多不符合客观规律的硬性指标,作为考核干警的依据,尤其是不顾客观条件盲目追求破案率,要求“命案必破”,导致有些地方为“达标”而造假或瞒报,造成不少隐案、黑案。法院系统则是盲目追求调解率、结案率和息诉率,要求做到“原被告双方都满意”。推行诸如此类违背诉讼规律的做法,带坏了队伍,以致许多地方说假话成风,瞒上欺下,报喜不报忧成为常态。不少地方申报的英模事迹,掺杂很多水分,甚至树起了一些假英模和伪标兵,例如,王立军原本就是一个最善于吹嘘和造假的小霸王,却对其大肆吹捧、不断贴金,不许有任何批评,以致纵容王立军长期作虐,最后酿成“大英雄”叛逃。王立军的闹剧颇具典型性,足以说明周永康主政期间干警队伍的溃散达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

(二) 大批政法干警贪腐落马,成为犯罪高发的重灾区

周永康严重违纪的案件正在审理之中,从媒体陆续披露的情况来看,周的问题至少有三个方面:一是巨额贪腐,二是滥用职权,三是结党营私。主管全国政法工作的首脑自身不正,焉能带出过硬的队伍?因此,在过去10多年间,政法、公安队伍中大批官员落马就丝毫不足为奇了。

从公安部来说,有前任部长、副部长和若干局处长落马;各省市的公安厅厅(局)长垮台的就更多了;至于市县公安局局(处)长和基层的科所队长,被罢官判刑的更难以计数,有的地方连续几任公安局局长相继垮台。法院、检察院以及政法委系统因贪赃枉法陆续垮台的也不在少数。大量存在的司法腐败,表明周永康治下的政法队伍已成为犯罪高发的重灾区。

政法部门出现腐败现象,同其他部门又有所不同。由于政法干警经常与各种罪犯打交道,一旦腐

败,往往会“涉黑”,以致警匪勾结、官匪一家,在执法过程中使用黑道手段。例如,身为公安局局长的王立军,竟与薄谷开来共谋如何杀人。薄谷开来杀人后,王立军又指派部下为其掩盖,并将焚尸灭迹的情况通报给杀人犯。电话中只说了8个字:“化作青烟,驾鹤西去。”那是何等的潇洒,何等的富有诗意!——这是最典型的黑道做派。公安、司法人员和罪犯原本是猫鼠关系,一旦政法干警涉黑,甚至成为黑帮中的一员,这种腐败就危害更烈。

已经揭露的大量事实,表明政法队伍中的问题十分严重,触目惊心!由此造成的司法不公,严重败坏了公安、司法机关的形象。今年1月7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讲话,誓言要“扫除政法领域的腐败现象,坚决清除害群之马”。总书记这样的重话,绝非无的放矢。

(三)冤假错案频发,急挫执法的公信力

周永康主管政法工作10年,正是冤假错案频发的10年。人们都还记得,2005年,好像是老天爷开了眼,将阳光洒向了人间,一批冤错案件被集中曝光。先是湖北省佘祥林“杀妻”案,继而是湖南省滕兴善“杀人”案,紧接着又是山西省岳兔元“杀人”案,接二连三的奇冤假案,竟然都是以“亡者归来”的方式闪亮登场:原先认定“被杀害”的亡灵,不约而同地回到了人间,它所带来的震撼是难以形容的。随后,河南省又于2010年曝出赵作海“杀人”冤案,其情节与佘祥林等被冤枉如出一辙:都是刑讯逼供的产物,又都是政法委“协调”的结果。它以雄辩的事实证明,司法不能独立,很可能酿成难以想象的人间惨剧。

过去,忌谈政法工作中的阴暗面,认为揭露这些阴暗面,就是给政法机关“抹黑”,甚至说成是“西方敌对势力的攻击和污蔑”。报刊上全是高调的赞扬,自我陶醉,粉饰太平。甚至吹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司法制度,是具有无可比拟优越性的司法制度”。其实,掩盖问题只会养痍遗患,比问题本身更有害。从近年陆续曝光的这些现代罕见的奇冤假案中,人们看到了中国司法制度中不光彩的一面,它所产生的冲击波迅速扩散,使司法公信力急剧受挫。

(四)与薄熙来互为表里,恣意黑打和迫害律师,严重践踏法治

众所周知,在薄熙来主政重庆期间,独出心裁地发动了“唱读讲传”运动,尤其是把“唱红打黑”作为宣示其政绩的主要标志。为此,特意把号称“打黑英雄”的王立军调到重庆,委以重任,直至提拔为副市长。二人配合默契,铁腕治渝,迅速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打黑”狂潮。

重庆“打黑”有几个显著特点:一是运动式执法,难免定性不准和扩大化。二是严重违反诉讼程序。例如,以批量化方式批捕、起诉和审判;公检法三机关不分彼此联合办案;嫌疑人一旦被拘捕,就以“保密”为由用编号取代姓名,不送入看守所另找地方关押,既不通知家属也不许律师会见。在这种完全封闭的环境中,刑讯逼供势所必然。三是限制辩护和惩治律师,要求律师“顾大局、守纪律,不纠缠细节”,等于要律师放弃职守,甚至对辩护律师治罪,李庄以“伪证罪”被判刑就是典型一例。四是以“大换血”方式对重庆警界原班人马“全锅端”,将市局和各区县公安局的各级领导干部全部就地免职,3528个岗位重新竞聘上岗,几乎是文革时“向走资派夺权”的重演,造成人人自危的恐怖局面。

这种不受法律约束的“打黑”受到广泛的质疑,许多有识之士对其负面效应深感担忧,指出重庆“打黑”已成“黑打”,其中最黑之处,莫过于公权滥用,为所欲为,形成对公众安全的最大威胁。

然而,周永康却对薄熙来这一套公然违法的做法全力支持。2010年11月,周永康专程到重庆,对“唱红打黑”给予全面肯定。他的表态使薄熙来大受鼓舞,薄熙来动情地说:“永康书记对重庆政法工作做过许多重要指示,尤其对我市‘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给予了重要指导,讲得很具体,意见很实在,使我们倍感亲切。”正是由于有了周永康的撑腰和鼓劲,更使薄熙来毫无顾忌地恣意妄为,以致酿成更为严重的恶果。

著名法学家江平教授,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他指出:“律师制度是一个国家法治的‘橱窗’,律师是法治理念的重要实践者和传播者。这个职业就是要为被告人说话。如果对律师都不能容忍,连律师都不让说话,那如何保证司法公正?现在针对律师的‘紧箍咒’太多了,到处设置律师的‘禁区’,对律师行业以及辩护权的冲击很大,表明了中国法治建设的倒退。”

综上所述,周永康主管政法工作10年,树起了

个人的绝对权威,然而在他的治下,宪法与法律的权威却不见了踪影。周永康对法治的破坏集中表现在毁坏了已经和正在形成的司法制度、审判制度和诉讼制度,尽管在口头上也常常标榜“严格依法办案”,但那不过是冠冕堂皇的幌子。在他看来,长官意志就是法,薄熙来之流更把“永康书记的指示”奉为法。他们的眼里根本没有宪法和法律,只有一人说了算的“王法”。正如邓小平同志批评的那样:“把领导人说的话当作‘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作‘违法’。”周永康所推行的正是典型的人治,学者们批评“中国法治建设出现大倒退”,并非虚言。

二、从周老虎入笼反思政法委的去留

过去多年,无论党内党外,无论官场还是民间,对于政法委的非议从来没有停止过。批评意见集中起来就是一点:应当改善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真正实行依法治国和依宪执政。随着周老虎的垮台,现在是到了应当认真考虑政法委去留的时候了。

由政法委员会统辖各级司法机关这一制度设计,举世无双,这个制度相当特殊,表现在:

其一,在历届党代会通过的党章中,党的中央领导机构除了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之外,只有“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十二大通过的党章曾规定有“中央顾问委员会”,作为新老交替的一种过渡,在完成历史使命后已由十四大宣布撤销。党章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中央政法委员会”这样一个机构。

其二,在建国后制定的4部宪法中,也从未设置过“政法委员会”。宪法只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并未规定在公检法之上再设一个专门机构来统管三机关。

其三,由政法委统辖各个政法部门,并以“党内联合办公”的方式对重大、疑难案件进行“协调”,决定案件的处理结果,这种做法是“以党治国”的极端方式,它违背诉讼规律,也有损党的形象,不但不可能保证司法公正,而且极容易造成冤假错案。

政法委员会是游离于党章和宪法之外的“潜形”机构,但又是具有极大权力的实实在在的机关。这

样的制度设计有利有弊,有利的方面是便于统一行动,提高效率,增强对犯罪的打击力度;其弊端是缺乏党章和法律依据,协调定案减弱了互相制约,容易造成冤假错案。实践证明,由政法委统管公检法三家,并不是加强党的领导的好形式。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要坚持党的领导就必须改善党的领导。他还特别强调:“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周永康落得今日之下场,再一次佐证了上述论断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周老虎入笼为政法委的改革提供了难得机遇。权衡利弊,从改善党对政法工作领导的角度考虑,应当切实贯彻“依法治国”与“依宪执政”方略,将没有党章和宪法依据的政法委员会予以撤销,从制度上保证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如果不革除体制方面的弊端,不着力推进法治建设,不彻底改变人治的传统,换一个人被提升到周永康那样的高位,还可能出现一人独断横行却被万人狂热吹捧的局面,如果只是把大老虎关进笼子,他的那一套衣钵却继续被奉为法宝,那么,中国的法治建设就没有希望。

对政法委员会统领公检法三家的体制进行改革,事关重大。考虑到现实国情,改革不能操之过急,应稳步实施,建议分两步进行:

第一步,撤销地方各级政法委员会(它们并不负责制定方针政策,主要是协调定案),只保留中央政法委(可改称“政法领导小组”),其任务是协助党中央研究和制定有关政法工作的方针政策;组织政法干警的培训和考核;防范司法机关和执法人员滥用职权。除了影响特别重大的案件(如薄熙来、王立军以及周永康之类)和部分涉外案件外,对于普通刑民事案件不再进行协调,以保证公检法机关依法各司其职,互相制约,避免可能发生的冤案,提高司法的公信力。

第二步,试行一段后,创造条件,在适当时机撤销中央政法委员会,使宪法规定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落到实处。

有步骤、分阶段撤销各级政法委员会,并不会削弱党的领导。各级公检法机关的首长和骨

刘英谈外交部的人和事

○ 何 方

张闻天夫人刘英同志,晚年人称“活党史”,也可以说是我的一位忘年交。在我放弃从事50余年的国际问题研究改行研究中共党史后,找她谈话、搜集和订正一些材料就是很自然的事了。我和她谈得最多的是中共党史中的一些问题。由于我和刘英是1950年底一同进入外交部、又同在部里工作近十年,外交部的人和事也是我们经常触及的一个话题。现在就把这一部分介绍如下。文内加方括弧的是我所做的补充或说明。

毛主席说,做外交工作要不说话少说话

1950年调我们到联合国代表团工作,我们就到了北京。总理安排得很细,说洛甫的房子还没搞好,先住颐年堂那边吧!中办主任杨尚昆就把我们安排到那里去了。住得近,毛主席散步就散来了,常来。我们有时也去看看他。有一次毛主席来看我们,当时闻天到胡乔木那里聊天去了。我找人去把闻天叫回来。毛主席说:我没什么事,就是来看看你们。闻天说,我没有做过外交工作。毛主席说:王稼祥告诉他,苏联人有一句话:“不讲话是金,少讲话是银”,别的我就知道了;外交我是不懂的,靠你自己去体会,多请示汇报就是了。在中南海住了两三个月吧,杨尚昆就叫我们去看房子,两处,一处是梅兰芳住过的四合院[无量大人胡同五号],那里一进一进的,不方便。一处是景山后街,只有一座小楼。我看中

了景山后街。

准备到联合国去,代表团的干部由外交部和中组部调。李一氓当副团长,刘贯一当秘书长,李克农当顾问。冀朝鼎管经社理事会,他是正代表,我是他的副代表。他是经济博士,对联合国的经济非常熟悉,他爱人叫罗什么[罗静宜]的,我和她关系密切,经常有来往。她也是专家,研究经济问题的,不久前才去世。冀朝鼎在美国待的时间长,用英文演讲,讲得非常漂亮,在雷任民那里的国际贸易促进会当会长。后来他和雷任民合作得不太好。雷任民不怎么重用他。对于从外国回来的人,他感到摸不准。

闻天认为搞外交的需要了解国内情况,就带了一些人到上海去看看。那时潘汉年是副市长,很帮忙的。饶漱石也是很客气的。闻天又叫大家学一些国际方面的东西,了解联合国各个组织的情况。研究联合国的东西研究得比较深。

在驻苏联使馆时,张闻天引起王稼祥不满和毛主席疑忌

王稼祥在担任第一任驻苏联大使后不久就劝闻天去接替他。后来他又向毛泽东反映了他的这个意见。周恩来也要闻天去做大使。我们一到大使馆就看到了王稼祥过去的工作情况。他有一个“孤岛论”,说使馆是远离祖国的孤岛,工作倒也没有什么,无非是送往迎来,有打麻将够一桌四个人就行了。实际上是他不安心工作,

干全是共产党员,各部门都设立党委以保证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没有必要在三机关之上再设个婆婆去干预司法,何况由一个于法无据的机构统管政法各部门,名不正,言不顺。撤销各级政法委,只是改变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方式,放手让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办案,表明执政党真心实意要

实行“依法治国”和“依宪执政”,从而取信于民,它必将加快我国迈向法治社会的进程,也会大大提高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赢得国家的长治久安。■

(作者为法学教授)
(责任编辑 黄 钟)



1986年7月1日在刘英家,刘英赠何方(右)索尔兹伯里著《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

认为在使馆不可能有什么作为。闻天到任后就批这个“孤岛论”。他批得透彻,是为了做思想工作,使大家安心国外的工作环境。王稼祥手下有一个参赞,就把闻天批“孤岛论”的谈话反映到王稼祥那里。王稼祥以为这是在批他,气得要命,又跑到毛主席那里讲闻天坏话,说他“左”。

[杨尚昆同刘英谈话时说:毛主席这个人非常多疑,后来洛甫到莫斯科当大使时,我想毛主席可能也有点怀疑。因为那个时候中央委员里头当大使的就是张闻天和王稼祥两个,而在王稼祥当大使同张闻天当大使时比较,苏联政治局对张闻天就比对王稼祥要重视,规格要高。你们回来的时候苏共政治局委员不是请你们吃了饭,送了东西吗?刘英说,莫洛托夫讲他是杰出的外交家。杨尚昆又说:当然洛甫同志都如实报告了,他并没有隐瞒这个。这就又联系到你张闻天是苏联培养出来的,王稼祥也是苏联培养出来的,为什么对你就比对王稼祥要好?所以为什么高岗的事情也把张闻天扯进去了。你大概不知道吧。刘英说知道,不是也检讨了吗?因为那时他去看他了。杨尚昆说:你看这里有个我们不知道的內部毛主席的想法问题。其实张闻天他去看高岗有什么关系呢?刘英说:就是嘛,他同高岗在东北一起工作,回国自然去看他,当时还不知道高岗出了问题呢。杨尚昆说:因为有个说法是,高岗那个时候反对少奇、反对总理,也可能这个毛主席的意思,是因为毛主席后来看到形势不对,他就反对高岗了。反正他对少奇同志既觉

得他是党内不可多得的人才,又觉得有些事情没有经过他。庐山会议以后,那时候我不是有时也跑到你们那里去看一看,去了我还要跟他(毛主席)报告,不然将来又说如何如何。毛主席问洛甫怎么样?我说情绪还好,他在做研究工作。在那以后,洛甫就是一落千丈,这个中间实际就牵扯着一个高岗,一个彭德怀这些案子。毛主席觉得张闻天在后头都起一定作用。反正我看他对这个事情是深信不疑的。]

闻天一到使馆就认为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我担任支部书记,就对留学生介绍国内情况。闻天在莫斯科抓学习抓调研,把大家团结了起来。他不是让你做报告,自己也去听吗?刘晓当大使后,就留恋闻天当大使时期的使馆情况。闻天回国当副部长后,伍修权[外交部副部长]还发通报说,苏联大使馆搞得好。第一次使节会议没有讨论大事,就是谈降低工资的事情。两位将军大使不同意降工资,说自己原来就是兵团级干部。伍修权很为难。结果驻苏联大使馆带头降工资,九级以上干部都降一级。张闻天降一级,我也从七级降为八级。所以伍修权表扬了驻苏使馆。

闻天当时每月拿4000卢布[按官方汇率等于2000元人民币],我3000卢布。我从来不买什么东西。我就是要买,闻天也不让。他自己用钱就是买书,每周同你去转书店,剩下的钱买公债。他一共捐了12万元给特别会计室。特别会计室是中办下面的一个单位,老同志的稿费等就交到这里,它也给老同志报销一些特别的开支。

周总理尊重张闻天

“八大”把闻天从政治局委员改成候补委员。事前同他商量说,因为要增加几个军队的人,林彪啊,刘伯承啊,还有个谁当政治局委员,要去掉现在的两个政治局委员:张闻天、康生。闻天说没有意见。康生表示谦虚,说最好连候补委员也不要。闻天说,康生还表示谦虚,我没有谦虚,组织确定了,怎么定的就怎么定,谦虚有什

么用？都已经确定了，政治局都开过会了，推也没有用，要也没有用。候补就候补吧！无所谓，不计较。

总理不兼外长了。他不提要张闻天当外交部部长，因为他知道毛主席不喜欢闻天。他提出让陈毅当，其实陈毅并没有干过外交。但是总理对闻天是很尊重的。他对闻天是又怕又有顾虑。闻天过去是同他一起搞领导工作的，他知道闻天写东西、搞哲学和马列主义，都高一头。所以他对待闻天，不像对待李克农这些副部长那样。总理和毛主席一样，晚上办公。闻天说：我要熬夜，明天就起不来了，白天就不能上班，我是按时上班的。闻天这个人是很守规律的，说几点钟起床就几点起床。我没有起床，他就喊我：快点快点，要走了。他上班从来没有迟到过，规定几点上班就几点上班。在外交部时早上8点上班，他按时到。乔冠华、龚澎、章汉夫就常常迟到。他下午2点开会，1点半他就催我快起来，2点准时开会。他说，自己规定的制度不执行，那别人怎么执行啊？

对于总理夜里办公，他并不佩服。他说，难道晚上不睡觉才有效率吗？为什么白天不工作，要晚上干？周总理是要适应毛主席[刘少奇也是如此]。白天睡了，晚上当然熬夜；晚上睡了，不是就可以在白天工作了吗？各个部门都是白天工作，白天请示汇报，事情运转得快；晚上工作，许多部门都关门下班了，你一个人工作，找人要把人喊醒。后来总理也知道洛甫的习惯，半夜有事先通知章汉夫，第二天再转告洛甫。后来总理开外交部的党组会，好多次都挪到下午2点钟开，不再那么晚才开会了。他说：我现在不开晚会，因为有些人（指闻天）熬不了夜。总理对闻天有点迁就的意思。

总理对我也很宽厚。他是重用我的。1954年11月，周总理打电话到使馆，说外交部要加强干部工作，先调刘英回来。我一回北京就上班了，当部长助理，副部长待遇。还派给我专车，我后来没有要。

干部工作、政治工作过去都是李克农搞。李克农的工作作风是大刀阔斧。我回来时，李克农已经离开外交部，我还是到他那里去请示工作。我向他请示，当部长助理是不是不要再兼干部司

长了。他说：要兼，兼了才有直接的权力；外交部要整顿，邪气要整一整，不然干部是调不动的，说龚澎“娇得很”！什么乔冠华、龚澎都碰不得，都是周总理讲了才算。他支持我做工作。

外交部副部长太少，分工搞不过来。[中组部管外交外贸干部的]帅大姐[帅孟奇]几次提出，应该提我，说当年在莫斯科留学的几个女同学，只剩下刘英没提了。闻天准备提乔冠华、曾涌泉和我三个人。安子文批了同意，帅大姐告诉我可以向上报送。干部司于是写了报告，但是被闻天压下了。他要先请示总理。总理好久都不批。问张彦[总理办公室主任]，张彦只说总理还没有批。后来总理对闻天说，此案不批，因为张闻天是常务副部长，如果刘英是副部长，对外不好讲。对刘英不当副部长，闻天没有意见，后来只提了曾涌泉。陈毅当部长后，给闻天写了一封信，说周总理告诉他，刘英还是应该提副部长，可以采取两种办法：或者当个不对外的副部长，或者党委设常委，刘英当常委。闻天把这封信拿给我看。我说，我什么都不要。闻天把我的意见告诉了陈毅。庐山会议后陈毅来看闻天时，见我在里屋待着不出来，就说刘英你怎么不出来？我出来了，但一言不发。他对我说：你这个大姐，我对你的印象还是好的，你就是个态度问题，就在会上听听意见，说说你有什么问题吧。他对我的印象好，指的就是我什么都不要。

给总理提意见

[我谈到柯华写文章，不点名地诬称闻天同志反总理。]根本没有这个事。当然，闻天也谈到过总理的一些问题。总理不兼部长，陈老总当部长了，就到我们家来征求闻天的意见，说你对过去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当时他们两个谈得非常投机，兴高采烈的。闻天说，你当部长，当然很好，我很欢迎；总理太忙了，总理管得太宽，忙得又顾不上，所以你来了好；至于工作，大家一起做嘛。陈老总问闻天，对总理过去的工作有什么意见，你也可以提提。闻天提了些意见，说：总理过去管得宽了，小事抓得紧了，大事丢掉了，对外交方面比较重要的问题找他批，要排队。他每天早上起来，那些有分工的秘书，管外贸的、管文化



何方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张闻天与刘英》影片开机仪式上同扮演(自左到右)彭德怀、洛甫和刘少奇的演员谈党史,1999年。

的,都排队等着总理批文件。负责我们那一摊的是陈浩。我们催陈浩,她说没办法,排不上。总理晚上不睡觉,我们吃中饭了,他才起来。人家笑说他从坐在马桶上起,就开始办公,大家这时也就到厕所里去排队了。[我说这不是玩笑,是真的。闻天同志也来过一次。那次要批的是我管的事情,所以我跟着。闻天同志不排队,叫我到厕所里去排队。]有一次我看见廖承志他们在排队,他问我为什么不排。我说我是来开党组会的,党组会都要找总理一起开。还看见周扬、雷任民、范长江他们,一排一排地坐着。我说:你们坐在这里干什么?他们说:排队嘛!雷任民在背后就跟我发牢骚说:我忙得要死,一个钟头还没轮到我,他不批我又不能走,我们得等他起床,吃饭。

那次到了要开会的时候,总理和他们说,不谈了不谈了,我们要开会了。把他们都赶走了,我们就在西花厅开党组会。这次会开得很及时,总理很重视。有些问题他管得宽,干部问题也要管,政策问题也要管。他管政策问题,但不能最后做决定。外交工作,总理直接向毛主席请示,他是完全顺着毛主席的。总理把毛主席的话都当成圣旨,总是改变自己的主张。但是毛主席又没有研究。所以外交工作很被动。反“反冒进”后,总理在什么会上都做检讨,闻天说你不要老

是检讨。但他还是检讨。

关于释放被俘美国人的问题,同英国建交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在部里是有分工的。主管的乔冠华他们都是很有才干的。闻天非常赞成他们的意见,同意放美国俘虏,和英国建交。在会上,总理也是同意的。但他什么都要听毛主席的。跟毛主席一汇报,毛主席说:俘虏不能放,一个也不能放,放了,我手里就无牌可打了。结果总理从毛主席那里赶回来,马上又召集会。闻天最讨厌半夜三更开会。这天,半夜1点

钟来电话了:开会。那只好去呀。总理说:主席不同意,政策要改变。结果弄得乔冠华、张闻天灰溜溜的。对这些,闻天是有意见的。他认为我们是在认真研究材料的基础上提出的意见,怎么毛主席一句话就改掉了?他觉得这样不合适。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政策,不能完全由一个人说了算。他后来跟陈毅讲了这个意见,把这个例子也告诉了陈毅。陈毅很同情。陈毅这个人很开朗的,说:周总理这个人我了解,他什么都要抓,一个人哪里管得了那么多。

有一次我去西花厅开会,跟邓大姐聊了一聊。她和我老关系。她叫我小杰,我本来叫郑杰嘛。她和我讲:你跟胡子[指周恩来,那时他在中央苏区和长征中不刮胡子,他的胡子又长得很长很密,所以大家叫他胡子]讲一讲,叫他不要管得那么宽;管那么宽干吗呀?叫他少管一点,各部的力量都很强嘛,为什么不要各个部去管呢?他的身体实在是不行了,晚上不睡觉,这样的话就要垮了;你跟他讲一讲;我跟他讲过好多次,他都不听。

我就去找总理,说:我有意见跟你提。他说,你提呀。我说:是邓大姐要我讲的,你管得太宽了,使你的健康受影响;你少管一点,各个部门就负责了。总理非常谦虚,说:健康有什么关系?人就是为了工作嘛!工作不管,行吗?昨天我没

有管到,那个杨刚[总理的新闻秘书]就出事了。报纸看了吗?你看这条新闻就错了。他讲得有根有据的:不管行吗?我说:总理呀,这条新闻出了错,但你管得那么宽,也不一定都不出错。你叫她以后注意嘛,这也是锻炼人哪,你管得那么宽,事情也不一定都办得对。总理说:那不行,不管不行。

闻天对总理这种做法有意见,就同陈毅讲。我对他说:你不要管,你管这个没有用的。我了解周恩来。几十年了,我了解他。向忠发当总书记的时候,实际上负责任的是他。向忠发倒好,净去玩儿去了。湖南的事本来是由李维汉和李立三负责的,但是周恩来也管了起来。他是包办惯了的。在白色恐怖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他管得很仔细:哪个机关要被破获了,哪个电台得搬到哪里去,都管。夏之栩被捕了,其他人要转移,也都是他亲自去指挥。大的事,各省的事,他都安排。所以大家都对他很有好感,他很负责的。他不是一个人跑掉,而是把有危险的这些人都管到了,保护了好多人。讲公平话,他这个人是很不错的。

所以说,周总理管得很细致周到,这是优点也是缺点。他负责,有的人就不负责。像姬鹏飞,能推就推,什么也不管,说去问总理吧。结果把总理累得要死。闻天是个书呆子,看不惯这个。他说事情要交给各个司去管,该礼宾司管的事让他们去管。

在长征路上,刘伯承,还有很多人都跟总理不合拍,看不惯周恩来的做法。刘伯承那时跟闻天能谈到一起,说:恩来管得太多了,我这个参谋长管的事情他也管。你看他那个本子,连背行李有几匹驴驹子都记着账,大小琐细的事都管。累得他写字的时候都打瞌睡,字迹就成了一坨一坨的,要让人猜都是些什么字。可电报还是要亲自写,这个怎么能行?对他这种作风有意见的,不是一个人几个人。

李克农和闻天谈得来,也知道总理是负责任的,但是过分了。闻天讲,总理事务主义,连西瓜带芝麻都捡,应该是抓住西瓜丢掉芝麻嘛。而且各个部门都有人。李克农这些人都是很强的嘛。什么都干涉,让别人不好工作。

所以陈毅来,闻天很高兴,说你来了好,我们

可以配合。陈毅很积极,说:那就开个会,我们给周总理提提意见。部里的务虚会就是这么来的。陈毅也是好心。提意见,张闻天当然带头了,大家也提。提了以后,陈毅就把记录拿给总理看。总理一看:对我有意见的人有这么多?他很注意看哪些人发了言,就在西花厅召集个党组会。我是党组成员,乔冠华他们不是成员,是列席的。总理说:提意见的记录都给我看了,好啊,大家提提意见好啊,我看见还有几个人没有提意见,一个耿飚,一个黄镇,一个刘英,你们三个人也都提提。结果他们两个都不肯提,说才从国外回来,没什么意见。他们不敢提,也不好提。总理说:刘英同志工作时间很长,应该提呀。我说:对,我同总理一起时间很长,[19]28年就同总理熟悉了,总理工作的精神我很佩服,任劳任怨,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什么工作都是他顶下来的。现在工作也是这么繁忙,健康都受损失了,所以我这次没提什么意见。现在总理管得宽一点、多一点,有人有意见,因为有些人确实不好工作。总理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意见。我呢,对总理没什么意见,干部问题跟总理商量,都是党组会讨论的,他也很听意见的,我没意见。

这次提意见,本来是帮助总理,没想到帮助不大,反而引起总理反感。提意见前,总理和闻天是很好的,在这之后,两个人就有些疙瘩了。

闻天反对大吃大喝,说宴请要简单些,这就同周总理有矛盾。周总理觉得中国是大国,要吃得,要吃鱼翅海参,每次宴会都要上茅台,表示中国的气派。在这个问题上,闻天和周总理两个人不合拍。总理就是好排场,这同他的官僚出身有关。当年他就要我带头穿绸缎。闻天说:吃东西不一定要吃得太好,外交工作主要靠政策,不讲吃,吃得再好,要反对你还是要反对。不一定要用茅台,茅台那么贵。闻天是节省惯了的,也是太节约了。我说:这钱也不花在你身上。闻天说:没必要一定要喝茅台啊!菜搞那么多,吃那个海鲜,你觉得很高贵,人家还害怕有河豚呢!外国人吃熊掌这些觉得害怕。这些小事,闻天不管了,让姬鹏飞管,姬鹏飞也不管了,叫礼宾司管。那时我们在东南亚,不在北京。萧扬[张闻天的政治秘书]在北京,给我们写信说,总理讲了,没有茅台,我出钱。在党组会上对总理提了

意见,总理做了点检讨,但也做了一些解释。

闻天对外援也有意见。说,人家上层一变,对这个国家援助的影响就完了,实际收获不大。闻天在外交部做一些事,毛主席是不听他的意见的。

外交部反右派

反右派的时候,闻天不在部里,到东南亚去了。定右派是姬鹏飞、章汉夫搞的,总理没有插手。闻天从印尼回来,一看搞了那么多右派,就说不要搞那么多,要搞少一点。龚子荣讲,外交部搞右派搞得太少了。后来机关党委叫去汇报,他们说我们定的右派不够比例,规定是5%。部里反右派,后来让右派下去劳动,这些都是经总理同意的。闻天的意思,外文好的知识分子不要到下边劳动,叫他翻译东西,说这就是劳动嘛!这样外文不会丢掉,又可以锻炼他们。不要去搞那种劳动,这些人搞那种劳动,身体是吃不消的;另一方面,把外文也丢掉了,闻天是非常重才的。

庐山会议后受到批判

1959年庐山会议之前,闻天去看望正在住院的陈毅。陈毅说,两个政治局委员,去一个人开会,一个人看家。我身体不好,在家,你去开会。

闻天去参加庐山会议,本来准备谈的是国际问题的意见,但是后来谈了大跃进问题。我那时正在北戴河。有一天张茜和我说,告诉你一件事,你不要紧张。昨天闻天给陈毅打了电话,说犯了错误,缺点讲多了。陈毅说,缺点讲多了有什么?不要怕。

我对闻天犯了错误感到震惊。我说,庐山会议,人家不讲,你去讲什么呢?我埋怨他。明明毛主席对彭德怀有一肚子意见,总是要发泄的。彭德怀讲了,你还要讲。胡乔木也打电话来打招呼,你还讲什么?他说,我不讲能行吗?国家要垮。我说,国家要垮,靠你一个人能行吗?

庐山会议后,陈毅到家里来和闻天谈话。陈毅对大跃进也有看法,认为许多事是假的。他说,他本以为闻天是在国外问题上出问题,没有想到是在国内问题上出问题。

批判时闻天住院去动手术,陈毅到医院去看

他,说:告诉你一点消息,主席请彭德怀吃饭,我也去吃了这顿饭;彭德怀讲了三点,一不自杀,二要求下去劳动,三什么的;主席对彭老总说,也许你是对的。陈毅对我说,刘英,这个话你不能往外讲。我是政治局委员,闻天也是,我们之间讲的话,你不能往外讲。

闻天住了院,我在外交部首当其冲,被重点批判。韩念龙叫萧扬来家,交出钥匙,不准萧扬再来。当时我很寒心。闻天平反后,韩念龙在医院见到我,对1959年的表现也表示内疚。

外交部那时候党的工作是罗贵波管得多。陈毅没有怎么管。

罗贵波、姬鹏飞他们批判我态度不好,说我和闻天划不清界线,要给我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在整我时主要是关于人事问题,说我把何方这些亲信在几个司里安点,说外交部搞了一个所谓宗派。对这一点,斗争一开始时还比较公正,姬鹏飞就不同意说我们搞宗派。龚澎也说,一个政治局委员要搞宗派,也不是和自己手下的几个干部搞。搞着搞着就不行了,后来硬是说我们在外交部搞了个宗派。闻天一直心里不安,曾对陈毅表示过,说我犯错误,不应该牵涉这些人。

闻天出医院以后,陈毅又来家里看他。对闻天说,好多人揭发你,秘书们揭发你的材料,要不要拿来你看看?你也去外交部讲一讲。闻天说,我什么都不看,在外交部里没有什么好讲的,我就是在庐山犯了错误。陈毅说,那好,你好好养病。

外交部批判我后,我就给杨尚昆打电话。杨尚昆说,哪个不了解你?少奇同志就说,刘英没有什么问题。这又不是什么株连九族,闻天是闻天的问题。他要我写信,说他可以夹在文件里转给毛主席。

我给毛主席写信,说从长征开始一直到现在,我向来拥护毛主席,是毛主席通知让我离开苏区参加长征的,我对毛主席从来没有反对过,向来是爱戴的。我和闻天的政治经历不同,从来是听党的话,服从领导,没有什么自己的独立见解。不能丈夫有什么错,老婆就犯什么错误呀。我和他不同,又不懂经济,过去也没有犯过什么错误。信后还附了个说明,对所谓我诬蔑攻击毛主席的揭发材料做了解释。

那是[19]49年春天开妇代会,毛主席在香山接见妇女代表,之后我自己又去看望毛主席。毛主席看到我高兴得很。我问:毛主席的身体怎么样呢?江青说:他现在不太好,从重庆回来以后看见生人手就发抖。我说:那我在这里坐这么久谈话,行吗?毛主席说:你又不是生人子!江青说:他还希望你来跟他随便聊一聊呢。江青特别优待,把油果子、黑枣什么的都拿出来,让我吃。毛



2000年8月30日纪念张闻天诞辰100周年,自左到右为宋以敏、何方、李海文、刘延东。

主席说:她不满意呢!说我大树遮了她的阴。我对江青说:你照顾毛主席这个任务,别人还代替不了呢!你这个工作比什么工作都重要。毛主席说:你看,刘英讲了,你这个工作最重要了!我记住了这次谈话,后来使馆讨论毛主席想退居二线搞理论的时候,我就在支部会上讲:这倒是好的,我赞成主席到第二线,不见外国人也好,就举了毛主席见了生人手抖的例子,还说了现在见生人手已经不抖了。苏联使馆的一个同志1959年揭发了我说的这些。不怪他。他不揭发过不了关啊!只是他讲了这件事,别人就上纲了,说我反对毛主席。我就要求毛主席回忆有没有这件事,好替我做个证明。

毛主席还是实事求是的,他要是不讲一句话,我就完了。我的信毛主席批了,大体上是说,刘英应该同张闻天区别,她同张的问题不是一样的,这是我的意见。陈毅批同意主席批示,外交部党委由我去做工作。周总理批同意主席批示和陈毅所提做法。少奇、小平都圈阅了。毛主席的批示发给了外交部和中组部。外交部不对我说毛主席有批示,但是杨尚昆、安子文、乔明甫、帅大姐都对我说,毛主席批了,叫我放心。陈毅后来对杨尚昆讲,毛主席有批示,我不好找刘英说,你去找她谈谈。杨尚昆就找我谈,要我放心,不会划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杨尚昆非常公正,说你[指刘英]又没上庐山,有什么问题?

我就去问姬鹏飞,他说不知道。这是违反组织纪律的。问章汉夫,也说不知道;再去问罗贵波,他最凶,说:谁说的?不可能。我知道毛主席的意见后,就不再理会外交部,随他们去弄吧。毛主席批的意见压了20年我才看到。

罗贵波在“十四大”时,他和我同桌吃饭,说要来见我。第一次来时,正好有许多干部子弟在场,罗贵波就说下次再来。我知道他有话要谈。再来的时候他就谈他自己受冤枉,抓“五一六”抓到他,说他批准火烧英国代办处,要我帮他到组织部去说说,为他平反。我说,我也没有得到平反,还不是张闻天的事一平,我也就平了。罗贵波还不甘心,又要李涵珍[罗的夫人]来说。我不了解外交部的文革。我被拉到外交部陪斗时,他们喊“打倒陈姬乔”。我还以为这是一个什么人呢,我搞了那么久的干部工作,怎么不知道有这样一个人啊?我也不了解罗贵波在文革中的情况[她确实不了解,不知道“五一六”是怎么回事,更弄不清外交部“打倒罗(贵波)、徐(以新)董(越千)”是怎么回事],只好劝劝他:你不是已经平反了吗?

运动最后,没有给我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定了个严重右倾。1962年又把处分改为严重警告。因为八届十中全会后张闻天又受审查,这次改变处分没有同我本人见面。直到这次平反时才讲了甄别时曾经修改处分,没有和本人见面这

些情况。

开外事会议斗张闻天,主要追两个问题:为什么从苏联回来劲头那么大?是里通外国?与彭德怀是什么关系,开过什么反对毛主席的黑会?查闻天的“里通外国”,闻天和郭肇唐的关系成为一个大问题。闻天说,康生这个人厉害!郭肇唐是他介绍来的,就说同我有牵连。郭肇唐[又名郭绍棠]本来在红色教授学院教书,后来挨整,吃了好多的苦头。他1957年来中国访问,由孔原招待。孔原就请我们几个中大[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作陪。郭肇唐和孔原讲,他不认识刘英,但是认识她的爱人张闻天。孔原要我告诉闻天,好好招待招待郭肇唐。我向闻天转达了。郭肇唐又去看康生,也说想见张闻天。所以,是康生让闻天见郭肇唐的。张闻天见了郭肇唐,给了他一些公开资料。批斗闻天,李井泉、柯庆施也很左。闻天说,别的错误都可以承认,唯有这个“里通外国”,怎么斗,我也没有办法承认。他们要我揭发,我说没有什么可揭发的。彭德怀是直脾气,从来不搞阴谋开黑会。说闻天“里通外国”,是他最无法接受的。

张闻天离开外交部去经济所

1959年倒霉以后,闻天先找小平同志,小平说可以研究国际问题;又去找少奇同志,少奇同志说还是暂时回避国际问题,可以搞经济问题。闻天还是愿意搞经济问题的。富春非常欢迎,说我们这些人搞实际工作,你来可以帮大忙,我们欢迎搞经济理论工作的,这样可以把经济工作理论化,搞得更深一点。他说,你来还可以参加党委。可以参加党委,闻天高兴极了。几天没消息,过后李富春回了信,说很抱歉,没批准。后来他就去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没有参加党委。我就被分到近代史所,没有任何职务。我就借些书来看,参加支部会。我没有车,每天都走路去。

闻天在经济所每天看书做卡片,写的文章就经过杨尚昆送给毛主席。毛主席先还看,批给政治局同志看,后来不看了。在经济所,李泽中当过闻天的助手。他住在我们家那个小房子里,帮闻天抄抄写写,常和闻天在院子里散步,谈些问

题。真正提供材料、谈些问题的是李泽中。闻天很赏识他,说:你这个人老实,品质很好。他等于是孙冶方[经济所所长]派来的。本来要派孙尚清,孙尚清不愿意来。孙冶方是闻天在莫斯科时的老同学,闻天很器重他。他和孙冶方谈得好深。孙冶方常来我们家,一谈就谈半天,都是听闻天讲。他说:你在理论方面,在辩证法方面提高了我们的工作。他们要搞政治经济学。结果康生、林涧青告了状,说孙冶方亲张闻天,搞什么价值规律。

1964年康生说,批孙冶方吹利别尔曼,为什么不批张闻天?根据就是张闻天参加了孙冶方起草的政治经济学大纲。经济所批孙冶方时,实际上就已经在批闻天了,只不过闻天自己那时并不清楚。有一天他告诉我,他去经济所时觉得许多人见了面都跟过去不一样了,表面上都很客气,实际上别的什么都不谈,孙冶方见了他也是客客气气。他看到书架上也改变了样子。他就弄不清楚究竟是为了什么。我从历史所范文澜那边多少知道一点风。一次我同我弟弟刘彬谈话时透露了我的担心。我说,闻天一直不停地写,不要将来再出问题啊。刘彬说,学术问题没有什么关系,历史将来是会说话的。不过他建议要多写点毛泽东思想的东西给上面看看,于是我转告了闻天。闻天就写了一些关于毛泽东的哲学、军事思想的文章。

杨尚昆1959年后对闻天还是照顾的。生活上不变。还是用专车,到供应站买东西,每年主动安排他到青岛休养,来去挂公务车。1965年,他被调到广东,由汪东兴接替,就不行了。专车取消了,煤也没有了,只好烧个炉子。闻天专门写了一封信,说没有煤,暖气管要冻坏的。这样才拨了2吨煤来。

长征时是苦,但是精神愉快。1959年后精神压力大,比肉体上受苦要苦得多。庐山会议后,我们很孤独,连我弟弟都不肯来看我们。因为我受闻天连累,所以他总是照顾我。我不快活,他就领我到公园去走走,连下雪天也要散步。把小倩领来养也是为了调剂一下生活。我们两个是工作的伴侣,患难的夫妻。■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责任编辑 黄 钟)

“休闲江青”与“毒药事件”

○ 周淑英、赵柳恩 口述 阎长贵、李宇锋 整理

养狗、骑马与摄影——“休闲江青”

周淑英(以下简称周):养狗也是江青“休息脑子,转移一下”的内容之一,她说狗最忠诚于它的主人。她养的狗是从部队农场选来的,都不是名犬。江青起名叫“小黄”的狗养的时间比较长。狗从农场进了楼房也不习惯,在楼里地毯上拉屎撒尿。江青到17号楼看电影也带着狗,那里地方大,狗在哪儿拉、尿,人们也不知道,每次都是闻到臭味才找到打扫。搞卫生的同志很无奈,处理地毯上的狗便真是窝囊死了。

李宇锋(以下简称李):那养狗吃的就是从食堂拿来的东西?

赵柳恩(以下简称赵):主要吃她剩下的饭菜。楼里人也从食堂给它带点儿剩饭。

江青不允许别人喂,她要掌握对狗的饲养权,对此我有段刻骨铭心的经历。1971年的一天江青吃饭后让我把她的剩饭留起来,等她开会回来再喂。我把剩饭放在楼外门口用碗扣好。江青回来喂狗时发现饭没了(其实是小黄溜到门外吃光了),非说是我喂了。别人告诉她我睡觉了。“睡觉也把她叫起来!”我实际上没睡,我哪儿可能睡啊?就在大厅进门那地方,她就问我:“你是不是喂狗了?”我说没喂。“那为什么狗食没有了?”我说我放在门外面可能它饿了就吃了。“你肯定是喂了!”就开始喊起来了。接着气势汹汹地让我们所有工作人员站成一排,把狗抱到远处突然放开,看狗跑向谁,以验证谁喂了狗。江青这是让狗指认人,小狗不但没跑,反而转过身对着江青摇尾巴。气得她把狗这么一下抱起来,“你不是喜欢小狗吗?”啪,就扔到我身上了,“你跟它一块儿给我滚出去!”

周:江青恼羞成怒,深夜2点就要赶小赵走。她说:“小赵喂狗讨狗的喜欢,这狗我也不要

了。把小赵和狗一起送到农场,让她和狗住在一起!”还要立刻就走,说不走她睡不着觉。侍候江青入睡后当时已是深夜,我离开江青卧室哭着回到门厅,把江青的话说了一遍。大家对江青的做法很气愤,可敢怒而不敢言。老杨和大周商量并请示汪主任后,悄悄把小赵藏到17号楼的一个房间里。之后我和大周去看望小赵,她一个人孤独躲在房间里,委屈和屈辱使她泣不成声。大周还把半导体收音机拿给她听,希望能缓和一下她的情绪。

赵:约一周后大家看江青气消了就说农场都是男战士我在那儿不方便,江青也感到一个护士不够用,这才同意让我回来。这事报告了汪东兴,他让我先去农场一趟熟悉那儿的环境,以防江青问起农场情况我答不出来。之后秘书开车带我去农场转了一圈。我重新回到10号楼后,江青并没有询问农场情况,也没说一句合乎人情的话。

周、赵:我们曾戴着红领巾在阳光下成长,受的都是正面教育,江青的作为令我们非常愤慨、不解。论职务她是政治局委员,我们是普通党员;论年纪她是长辈,我们是小辈。她经常迫使我们做违心的自我批评,而她却肆无忌惮不受任何约束。真是欺人太甚,公理何在!

周:除了养狗,江青还喜欢骑马,这与在战争环境中,马是主要交通工具有关。她有一张1939年在延安,由斯大林摄影师罗曼·卡曼拍摄的她骑在马上回眸一笑的照片:她穿着军大衣,头发是两边编好用丝带束在头后,骑在马背上,身体前倾,回头那么一笑。那年她25岁,很年轻。她非常欣赏那张照片,翻印了不少送人。江青兴奋地讲起战争年代的一些事,她说她骑的马很通人性,一叫“马儿”它就乖乖地走过来,从不摔主人。夜间行军时马绝不嘶叫甚至连响鼻都不打。

江青想到了要骑马,就从部队借来几匹训练有素的军马。她看到马以后,情绪显得特别欢快,温和地抚摸着马的颈部背部。她骑术娴熟,50多岁的人,在左脚放进脚镫后能一跃上马。在大草坪骑了好多圈。她还教工作人员骑马技术,如脚掌只能前1/3放在马镫上,脚进去多了到脚踝处就危险了,摔下来脚被马镫挂住人就会被拖死;拉马缰绳使马行走变慢,拉紧马就会停下来;两腿夹紧马肚子,马行走速度会加快至奔跑……讲解后她让警卫二处和身边工作人员都骑一下,结果二处一位警卫人员从马上摔下来,腰都摔伤了。江青还支起三脚架拍照,她也给我照了一张骑马的照片,她设计了我背着药包,骑马在奔跑。因为马跑得快,照片上的人有点虚。第一次骑马我很紧张,在照片上都能看出我害怕的样子。这次我看到了江青从没有过的好心情,感到骑马对调整她的情绪是有效的,也就是她所要求的“转移”起到了作用。也可能是她又找回年轻时骑马驰骋在延安土路上的感觉。

赵:她去颐和园(那时颐和园等许多公园都不对外开放,群众是进不去的)、八达岭,也带着马去。有一次她竟要在颐和园的长廊里骑马,警卫员急忙劝阻:“那可不行!磕了脑袋怎么办?”她才作罢。江青去北戴河和其他地方,也常带着马。马是挂在火车后边一节运货车厢带去的。江青去定陵时参观了展馆,当天我们两人和其他随员都在场。她只是观看了展品,没有像有人说的她把凤冠戴在自己的头上,对此应说明真相。

李:周老师,说到江青给您照过相,她照相可是行家啊。

周:江青很喜欢摄影,她给身边工作人员和许多领导都照过相。她说当年在苏联养病时,医生为了使她的情绪稳定,建议她用听音乐、摄影来调节生活。从那时起她开始学摄影,曾请石少华当老师,给她指导。她拍照前要先用测光表测参数,用光十分讲究,如顶逆光、侧光,有时还要使用滤光片。摄影数据都要做详细记录。

赵:江青总叫小周给她记录光圈、速度等数据。

周:她喜欢照花卉。有一次她照迎春花,还为这张照片题了一首诗,那意思就是这迎春花啊比较低贱,不是高贵的花,就像一个小丫头一样,不被人家所重视,但是很坚强。她说这个挺像她的。

李:是旧体诗吗?

周:我能看懂,不是旧体诗。后来她又到景山、北海等公园拍牡丹、芍药,还让我们往花上滴水,制造露珠的效果。

有一次在天坛,到了那花房一看呢,有很多兰花,公园负责人介绍说有些是朱老总养的兰花(朱老总喜欢养兰花,但是文革中,好多兰花都送给天坛公园了)。江青看了说“这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不能养那个”,很快就出了花房。

《月夜哨兵》《提高警惕》都是在钓鱼台夜间拍的。拍摄对象是警卫二处干部和警卫战士。江青既要突出人物又要顾及月亮,所以用光很讲究,除了主光还采用了辅助光,相机打开B门,深夜用了几个小时才拍好。那期间她发表照片所用的笔名是“峻岭”或“大海”。

赵:江青还照过西郊机场、杨村机场的飞机飞行表演,叶群和那“四大金刚”(整理者按: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去了。她照相的花费也不少,如购买进口胶卷、照片放大冲洗和相纸费用等。为了还钱,经主席同意从他稿费中拿出些钱来。

毛主席有不少好照片都是她照的,有些公开发表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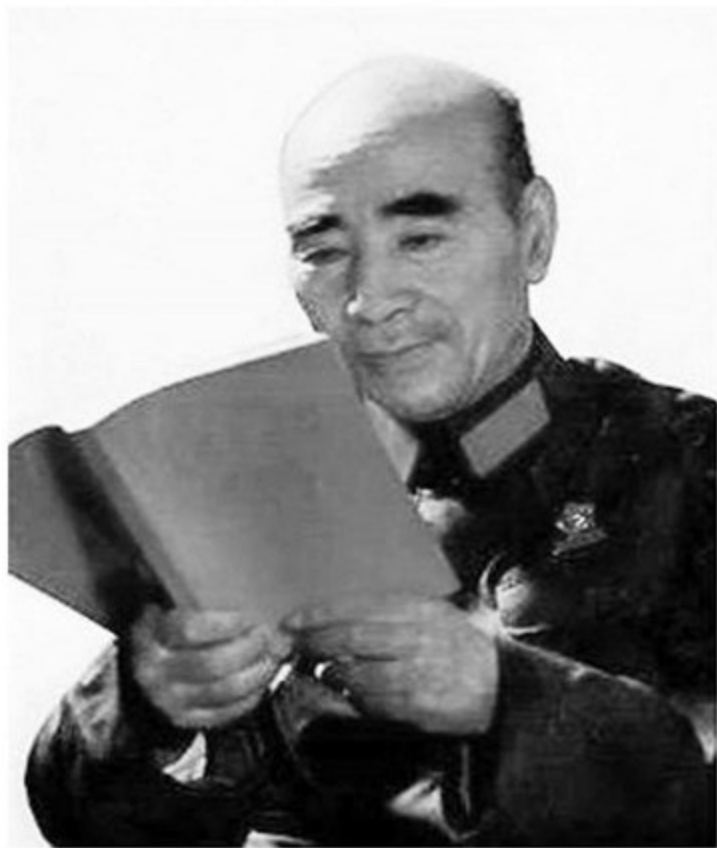
周:从洗印出的照片和发表的照片来看,江青的摄影技术还是比较高的。一些内行的人也是这么认为,我看这是有原因的。

一是摄影器材好。相机是德国造的,胶卷是伊斯曼的,灯光是从新华社借的,洗印照片在新华社。这些在当时都属于顶级器材和最好的技术。

二是老师好。石少华、吴印咸以及毛主席身边的摄影师都是国内一流的,由这样老师亲自讲授指导,是提高技术极好的条件。

三是江青照相时很专注,白天光强取景时用蓝色丝绒布蒙着头和相机,时间长了头发都被汗水湿透了。她也很讲究用光技巧,采用顶逆光、侧逆光、侧光等,在小样片印出来后,她把每张小样片与拍摄参数进行对照,以利于提高技术。还在小样片上画出取材范围,再拿去放大洗印。

四是拍照选材内容丰富又特殊,如庐山仙人洞、海南岛高炮阵地、西瑁岛女民兵、海军快艇乘风破浪、空军机场腾空而起的飞机、景山公园里的牡丹和芍药……江青有她得天独厚的条件,她



江青为林彪拍摄的照片

可以进入军事要地要求高炮发射,进入机场拍摄飞机腾飞,进入文革中尚在关闭而老百姓不能进的公园拍花卉。在那个年代这一切全国只有江青能办得到!其他人,哪怕技术再高超的摄影师也无能为力。

五是工作人员配合得好,按江青的要求我们动手摆放灯架,打出主光和辅助光。至于花和叶片上的露珠,也是我们细心地滴洒。有时人手不够,警卫二处的人也一起干,时间长了配合得也都熟练了。像《提高警惕》中的警卫战士,深夜趴在草丛中,睁着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坚持配合了好几个小时。

周、赵:1971年,江青还吩咐把钓鱼台17楼的一个房间布置成照相室,摆上照相设备给许多人照相。我们目睹了江青为林彪拍摄《孜孜不倦》的全过程。1971年夏天,江青邀请林彪、叶群到钓鱼台照相。几天后叶群来了,她说:“让江青同志久等了!林副主席感冒来不了,您就给我照吧。”江青先在室内给叶群照,然后又到室外拍。叶说:“我眼睛小,不上相。”江建议她往前上方看,镜头仰角拍。叶群见到照片后很高兴,说照片上她眼睛大了,人也年轻了,是她一生最好的照片。

6月初,林彪过来照相。他下车时,被帽子大衣包裹得很严实,还用毛巾捂着嘴和鼻子。他告诉

江青前几天身体不好没能来,还夸江摄影是内行。

林彪的胡子很长,在叶群再三劝说下才刮净胡子。江青先用测光表在林彪面前测光,又让他双手捧着《毛选》做阅读的姿势,江青手握快门线,低头看取景器,刚要按快门,突然抬起头来说:“一大疏忽!快摘帽子,在室内学习,哪能戴帽子?”林彪迟迟不愿摘,江青说:“要拍得真实些嘛!”一边亲手摘去林彪的帽子,而林彪是很不情愿的表情。在这二三十平方米房间里江青采用了她照人物最喜欢用的顶逆光,江青认为这样用光人物轮廓好、面部光柔和。林彪姿势是低头看书,我们第一次近距离看到不戴帽子的林彪。灯光下,他的头皮坑坑洼洼,有几根稀疏的毛发。事后我们两人私下议论:林彪在战争受过伤怕受风,公开场合从未见他摘过帽子。全中国也只有江青才能在林彪本人不情愿的情况下摘掉他头上的帽子!我们还清楚地记得林彪离开17号楼时,出大门也和江青一样是面朝里倒退着出去的。

这张江青署名“峻岭”题为《孜孜不倦》的照片,发表在1971年七八月份合刊的《解放军画报》和《人民画报》上,在全国广为发行。江青精心导演并为林彪拍摄的这张照片,是“九一三”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前最后一张半身免冠照。这两件事,时间间隔仅3个月零4天。

九大以后江青曾邀请陈伯达来照相,她还主动与陈并排照了两人合影。当时陈伯达显得很勉强,在场的人也都很诧异。事后陈伯达私自取回照片处理了,江青得知此事大发雷霆,把陈伯达和图片社的人大骂一顿。

江青平时尽管称陈伯达为“老夫子”,实际上对他并不客气,经常拉着脸训斥他。陈伯达书呆子气很重,不注意生活细节。有一次来11号楼时把大衣挂在衣架上,那衣架很大,可以挂好几件大衣。他从会客厅出来,穿上一只袖子就走,差一点儿衣架就倒在身上,幸亏警卫员手疾眼快扶住了衣架。

惊动政治局的“毒药事件”

李:江青的不好伺候是出了名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她经常突如其来地发火,而且辱骂工作人员,您能具体描述一下吗?

赵：比如到大会堂的车上，她常骂：“你这混账东西，走之前为什么不提醒我上厕所？闹得我现在这么紧张，都出汗啦！”

周：“呀呀呜”是江青常说的一句上海方言，意思是“不中用”，说这话仅表示她不满意，但还没动怒。她生气时会说“制造感冒”“制造混乱”“起到阶级敌人起不到的作用”等等。

赵：她常说“你们用软刀子杀人”。发怒时说“你给我滚”，而我们不能走也不能动，要老老实实站那儿听她训。她训够了，再一次说“滚”时才能离开。她还侮辱护士是“花瓶”，说“要在旧社会像你们这样工作早被开除了”。

在那里工作，一个礼拜里如果有一两天没有挨骂，你会觉得日子真是太好过了！没有哪天她那个嘴是闲住的。

让我终生难以忘却的是发生在1972年春天的一件事，其起因是江青吃药。前面说过，江青每天晚上分7次服用镇静、安眠药。除此以外，在她卧室的床头边上还准备有3杯药，如果睡眠不好，半夜醒了她自己吃一杯，睡不着的话再来第二杯，再睡不着加第三杯，这都是医生给她安排的。本来是备份的意思，但是她不吃的时候简直是太少太少，几乎是每次都吃完3杯，因为她睡眠就是不好。那天，她把3杯药都吃完了，到早上7点钟左右还没睡着觉，她就打铃叫我，说“我一晚上都没睡着觉”。我说那怎么办呢？她说“晚上我那3杯药你没给我摆”。我说我给你摆啦。“你撒谎！”我说我没有，我真的给你放了。“你再给我拿一杯药来！”我心想再拿一杯药来，就等于多加了巴比妥一类的药了，我怎么敢做主？她非要，没办法，我就打电话请示吴阶平大夫，大夫同意加药。

江青吃了这次药后还是没睡着（我觉得她那段时间心里有事），就说“我不睡了，起来”。你想想谁吃了安眠药以后不睡觉，起来是不是要头晕？正常人都头晕。她一头晕起来就说：你给我吃毒药了！让我把所有她服用的药写出来，药名、剂量等。我列出药单交给江青，她看了一遍。来到17号楼放映大厅旁的小厅。然后叫来主席的秘书徐业夫，就把这药单又交给徐业夫：“我的护士给我吃毒药害我，请你把这个药单交给主席！”当时徐业夫就一个劲“嘿嘿”地笑，徐秘书是位老红

军，他毕竟在主席身边待的时间长，也了解江青的做派。江青说：“你还笑！我的护士给我吃毒药，你还笑！”徐业夫就不言声出去了。他走后我们回到大厅，江青接着问，“是不是周淑英让你给我吃的毒药？”我说“她没有叫我给你吃毒药”。“不对，就是周淑英叫你给我吃的毒药！”我说小周不可能叫我给你吃毒药。“那你是不是她带的？”我说我承认是她带我的。“那不就她叫你给我吃毒药吗？”我说她带的我，但不可能教我给你吃毒药啊！“你现在说还不晚，因为你是胁从犯。”我说“江青同志，确实周淑英没有叫我给你吃毒药”。“你还不老实？你敢保证？”我说“我敢保证”。“拿什么来做保证？”我说“党性”。她说：“你还说党性！你这个不老实的东西！”上前“啪，啪”撕扯下我的帽徽和领章，“你不配戴这个帽徽、领章！”一把摔到地上。我也没动，就在那儿站着。她又琢磨一下说：“哦，这是宝贝，不能扔地上。”又捡起来揣到她口袋里面去。这是在17号楼大厅东门发生的事，当时警卫员大周（整理者按：指周金铭）在场。

我作为一名解放军干部，从参军之日就视帽徽、领章为国家、军队的象征，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江青近似疯狂地撕扯动作并把我敬重热爱的帽徽、领章狠狠地摔到地上时，我惊呆了。我受到侮辱，我犯了哪一条国法军纪？被她撕扯去象征军人尊严和重任的帽徽、领章，只因我说了句真话！我心中愤怒，凭什么江青可以肆意对日夜为她服务的人大施淫威！我感到无助，没想到她会做出如此举动，更不知道她下面要采取什么手段整治人！那时我才20多岁，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心想豁出去了，她爱干吗就干吗吧……之后我不说话，泪在眼里打转，忍着不让它流下来。

接着江青擅自召集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开会，她要审讯工作人员。粉碎“四人帮”后，我曾听汪东兴说过他当时不同意江青的做法。江青说是“审讯”，汪说“那叫问话，政治局怎么审讯一个工作人员呢？”而江青一口咬定就是审讯。汪主任只好电话通知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到钓鱼台17号楼。

17号楼大厅成了“审讯室”，江青是主审官。她半夜三更叫来8位政治局委员，企图让他们成为“陪审团”。总理先来了，接着来的是叶剑英、李先



江青在延安的骑马照

念、纪登奎、吴德、张春桥、姚文元、汪东兴一共8位。厅内有一个长条桌子，江青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坐在桌子北面，江青旁边是周总理，叶剑英在顶角那儿。我、警卫员大周和杨秘书在桌子南边，我与江青正对面，这个我记得很清楚的。

江青诬陷我给她吃了毒药，还说是小周指使我干的。她时而声嘶力竭地咆哮，时而咬着牙紧闭着嘴唇，脸上的肌肉在抽动，真是凶极了。我如实陈述，坚决否认了她的栽赃陷害。

江青逼问警卫员、秘书要他们证明她吃的药是毒药。他们说：吃药都是由医生征求你的意见，你同意了。我们也不是医生。到底怎么吃，我们也不清楚。

问完以后江青就把我写的那张药单子递给总理了，总理想把事情平息了，他说“她能写出这单子来就挺不错嘛”。江青拍着桌子冲我喊：“你给我吃毒药，你还敢不承认？”后来叶帅问：江青同志，我想问一下什么是毒药啊？江青说：安眠药就是毒药。叶帅说：你可以不吃吗？江青说：不行，不吃我睡不着觉！叶帅说：那你能不能少吃一点？江青说：少吃也不行。叶帅见她无理取闹，就走到一边，坐在沙发上闭上眼睛不再说

话了。

总理看到江青这么飞扬跋扈，我的帽徽、领章都被江青撕去了，那次是真发火了，他气愤地对江青说：“你对她态度好一点好不好？她还是孩子啊！……你把这么个小女孩的帽徽、领章都撕下来了，我都替你难过！”面对江青的恶劣行径，总理忍无可忍发了脾气：“你对她客气点好不好？你这样对她，她那么紧张怎么让她说话啊！别说她紧张了，我都紧张啦！”当时总理的保健医生张佐良也在现场，是江青叫他进来的，说：“你是张大夫吧，你也进来听听，受教育！”总理就喊：“张佐良！我紧张啦，我已经紧张了！赶紧给我吃片非那露！”只有周总理发怒说出来的话才能压一下江青嚣张的气焰，其他人就看着，都不说话。

江青当时下令，把她放药的保险柜和所有吃的药都贴上封条封上。她吃的药、喝的水都不让我送了，停止了我的工作。（封完后汪东兴就开始警觉了：她封自己的药柜可以，千万别把中南海门诊部的药房给封了，那样中央这些领导就别吃药了，就没法运作了。据原药房的老药剂师说：汪东兴当天就来到药房，要求将药房的药送去检测，并立即加强了药房的安保措施。检测结果证明所有药品中无任何异常成分。）

江青当晚还要把曾替她治好牙病的301医院口腔科专家洪民、曹家信抓起来。还要抓309医院干部杨洪喜，他曾是颐和园的军代表，江青游园时接待过她。江青急于和林彪、叶群划清界限，不惜一切手段陷害无辜的人。当然总理没有听她的，坚决地抵制了她。

江青擅自召集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开会，她亲自审问为她服务的护士、警卫员、秘书3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其权力之大、级别之高是史无前例的。面对江青穷凶极恶的审问，我坚持实事求是地回答。之后，屈辱、无辜、惊吓和愤怒使我木然站在那儿。领章被扯后，红色缝线还耷拉在军服领子上，我就不扯下来，就让那根红线那么垂着。这时周总理走到我面前握紧我的手，他语重心长地安慰我说：“小赵，我本来准备今天跟你谈谈，但是因为我有外事活动，没法跟你谈了，你要想开一点。”总理还说，“要看在毛主席的份上”。总理真诚的目光、亲切的话语、有力的双手给了我力量，我点头答应了。这时我再也忍不住了，

泪如泉涌！

这件事对我来说是刻骨铭心的，几十年后再次提起，那惊心动魄的场面仍使我心有余悸。有次我在305医院遇到李先念的女儿李紫阳，她说：我爸爸说“江青那个护士能活下来就不容易了”！

周：小赵讲述的这些事，我虽没在现场却有如身临其境。在文革十年浩劫中，江青权力之大，正如我曾听到江青在各种场合毫无顾忌地说：“我是老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赵：江青停止了我的工作，可她生活一时都不能离开护士——因小周走了，就我一人上班。她让总理想办法，总理只好让他的护士许奉生先过来。当时是周总理的警卫员高振普给许奉生打的电话，说总理叫你马上到钓鱼台来。许奉生就害怕了，以为总理病了。她说总理怎么了？高振普说总理没怎么，叫你来，江青要用你，许奉生开始不相信……

周：因为1968年江青重感冒时许奉生已经来过11号楼了。工作几天后江青就让她回去了。

赵：对。这次让她到钓鱼台来是真的，当时我正在门口“待罪”，目睹了这件事的始末。许奉生知道江青难伺候，不愿意到江青这儿工作。从中南海过来时一路都流着眼泪，进17号楼时眼睛已经哭红了。看到她进来以后，高振普说：“你的眼睛这么红，这样怎么行啊？赶紧去洗手间用凉水洗洗，要不然进去以后让江青看见了，可了不得了！”她就赶紧去洗，洗完以后去见江青。进去一会儿许奉生出来了，笑着出来的，高振普也愣了：怎么啦？她就说：“她嫌我的手太凉啦，她说她不要我了。”许奉生撒腿溜着门就出去了，赶紧跑啊！她一点儿也不想再在江青那儿待着了。

周：江青也曾诬陷我给她吃的药是毒药，可吃了“毒药”既没中毒身亡，也没出现中毒症状。她以莫须有的罪名关了我一年多。事实是几年里我悉心护理她，从没出过任何差错。江青的头发一直都是浓密、乌黑油亮。由于她在不同场合多次控诉护士给她吃毒药造成头发干枯，大把大把地掉头发，使人误以为是慢性中毒使她头发掉光而戴了假发套。当时赵柳恩在江青疾言厉色逼供的巨大压力下敢讲真话，为我申辩，太不容易了！我敬佩她的人品，也珍惜我们的战友情。

赵：江青这人就是疑心重，她曾经问我：“你

为什么叫赵柳恩？”我说：“我的名字是爸妈给我起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实际上我明白，我籍贯是广西梧州，出生在柳州，父母希望我记住柳州对我有养育之恩。江青有个毛病，喜欢给人改名字，她说把你这个名字改了吧，你就叫“赵柳”吧，要不就叫“赵恩”。我说改起名字来手续挺麻烦，最后没改。她就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固执啊”。“九一三”事件出来以后，她就把我和林彪家的事联系起来了，说“怪不得你要记住柳州的恩情啊！因为林彪的母亲葬在柳州”。开始我脑子还没反应过来，后来我一琢磨，我这名字跟林彪的妈妈葬在那儿有什么关系？这不是瞎怀疑嘛。

1973年的春天汪东兴到10号楼，警卫员大周让汪东兴留下来。他气愤地说：“我们一只脚在监狱里面，另一只脚在外头，天天就是这种心态。”大家围拢过来替小周鸣不平，说小周是被江青陷害关起来了。我们同汪说：“我们现在吃不好也睡不好，经常做噩梦。江青是什么政治局委员？马列主义对别人不对自己！”汪说：“我原以为你们还是孩子，看来你们都长大、懂事了，这个事你们放心。”

我曾多次听汪东兴叙述当时的情形。那天汪东兴和周总理到毛主席那儿汇报：“我刚从10号楼来，那儿的工作人员心情可不稳定啦，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主席问为什么，他就把小周的事说了，主席立刻就火了：“还有这个事？她从哪儿抓起来的给我放回哪儿去！”毛主席下了指示，当天就把小周放出来了。毛主席还说：“她那个地方的工作人员没有一个好好地出来的。”“他们在那儿工作，她不但不关心不爱护不帮助，出来以后还扣上大帽子，从她那儿出来没有一个好好安排工作的。”主席还对汪东兴说“你保他们嘛”，汪说“我可没有那么大的权”！主席说：“我当你的后台老板嘛！”主席还叫汪写出江青身边工作人员名单保留下来。大家都想离开江青那儿，可是想走也走不成啊！如果允许大家5分钟内离开这个楼，门马上会被挤破，大家都要跑，一个人也不会留下。

护士结婚风波

赵、周：我们受了委屈就向程师傅诉说，忍不

住时就哭一鼻子。他同情地给我们出主意说：“你们在这儿也干了好几年了，怎么给她干也没有好下场。我看没有一个人能好好地离开这儿的，赶紧结了婚就走吧。我们男的没办法只能在这儿待下去。”实际上不结婚你根本就没有任何一条路能离开她，你绝对不敢提出来：我要离开这儿，我不想在这儿干了。那不自找倒霉嘛！

赵：为我结婚的事儿，江青居然能闹到政治局会议上去。那时候我在江青身边已经工作了好几年，年龄也不小了，一直没交男朋友。江青曾说过：“不要太眼高了，（警卫）二处这么多小伙子，你就从二处找一个嘛！”后来我和二处的小张（整理者按：指张云生）交往了一段时间，彼此相处不错，开始谈婚论嫁。我特意选了个江青心情好休息得还可以时，对她提出我想结婚的事。并表示：“不知道您同意不同意？您要同意了我就办，不同意就不办。我服从组织安排。”她说：“娃娃，我同意。哪有不同意的？在九天庙外（钓鱼台北门对面）找间房子你们就办吧！”这是我记忆中江青唯一一次称我为“娃娃”，透着一种长辈的亲切（因为不习惯，我还愣了一下）。

哪想到才过几个小时，晚上要到大会堂开政治局会议前，不知道什么原因，她又发火说：“我要不同意呢？”我说：“您不同意那就再说吧，我服从组织安排。”她从卧室走到大厅时又问我：“结婚是你提出来的还是你对象提出来的？”我一听她口气不对，怕她迁怒于小张，就说是我提出来的。“我不相信，一般都是男的主动，女的不主动。”我坚持说是我提的。“真是你？”她站起来瞪着眼狠狠地盯着我，一步步走近，突然朝我胸口“咚”地就给了我这么重重的一拳！她吼着：“你不要脸！”还说了许多侮辱我的极难听的话，今天在这儿我都没法说。我当时就傻了！又气愤又委屈，没想到她这个政治局委员对我张口骂脏话，抬手出拳打！出来后我告诉了在门口值班的王振荣（整理者按：江青所住楼的警卫战士），他同情并出主意说：“你真傻，当时你就该躺在地上打滚，说‘打疼了’。”我说：“我不会呀！没有哪个政治局委员像江青这样对待工作人员的！”

紧接着，在去大会堂的车上江青就一路叱骂我。逼问：“你的对象叫什么名字？”我怕牵连男友就一句话不说，她还就此逼问警卫员。那天中

央政治局在福建厅开会，她在会上大吵大闹：“批林批孔，我在冲锋陷阵的时候，我身边的工作人员竟然提出男婚女嫁，搞家中坛坛罐罐的事。我的护士结婚，就是要拱掉我的一个炮腿……”还说了许多不堪入耳和侮辱人格的话。她当时就逼汪东兴处理我的男友。汪主任从会议室出来，看到我说：“你呀你，怎么这时候提出结婚的事，也不先向我报告？”我说：“我看她心情好时才提这事，如果报告你怕牵连组织而引起不好的结果。我个人的问题由我自己承担。”汪主任说：“她让我出来处理解决你们的问题，叫小张到西藏去。但是你放心，我不会动你小张一根毫毛的。”江青提出让他去西藏，他后来到底去哪儿了我并不知道。一天江青问我：“你的小张到哪儿去了？”我说不知道。她说：“不会失踪吧？”我说没有人告诉我他去哪儿了。事后汪问我：“你为什么对江青说小张失踪了呢？”我根本没说过这话，是江青自己说的。我只说确实没人告诉过我小张的行踪。江青就是这样出尔反尔，将她说的话，硬扣在别人头上。我们俩结婚的事就拖下来了，拖了一年。

张云生（以下简称张）：那天警卫局邬吉成副局长给我打电话，说：“把你的东西收拾收拾。”一会儿邬就从大会堂开来一辆白色伏尔加车。当天晚上就把我送到中南海警卫局一处东边的那个小屋。里面放杂物，一个乒乓球案子上全是土。我对邬局长说：“江青是什么政治局委员？我犯哪一条法了？按婚姻法规定我们年龄早超过了。你觉得不合适我们就不结婚嘛，干吗非要闹成这个样子？还大闹政治局！”老邬说：“这些组织上都知道。”

第二天汪主任就把我和邬吉成叫到他的办公室。汪主任说：“小张，不要紧张，今天你就去广州，西哈努克的母亲在广州小岛住，你去那儿做警卫工作。”邬吉成让我赶快走，今晚就走，当晚我没告诉小赵，转天自己坐火车去了广州。

我在广州住了三个多月。之后西哈努克的母亲来北京，我又在那儿工作一年多。我与小赵经历了各种磨难终于在我回京一年后结婚了。

赵：江青后来对我说：“我知道你个人的问题我没给你处理好，你心里面有点儿怨言。你放心，我现在找人呢。”就找了马晓先来替我。我走

了以后才一两个月,有一天程师傅到我家里去,说:“老太太问你有没有孩子?怀孕了没有?她想让你回去上班。”我说你告诉她,我现在感冒了,不知道是怀孕还是感冒。实际上什么事也没有,我本来身体就不好,那时瘦得就没个样。再说,当时经济条件也不好,我本不想马上要孩子。现在听江青这么一说,吓得我“算了吧,赶紧要个孩子,只要怀孕她就不会叫我去”了。就这样有了女儿。即使这样,怀孕五个月的时候她还叫我去替了一次班。我蹲下为她穿鞋时,她说:“你呼吸怎么这样重啊!”嫌我侍候她不灵便,又让我走了。

张:这期间,江青还到处打听我。汪东兴怕我在西哈努克母亲那儿工作,被江青扣上“里通外国”的帽子,又把我送到了江西五七干校。我在江西五七干校又待了一年半。中间只回来过一次。

赵:快生孩子的时候,他才回来探亲,没出满月他就回去了。我怀孕、照顾孩子还要坚持工作,一个人太难了。长夜的那串泪珠流到枕头上……

周:1971年为我结婚的事江青也动了大怒。江青那段时间身体状况还好,在兴致勃勃逛远郊公园、骑马后没有任何不适。我想在这工作4年了,年纪也不小了;再说小赵也能独立工作了,她心细、温和,对江青护理那套复杂程序也掌握了。当我提出结婚申请时,江青当时是同意的,态度还算温和。哪知刚过几小时我就接到要立即离开10号楼的通知。事后听同事们说江青她突然翻脸,她怒火中烧指责我在她为革命呕心沥血的时刻,竟为个人的区区小事离开她,就是对她没有感情。她还说了许多难听的话,并说再也不想看到我,让我马上滚出10号楼。我就这样离开了10号楼。过了一段时间江青又要我回去工作,我重新回到10号楼。原来我离开那段时间江青去青岛疗养,在使用便盆时歪倒了,造成一侧锁骨骨裂,她需要我回来继续伺候她。一见面她板着脸说:“你犯了大罪,你为结婚离开了我,看!看!我这儿骨折了。从今天起你要戴罪立功护理好我!”从那一刻起,我真成了待罪之身。虽然每天都小心翼翼伺候着,但她百般刁难,常无缘无故地冲我发火。想到前面一些同事

的遭遇,我又一次收拾好个人物品,提心吊胆地等待着江青的惩罚。

赵、周:人们一般赞美结婚的词语都是美好、甜蜜、幸福,并受到大家的祝福。然而我们这些为江青辛苦服务多年的保健护士,却因江青的干涉、责难、谩骂,使结婚充满了担忧、苦涩和泪水。这些痛苦和眼泪只能往自己肚里咽。

李:天道好还,报应不爽。我听说张老师您后来参与了抓捕“四人帮”?

张:是,我和高凤利两人,亲手抓的姚文元。就中南海怀仁堂的东侧那个厅。高凤利是守在门的东侧,我在西侧,姚文元一进门,我们就从两边上去,一人抓一只胳膊,给他来一个“缠臂压肩”!他愣了一下后就“哎哟哎哟”地叫,呼喊他的警卫员。随即,我们把姚文元押到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武健华面前,他宣布了中央对姚文元隔离审查的决定。

周:也没反抗?

张:反抗啊!从怀仁堂东侧那个门出去,走到海边有个小亭子的地方,他说了一句话:“你们为邓小平翻案!”我叫高凤利,“把手绢掏出来,塞住他的嘴!”他才安静了。

李:姚文元这么敏锐,当时就联想到“为邓小平翻案”的问题?

张:他就喊了这么一句。到地下还比较老实,到后来又有一次反抗,装痴卖傻。我们在地下室待了6个月零4天哪。最初爱人都不知道,以为我失踪了,那时任务是保密不能讲的。半个月洗一次澡,洗完澡再拉下去。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就是半个月或一个月可以回家一次,也是车接车送。地下隔离室里有两个沙发、中间一个茶几、一个沙发床。卫生设备齐全。姚文元就在这么一间房子里活动睡觉。那时候这一组就4个人,有我、高凤利、康海群和师职干部滕和松。24小时守着姚,两人一组两班儿倒。他躺里头,我们这两人必须得看着他。值班时不能打瞌睡,太困了咬嘴唇也不管用,掐大腿根的肉也不管用。没办法就抽烟提神。中间有一次,姚文元装痴卖傻,往外跑。那时候人一急了眼也不知道有多大的劲儿,我抓着他的后衣领子,“噌”,把他从门口一下子摔回到沙发上。我跟他说,党的政策你是明白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老老实实的,我们不能把你怎么样,你不老实那情况就不

同了。我们现在两个人看着,我们是干什么的?你能跑出这屋去吗?后来他老实了,再也没往外跑。

李:那他整天干什么呢?

张:看书啊。他自己要《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看完了以后换。平时就在那沙发上坐着,困了就睡,再一个起来溜达溜达。整天就是这样生活的。我们之间也没有什么交谈,最多就是他要点儿什么东西,比如纸啊、笔啊、书啊。我们写个报告,上级批准的物品就给他拿来。他的头发长了都是我给他理。里边生活设施挺好,厕所有洗澡的地方。

李:这“四人帮”你们心里猜得都非常准确吗?

张:非常准确。1976年10月6日那天正好我值班,那时候警卫团改成警卫师了,副师长一开始叫高云江出去,接着又叫黄介元出去。人员出出进进的,我们都看出今天要有大事,一会儿又叫我这个参谋。实际上武健华、汪东兴的秘书在一起,决定参加行动的人选。人员确定后就分组由汪主任谈话。谈话在中南海南楼他的办公室进行。他谈的第一句话是:“你们闻到火药味儿了吗?”我们都说闻到了。他接着说:“有人要搞‘四人帮’,你们能猜出是哪些人吗?”我们心知肚明,但没说出来。我们经常接触这些人,哪几个人经常在一起活动都很有数的。

汪说:“那好,今天晚上你们就去执行一个任务,具体布置听武健华的。”武健华在布置任务时,指定我们这一组的负责人是警卫一处的滕和松。

(上接83页)历史的文件,要了解普京官方对苏联历史,对斯大林及其社会主义的观点,这里讲得清清楚楚,既不需要像我国有的学者那样,从莫斯科某一俱乐部传出的苏联时代的歌声中,或从普京保留苏联国歌的旋律中,来妄猜普京要“重新肯定斯大林”,也不需要像另一些人那样,从俄罗斯为科研资料需要,又重新印制了寥寥1700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就大讲特讲俄罗斯要用此书当教材了,等等。

但是,我们也实事求是地告诉读者,这个文件毕竟只是俄罗斯史统一教科书的《总构架大纲》,文字十分简练,内容也较为有限,对人物和事件的评价和观点,只是提供了一个纲要性、概略性和轮廓性的框架,有些问题只是点到为止,

李:那时您知道要抓谁吗?

张:这个任务交代很清楚,就抓姚文元。成卡车的部队都集结了,看起来形势很紧张。警卫团里有我、李广银、黄介元、高云江、吴兴路。交代的任务是我们这组负责抓捕姚文元;高云江和黄介元组负责抓江青;李广银组负责抓王洪文;纪和富组负责抓张春桥。

李:作为警卫人员,原来是保卫中央首长安全的,当然也包括王、张、江、姚。突然有一天接到命令:对某几位中央首长下手。这个弯儿怎么转?

张:这个弯子好转,他们4个人背后搞小动作。借批林批孔把矛头直接指向周总理大家都看的很清楚。

赵:我们对总理的感情都挺深的。后来总理身患癌症,身体消瘦十分虚弱。这几个人还不择手段地整他,我们心疼总理,对他们的行径十分气愤!

张:就我个人讲,那就更好转了。知道为什么吗?

李:直接受迫害?

张:对!因为我们两人提出申请结婚的事,小赵被江青打了胸部一拳,把我从警卫二处赶走。接着还要把我弄到西藏劳改。组织上为了保护我,让我离开北京到江西五七干校劳动。此外,对江青平时的所作所为深恶痛绝,所以从内心拥护中央的决定。■

(责任编辑 黄 钟)

并没有充分地展开,也没有详细地进行论证。但它所提供的是普京官方和俄学界主流的“正式评价”,其观点的基本点已经有了,总体轮廓、面貌线条、内容概要已经具备,有条件给我们提供研究、介绍的基础,因此,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可靠、准确的文字资料,向我国社会公众和思想学术界加以介绍和解读。自然,有关普京官方和俄学界主流对斯大林及其社会主义的更为详尽的评价和叙述,将有待两三年后这部俄罗斯历史统一教科书的出版和发行。对此,我们将会拭目以待,加以追踪。■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黄 钟)

文革中我与枪的五种关系

○ 丁学良

正像《炎黄春秋》2014年第8期中我所描述的,文革中的武斗初级阶段,多半是以乡下的农民为一方,以城里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为另一方,呈农村包围城市之势。虽然1966年8月有《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下达,简称《十六条》,明文宣示“要搞文斗,不搞武斗”,农民们却很少买账。遇上围城的农民,我们红卫兵跟他们辩论,说“《十六条》规定如何如何……”,农民会把大嘴一撇:“你们有《十六条》,老子有扁担一条!”

被扁担一条多次教训过的红卫兵和造反派,自然不甘心于手无寸铁闹革命的雅致方式,但是不论我们怎样地想方设法,总是比对方差了一大截。

在武斗的军备竞赛中相对保守的一方(俗称“老保”即“保皇派”)比激进的一方享有突出的优势,此中原因不难解释。比较保守的那方背地里对走资派很温和,走资派背地里对他们就很照顾。走资派当权多年,手里的有形无形的资源并没有一夜间都给剥夺干净,关键时刻点拨一下,结果便大不一样。

送 枪

待到我们激进派紧随老保们,也用木棒、铁棍、大刀、长矛之类自制的兵器武装起来,武斗的军备竞赛就不可避免地与时俱进,跨上一个崭新的台阶——真枪实弹。在我们那里,这个新台阶大约是1967年的秋季攀登上的。老保那一派得了人武部系统的内部指点,把民兵的军械库给抢了,这当然是明抢暗送。民兵的军械库原本是分散到人民公社和镇一级保管的,武斗一开打,就集中保管了,保管的地点和军械的品种都是极机密的,非人武部的领导干部无缘知晓。可我们那儿的老保们一抢就抢了个准,短枪、长枪、机关

枪、子弹、刺刀、手榴弹都成龙配套地放在一处,抢来就能分发下去用于实战。而我们一派的人到人武部去抢枪,抢到的都是些没有枪栓的三八大盖或者铁锈丰富的裂牙刺刀,连颗完整的手榴弹都没抢着。

你想想看,当敌对一方已经用真枪实弹全副武装起来,而自己一方却还是手持粗木棍和尖铁矛,心里哪能不打鼓?我们那时候又没有得高人指点,没琢磨出来“非对称战略战术”,因此成天急得团团转。

这期间我们一派的指挥部为着保存实力,也曾连夜把少数骨干人员秘密运送到南京去暂时避难。那是我第一次有幸在狭窄的卡车车厢里,与颇为倾慕的一位同姓不同性的红卫兵领袖相对而坐,总希望这逃难之旅越长越好。江苏那时全省分成两大派,一派称“好派”,一派称“屁派”,源于对一次全省范围内向江苏省原省委及省政府夺权的大举动,是持“好得狠!”还是“好个屁!”的正反态度。奇怪的是,这两大派在本省内打得不可开交,却对安徽省的局势持完全一致的态度,统统站在我们激进造反派的一边。

抢 枪

在南京短暂避难返皖以后,我们就琢磨从哪里弄到大批军械自我武装。“大批”的意思是成千上万,因为这时候的本派骨干分子已经配备了真枪实弹。我本人作为“文攻队”的主将,即便没有上阵杀敌的光荣任务,也领有一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造的驳壳枪,俗称“盒子炮”。年纪虽然大了一点,却威力十足,扳机一扣,轰隆如雷,凭我的手劲,根本稳不住它;你明明瞄准着正前方,枪口会震偏到三十度开外,把左右并肩的战友吓得鼠窜。好在我分得的子弹少少,不足二十发,难以每日开火威胁到战友们的安全。至于这

批枪支从何处弄来,却是本派的最高机密,好像是一位很同情我方的民兵干部,怕我们全都亡命于对方绝对优势的武力之下,暗暗通气,半偷半送地让我们得了几十支老爷枪械护身。

解决枪荒的目标很快落实到南京军区驻宣城南门制高点的通讯站大院里,这通讯站就在我们宣城中学的隔壁,它的后部又与一间军用被服厂大院相连接,范围极广大。通讯站大院里有几排大平房盖成的军用物资仓库,神秘兮兮的军事单位,与学校的男女厕所只有一墙之隔,虽然我们每天上学放学都要路过它的大门口,它却从不露内里真相。本派“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对方一派称其为“脸紫”,意思是我们都快要死了——准确得悉那几排平房仓库里藏有大批军火,不可能没有内线的通报。那间被服厂里有数百名军人家属做职工,不算是正式的士兵,居住在县城的平民社区,十有八九是她们中间某几个人给“联指”的头头们通风报了信。不过“联指”的核心领导层没敢大意,安排了至少一起秘密核实的操作,听说是先把通讯站的厕所下水道堵住,接着派人扮作淘大粪的农民,混进通讯站大院里,把那几排军用仓库察看得仔仔细细。所以当我们接到抢枪的行动命令的同时,也都接到详细的地形方位介绍,告诉每一个人冲进通讯站大院后,应该朝什么方向怎么跑、跑多远、怎么入室、怎么撤离。

冲击军事禁地——通讯站乃属军队的神经系统,其重要性不言自明——是要冒极大风险的。时至1967年的年底,虽然已经有江青一帮喊出口号“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文攻武卫!”等等,红卫兵和造反派们心里还是没有底。那个年头是章法全乱的时代,也没有任何文件正式宣布“严禁冲击军事要地,违者镇压!”的法令不再有效。我们在南京避难的时候,就亲眼目睹包围着南京军区大院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不敢朝里冲,因为军区司令许世友发了狠话:南京军区担负对台湾和美国第七舰队作战的重任,谁敢冲击他的指挥部禁地,格杀勿论!我们宣城的军事通讯站,是南京军区管辖,万一这位少林和尚出身的许司令发了毛下令开火怎么办?

这许和尚在我们那一带是极有威慑力的,传说他禁止任何人不经报告跨进他的办公室,违者

丢下小命。他的妻子有天忘了这条禁令,被他手起一枪击毙;他当时坐在办公桌前,背都没有转过来,手枪是由腋下反腕射击的,可见枪法之准。又传说某次毛泽东也没经报告走进他的办公室,被他打了一个耳光:“你要不是我的主席,今天也没命了。不过军令不能当儿戏,权且以一巴掌充罚。”可见他治军之严。这类传说的准确性,老百姓无缘求证,但它们的心理效力,却十足实在,因此“联指”头头们要把高风险因素,纳入行动计划之中。

当时最能为我们壮胆的,是林彪和江青的有关讲话,规劝红卫兵小将不要随便冲击部队驻地,同时规劝战士们万一被小将们冲击,要持克制态度,多做说服教育工作。“联指”领导层的部署由此而定为:让红卫兵做抢枪的先锋,如果部队不开枪,其他的造反派(他们都是成年人)就跟上去。事实上被当作炮灰使的我们,却觉得受到极高的重视而扬扬得意;我本来不在抢枪先锋队之列,哇哇叫抗议了一通,才被接纳参与。

那个星期日早晨8点半钟左右——选取这个时刻是要趁部队战士休息日吃过早饭正忙于洗衣服之机——我们从军事通讯站的侧面发起突然袭击。五六百名中学生红卫兵的一小部分从侧大门往里强行进入,引得所有值班的士兵全都集中到大门口排成队伍阻挡,大部分红卫兵却埋伏在宣城中学围墙的内侧,见势便一拥而上,一人肩头托一人从围墙上翻身而入军营。慌乱之中士兵们跑过来拦截,正中了我方的计谋,势单力薄的大门立时被撞开,紧随着红卫兵的造反派大队伍蜂拥而来,军营里马上乱了套。面对着数千名有备而来的抢枪人员,百把名士兵只能高呼毛主席语录,秀才遇到兵地做无为的宣导。不过这里的“秀才”其实是兵,这里的“兵”反倒成了秀才。

我置身于红卫兵队伍里,被动地卷入抢枪的第一波洪流,直扑大平房军械仓库。几百人的冲刺下,仓库门窗顿时灰飞烟灭,我还没有醒悟过来,就已经滚到了放满手枪的柜头。我本能地伸手、本能地缩手,把闪着蓝光的崭新的“五四式”手枪一支又一支地塞进外衣的口袋、内衣的口袋和所有能插进手枪的裤腰带空隙处。直到我被压得再也透不过气的当口——周围全是人挤人、

人压人、人叠着人，一片挣扎声、号叫声和汗臭味——才从人堆缝隙里爬出来，朝事先“联指”头头们部署的方向撤离。

这时候军营里已经是尘埃落定，局势分明。大兵们从最初的慌乱中清醒过来，判定他们人单势薄，无法层层设防、步步为营，于是采用林彪在东北战场上实践的“三三制”，也就是三个士兵结成一组，围歼一名敌人。他们集中守在侧门口和围墙的低矮处，见到有不穿军装的人往外跑，就三对一地围攻上来，先缴械后放人。红卫兵小孩们抢到枪后，多半是谁得手谁先跑，已成散兵游勇。收获丰盛的我，气喘吁吁地直奔围墙，一看那高度，再看无人肩托，就傻了眼：那墙壁万万不是我辈可以纵身而过的；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闯侧大门。守在那儿的几组士兵们一看我，三面合围，把我从地面直提起来，双脚落空，裤腰带周边的手枪纷纷掉下；然后他们把手伸入我的口袋，又有一番收获——总共缴到七支手枪。

我大声抗议，大声号叫，大声骂街，大声威胁，一点用也没有。几个身强力壮的大兵看着我这个不到他们肩头高的男孩在那里口出狂言，反倒觉得是一种消遣；无奈的我只好满口吐沫星子地被扔出了军营侧门。

我的愤怒其实主要不在那七支手枪中的六支，而在其中的一支。我去抢枪的时候，随身带去了那支德国造的“盒子炮”；大兵们不问三七二十一，把它也给收缴了。我回去怎么向组织上交代呢？我们一派那么缺枪，组织上那么看重我，分给我一把手枪自卫，我却把它给丢了！耻辱啊耻辱！别人去抢枪，要么是抢到的多，要么是抢到的少，最差的也就是空手而归罢了，而我抢到的却是负数。“你是唯一的一个去抢解放军的枪反被解放军抢了枪的小将。”我们那派红卫兵的武卫头头“大肚子”跟我说，“你哪算是革命小将，顶多算是芝麻酱，蚕豆酱，酸辣酱。”

“大肚子”的话不纯粹是挖苦，他对我如兄长一般地爱护。他的肚子从外表看一点都不大，又高又瘦，主要是他嘴馋，每时每刻都在想象着吃和谈论着吃，并宣称能一顿吃下四锅锅贴饺也就是四十八只，或者十六只五香鸡蛋，饱嗝都不会



文革宣传画

打一个。他对任何物品贵贱的衡量，也都是以锅贴饺为单位：“这双胶鞋值三锅锅贴饺，还可以。”看见一个走资派腕上的国产手表，问到是一百二十块钱，他惊呼：“你这个资产阶级，手上戴了一年吃的锅贴饺！”在整个武斗期间，危险时刻“大肚子”都用他的身体护着我。

本派红卫兵组织出面，与军事通讯站交涉，要求归还我的那支被他们收缴去的驳壳枪。当兵的一肚子气，原不想还，后来发现这支德国造的手枪在他们那儿不好登记入册，就还给了我们。组织上照顾我年小体弱，换配给我一支“五四式”手枪，小得多，轻得多，好使得多。

耍枪

那一次抢枪，令我方增添了数百支轻重枪械，不过所获弹药并不多。在小将们抢到的军火中，最壮观的是一门双管高射机关枪，单单枪管本身就有三公尺多长，加上底座，足足五公尺长。可惜没有枪栓，也没有子弹，开不起火来——这显然是部队做了防范措施，把一门高射枪分作两处储藏，“一枪两地”，抢来无用。不过我们还是充分发挥了它的威慑力，将它置放在宣城中学第一教学大楼的楼上正中央，枪管从堆着沙包的门洞平伸出去，气势汹汹，弄得外界望而生畏，不敢轻易接近宣城中学的地界。

我们手持形形色色武器的红卫兵小将，一开始给对立派别“红色造反总部”——简称“红总”，我们称其为“红肿”，意思是他们的小命都长不了



文革宣传画



——造成的威胁,还不如给我们自己造成的威胁大。在抢枪后的几个星期里,失手走火事件不断。十四岁的侯黑子,抢到一支仿苏制AK47全自动冲锋枪,又抢到子弹,在军事通讯站门口不远处就要弄起来,招来一群小孩围观。侯黑子吃力地端起有他身体一大半长的冲锋枪,瞄准着一个孩子,嘴里“蹦蹦”两声——他把它当成了玩具枪,旁边的孩子们也把它当成了玩具枪,可是枪口真的崩出两发子弹,一个小孩当场毙命。还不够成年的侯黑子后来被判了三年劳教,放出来的时候看起来猛然增了二十岁,真是“洞中才一岁,世上已千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劳改系统里得到最充分的验证。

有两起走火,就发生在我的近旁。一日我们聚集在第二教学楼的教室里,那儿已经被我们用作睡觉兼值班的场所,几张双人床的上下铺都坐着人,多数人手里拿着枪。坐在下铺的白大舌头——他姓白,长得倒像黑包公——说到激动处,把一杆1950年制的美国半自动卡宾枪往地板上用力一跺,枪托落地之时,一串子弹连发,从坐在上铺的长得像石头一样结实的张墩的两条大腿根儿之间直射上天花板。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没伤着独生子张墩的命根子,却把他震得几分钟站不起来,木在那儿。那种型号的美制卡宾枪最易滑膛,从那天以后没人敢用它来站岗值勤,半夜三更走火,自己人会跟自己人误打误杀起来的。

另一起走火的主儿,便是“大肚子”。那次抢枪之后,他换了一支崭新带皮套的“五四式”手枪,又多得了几十发子弹,神气活现,逢人就炫耀他的枪

和他对枪的无与伦比的知识。他的口才极佳,枪法也挺好,说着说着,以动作佐言论,举枪朝一位听得入迷的胖女同学腿部隔空轻轻一点。谁也没有料到这支手枪是子弹上了膛的——事后“大肚子”埋怨别人玩弄他的枪把子弹顶上去没告诉他,其他的人却推测多半是他自己吹牛吹昏了头忘记枪膛里有子弹——那轻轻一点,就在该位胖女同学的腿上部击穿了一个眼,鲜血涌

出,满屋子人的脸刷白。

手忙脚乱的我们吧受伤者抬上担架,运往芜湖的大医院做手术。胖女同学的家是农村的,父母亲惊吓之余,最担心的就是女儿会不会成残废,下不了田,做不了重活,也嫁不了好人家。有一年之久,“大肚子”都生活在恐惧之中,生怕他必须娶回伤在他枪口之下的胖女同学,供养她一辈子。我们旁边的人倒没那么担忧,因为都看出来那学习成绩出色的女同学根本看不上“大肚子”,即使腿治不愈,也未必愿意下嫁于他。

造 枪

对于我们“脸紫”一派在军事装备上大大落后于“红肿”一派的情况,绝大部分人的主张是通过抢枪来改变,极少数人的主意是土法上马、自造枪炮。持后一种想法的小将里有一位人称“工程师”,是宣城中学高二的学生。他发起的最重要的军备工程是三项,我亲身参与了一项,亲眼目睹了两项,全都称得上轰轰烈烈。

我亲身参与的那一项是制造硝化甘油,一种比梯恩梯(TNT)猛烈得多的液体炸药。“工程师”从一本苏联的化学教科书上读到制造的方法,但他性急,只读完前半,后半没读就拉着我去动手,而后一半是关于安全措施的。我俩在一间单人教师宿舍里操作,那是1968年初夏的夜晚,小方桌上放了一口直径约五十厘米的深玻璃缸,是从学校实验室拿来的。他朝玻璃缸里缓缓地倒浓硫酸,再倒浓硝酸,让我拿着玻璃棒搅拌均

匀。那本教科书的安全措施一章用粗黑体字告诫——这是我们事后才读到的——浓硫酸混合浓硝酸的时候,严格禁止碰撞。玻璃棒搅拌过程中,不时碰撞到玻璃缸,十几秒钟后,玻璃缸里骤然腾起一柱蘑菇云状的液体夹气体,直冲而上,碰到天花板后,散落下来,我们的身上火燎燎地灼痛。“工程师”大叫:“赶快跑!跑,快跑出去!”他一马当先,我尾随其后,跑到自来水龙头下全身冲洗。我离那口玻璃缸近,溅上的化学试剂比他多,圆领衫已经成了一片渔网,右手的食指中指上几小块皮肉已经烂掉,能见着里面白森森的筋骨。医生告诉我们,浓硫酸混合浓硝酸,叫“镪水”,俗称“王水”,连钢铁都能腐蚀掉,何况皮肉!抗日战争前的中国著名影片《夜半歌声》,赵丹扮演的男主角的那张吓坏了众多小孩的脸,就是伤在仇人泼的“王水”之下。

从此以后,我就谢绝做“工程师”的助手。

“工程师”却没有打退堂鼓,他琢磨着怎样把生铁铸造的七八寸直径的自来水输送管改制成土炮,因为我们那座高射机关枪只能吓人,不能轰人,他担心我方的革命事业会因此而夭折。试炮那天,正值我们红卫兵组织开大会,“工程师”把土炮里塞进黑色火药,再填充一些碎铁锅片,将一条长板凳翻转过来权做炮架。为了测出土炮的最远射程,“工程师”决定土炮安放在第二教学大楼的二楼正中后方,炮口朝向学校南面的空旷菜地。在点燃土炮引信之前,“工程师”忽然觉得板凳炮架不够稳,他让同班好友小何用脚顶住板凳的一头,再喊几个小将扶着小何。小何的脚已经顶在那儿了,“工程师”手上的香烟火已经快碰上引信了,小何脑子里忽然闪过物理课上老师讲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原理,把脚抽了回去。

数秒钟之后,一声闷雷般的巨响,一团火球从半空飞越校园,紧接着,二楼楼上几声惊叫。红卫兵们从开会处跑出来,只见土炮的炮身把板凳炮架撞碎,在地板上捅了一个窟窿,炮身滚到墙边,墙壁被砸下一块。那几声惊叫发自小何及身边的人:他们的腿脚幸亏没有做炮架的延伸。

“工程师”的第三个军备项目属于高科技,他设计出遥控飞机模型,力图使模型悬挂炸弹飞行一千至二千公尺,对准敌方的武斗据点大楼,撞上去引爆。飞机模型遥控飞行已经试验成功,可

惜载重量太小,不足二公斤。这般细小的黑色火药炸弹,很难对结构坚实的大楼造成有效的破坏;于是“工程师”就把全部精力用于研制高效固体炸药,也招到了两三名不怕死的助手。大概是在1968年的夏秋之交,晚间九十点钟的光景,从“工程师”的实验室里,发出沉闷的连环爆炸声:他们在朝炸弹壳里装填火药的时候,挤压过紧,一枚炸弹首先从“工程师”的手掌中开花,引发旁边的火药爆炸。万幸的是实验室里的几枚炸弹都没有封口,不然他们全都没命了。“工程师”本人被炸成一级伤残(仅次于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特级伤残),助手们三级伤残。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冲进实验室时的情景:满屋浓烟,昏黄的灯光下,三个人在地上打滚;皮肉烧焦的臭味呛得人难以透气,我们手臂中的伤员痛苦地号叫,他们的头和手覆盖着暗红的血浆和灰烬。

使 枪

延续一年的真枪实弹混战期间,对方“红肿”控制着宣城的城北边和西边,武斗大本营设在北门底的发电厂,因为那儿有全城最高的厂房大楼。我方“脸紫”控制着城东边和南边,武斗大本营设在东门的面粉厂,因为那儿有全城次高的厂房大楼。城中部的十字路口和城周边的公路线,是双方拉锯战的争夺之地。居民们夹在两派之间,提心吊胆,时不时地有无辜民众伤亡于流弹之下。

我们多了一些武器装备后,就试着稍稍扩张地盘。宣城俗称乌龟地,十字路口是乌龟背,又有一栋带顶四层楼的百货公司(全城最高的商业建筑),和一栋带顶三层楼的食品商店,战略地位不言自明。某一日我方得到情报,敌人刚偷偷占据了那栋百货公司大楼。此事若是真的,后果会很严重:他们的火力能居高临下直接威胁到东门大街的一小半,我方的势力范围要向后缩减五六百公尺。“联指”的头头们急得火烧火燎,“大肚子”当即请战,带领一个小组前去探个真伪。为了表示能独当一面,他坚决要求此一重任全由小将们完成。

领到军令后,“大肚子”亲手点了五个高中生红卫兵再加上我;我本不在他的考虑之内,但他

没办法拒绝我,因为我是他的最亲密的战友(他日后所有的恋爱信都出自我手,虽然没有一例成功)。我们六个人都把平日佩带的手枪留下,换上长枪,只有“大肚子”例外,长短枪各带一支。我的是仿苏制“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带刺刀,枪不重,很易瞄准,可惜子弹太少,才二十来发。早年国民党正规军讥笑共产党游击队是“官比兵多,兵比枪多,枪比子弹多”。我们红卫兵造反派的境况,也相差不多。

趁着夜深无人,我们蛇行猫爬,沿着破烂的老民居之间的狭窄巷道和浓臭的污水沟,慢慢地接近了十字街。一贯咋咋呼呼的“大肚子”,到了关键时刻,机警过人。他说咱们不能冒冒失失地去侦探那栋目标百货公司,如果“红肿”的人已经占了它,守备部队一定比咱们这支侦察小组强得多,我们不如先探一探它对面的那栋食品商店。

朝食品商店的后院扔了两块小石头,没有反应,我们在外面又等了好一会儿,还是没动静,就撬开商店后面的防火门,爬上二楼。那个冬夜的月光很好,照着厚厚的积雪,反射出淡雅的光,我们即使不敢开电灯,也能模糊看到靠近窗口的室内布局 and 室外的大物件。隔着宽宽的十字街,那栋百货公司大楼里却是黑洞洞的一片。我近视,当然看不出什么异样,两位眼睛敏锐的战友——其中一位是差点当了土炮架延伸物的小何,以后他成为空军飞行教官,眼力端的是好——隐约瞧见百货大楼里有烟头的火星闪烁。“大肚子”脑筋一转,从窗户上卸下一块玻璃,自己猫缩在窗沿底下,背靠墙壁,举起玻璃的一半,朝百货大楼那面晃动。玻璃把月光反射到对面,微弱的一团银白色,那里面立刻就有了动静:一管机关枪从百货大楼窗口伸出来。好了,证实了!“大肚子”派一个自称“齐天大圣”、长跑特棒的红卫兵马上赶回“联指”大本营去报告,并说这栋食品商店楼不能再给敌人占领了,我们红卫兵侦察小组一定在这儿坚持到援兵上来,人在楼在。

这食品商店楼的二层有两个楼梯口,一个被办公桌椅堵死。“齐天大圣”一走,我们剩下的六个人就各守一个方向,“大肚子”中央调度,兼顾四面。我们主要防守在几个大窗户旁,从那里可以眼观各处。等了两个钟头,大本营还没有派增援队伍上来,我们又饥又乏又提心吊胆。“大肚

子”自己的烟瘾也上来了,不敢抽,怕给对方发现。我们也都劝他忍忍,天亮后再抽就不怕火光被敌人看见了。

可是肚子饿的问题却不能再等待!食品商店楼的二层是办公室,地面一层才是零售柜台。要弄到吃的,必须到下面去找。我和一个姓程的中学前平衡木冠军饿得最熬不住,就从楼梯摸下去。下面的几扇厚重大门都封得严严实实,并没有透光的窗口,我俩又不敢开灯,像做贼一样顺着玻璃柜台东摸摸,西捏捏。绝大多数的柜台里都是空空荡荡,摸了好一阵,手才触到一格柜台里剩有的一袋物品,我俩喜出望外,抓过来,再摸索。黑暗之中,“哐唧唧唧……”一串响,柜台里一只空搪瓷盘子被我们弄翻,滚下地来。

这一串响,在那战时状态的万籁俱寂的冬日的凌晨,真是空谷长啸,余音不绝。突然间,对面百货大楼厉声喝问:“食品店里有人,干什么的?快出来!”我们哪敢吱声,缩手缩脚往楼上退。对方连喝问几声,都不得回音,“啪啪”朝我们楼下打了两枪,子弹射穿厚木门,闷声闷响。“大肚子”憋到现在,一肚子火,倚着窗口斜角,回了一枪。这下子等于互报名号了,对面的机枪毫不迟疑地扫过来一个连发,把一扇窗户的两页玻璃给掀了。

我们可怜,既无机枪,又少子弹,跟对方较量不起来。但年少好胜且好奇,给人白白打枪,不甘心;分吃着我和程前冠军从楼底下搜索到的那袋子东西——提到楼上才看清是冰糖冬瓜条——大家寻思该怎么办。“大肚子”说天已经蒙蒙亮了,玻璃能发挥点新作用了。我们分了工,枪法次的两个人(当然包括唯一戴着眼镜的我)学“大肚子”那样,轮番举玻璃;枪法好的人伏在窗口角落,瞄准对面百货大楼的窗户。玻璃一举,一片白光闪出,对方就扫过来几枪,咱们的枪手便趁机回击一枪。我们觉得这是好战术:诱敌人伸出头,好打;引敌人多开枪,耗他们的弹药;与对方磨时间,等我们的增援部队上来。

后两个目的多少达到了,特别是最后一个,要是我们老不开枪,“红肿”的人一定会大摇大摆地过来搜索。第一个目标却没有有什么进展,咱们的那几个枪手,武艺实属平平,还击的枪弹,最佳的也就是击中对面大楼的玻璃窗上,玻璃打碎咱好歹能听得见,就是没听见人中枪的号叫声。

我们六条好汉就这么守着,直到第二天中午,都不敢下楼去,因为食品商店一层临街的那面只有几根水泥柱,大部分是厚木板的门面,挡不了机枪扫射的。咱们六个小将的子弹加起来也不足三百发,吝啬地零零星星地向对方射击着,只求唬住他们不要穿过十字街冲到我们楼下。这期间把我吓得不轻的,是“大肚子”要替换我,举一举玻璃挑逗敌人;他一米八零的个子,稍不留心,玻璃举得太高,给对方一梭子机枪扫过来,正中他手里的玻璃,击得粉碎,碎片弹到我俩的脸上,细小的血珠滋滋地滚下来,我们趴在楼板上,老实了很多。直到第二天午饭时刻,“联指”大本营派遣的增援队才携带两挺轻机枪到来,把我们给换了回去。他们好几个是退伍军人,一副对枪林弹雨满不在乎的神情;他们最受不了的,倒是我们在楼板上留下的浓烈尿味:我们怕下楼挨上枪子儿,将小便全放射在楼板上。

在我们那儿的武斗岁月里,血淋淋的豪言多半是红卫兵小将说出来的,血淋淋的壮举却多半不是他们做出来的。在武斗全过程中,工人叔叔们都护着小将,厮杀的时候冲在前头,撤退的时候殿在后头。

宣城的几场恶战,我们一派的生力军是码头工人。数百年来,码头工人挣一口饭吃,靠的就是力气、勇气和义气。他们的基本工具,是一辆双轮人力板车,装满了货物,足有千把公斤。上货卸货,凭的是一副肩膀;拉车推车,凭的是一双手臂。你要想象他们的体魄,看看长江三峡背纤船夫的老照片,就差不多了。

码头上的活,太弱了,是抢不到手的,为了护地盘,打架是常有的事。一人对一人的架要打,一人对一群的架也得打。打得吐血,从板车扶把上解下酒壶,仰首喝几大口,再打。对手喝这护气止血酒的时候,任你是生死仇敌,也不能出手相击,一直要等到他把酒壶挂回车把,抹抹嘴,才能再接着打。打伤打死,双方都不报案,认了。自幼在江边长大的我,路上遇到肩头搭着腰带、手里提着酒壶的码头工人,会闪过一旁,心存敬意,为他让道。

武斗一启,码头工人的“钢筋铁骨战斗队”全都加入了我们一派,建筑工人的“铜墙铁壁战斗

队”则加入了对方派;生死相搏,乃由他们承担。两派的战斗,均有实战经验丰富的退伍军官幕后策划指挥;我们这方的军师是在朝鲜战场上跟美国兵打过死战的一名黄团长,对方的军师是抗日战争中的一位战斗英雄营长,旗鼓相当。

那年(1969)开初,我方的突击队趁对方元宵节过小年的时候,半夜里摸到他们的大本营附近,横扫了一通机关枪,轰了几发迫击炮,把他们打了个措手不及,还绑架回来两个俘虏,得到对方的一些军事机密。“红肿”头头为此大为光火,精心设计了一套谋略。他们先是发送一支车队,帆布车篷包装严密,接着派一个两面奸细暗中透风,说那支车队运送的是一批军火。我方最缺武器弹药,得此情报,颇为心动,派出两个排的兵力七十多人,携带两挺轻机枪,每人配备全自动和半自动冲锋枪,从东门穿过几条曲折小道,直插城西边的公路口。

对方的生力军早已沿途埋伏,兵员、武器、弹药都多过我方几倍。一场恶战,他们伤了三四个;我方拖回来七八具尸体,轻重伤员十多名,死伤的都是“钢筋铁骨战斗队”的码头工人。一辆辆半新不旧的板车上——那是他们生前赖以养家糊口的伙伴——躺着满身弹孔的工人叔叔,他们就是不再呼吸了,也像水泥雕塑那样威风不减。失去丈夫的婶婶们携着半大不小的一群孩子,在寒风中吼叫。这些妇女多年相伴丈夫劳作于强者才能生存的码头,在刀口上舔饭吃,养就一副粗放刚烈不认命的豪气,哀哭不出几声,落不下几滴泪,只嚷着要亲手复仇。在空旷的库房里,遗体供战友们凭吊了三日,那几天我用毛笔写挽联写到手腕红肿。出殡那天,领头的是十六人持执的“联指”巨幅战旗。接着是八部卡车,每部载一架三公尺高的花圈(皆是钢筋焊接而成,花也是铁的)和一具棺材。接着是三百名“钢筋铁骨战斗队”的码头工人,每人右手执一柄粗木棍——那是他们日常劳作搬运重物时支撑板车的杠杆,左手挽白色粗布腰带。他们以数百年不变的行头,护送着亡友。凛冽寒风中,众人均是粗布褴褛单衣,隐约露出古铜色的肌体,那场景,宛然重见秦末田横五百壮士。■

(作者为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黄 钟)

随卫毛主席江青

○ 华方治

1962年9月中,汪东兴叫我到中南海南楼他的办公室谈话,说要调我到一组去工作,一组就是毛主席处。当时中央常委的卫士组,按毛、刘、周、朱、陈的顺序,编为一、二、三、四、五组,并说:“到毛主席处,得先到江青处,因为他们是一家。”我一听到江青处,就打怵了。当时警卫局好多人都知道江青不好侍候,有几个人被她骂走了,我说:“我从小在部队长大,知识面很小,工作难以胜任。”汪东兴说:“你们山东人聪明,工作没有问题,你准备一下。”我听出了事情已是没有商量的余地了,就说:“那就试试看吧,我心里没有把握。”就这样定下了。我回来向杨德中政委报告了和汪东兴谈话的经过,第二天就到丰泽园一组值班室报到,他们说需要带的是个人生活用品,到走的时候会通知我,那些天,上班都是去一组值班室。

10月3日,江青与我们随行人员乘车去西郊机场,汪东兴前去送行,在登机时,汪东兴向江青介绍:“这是华参谋,随你去工作。”江与我握了握手,我们就上飞机了,同行的还有警卫处沈同副处长,厨师程师傅,护士程美英,服务员张素兰。我们乘的是伊尔-14飞机,上机后,江青躺在专门为她准备的床上,用布帘子,与我们隔开。一段飞行后,飞机降落在上海机场。上海市公安局黄赤波局长、警卫处王济普处长等去机场接我们,江青住到了西郊宾馆,此处解放前是一资本家的别墅,外围是竹竿苇子篱笆,里面种的果树,一道水沟隔离着,里面是草坪,里外共是3道隔离带,有警卫部队保卫,这里毛主席曾多次住过。

江青每天早晨八九点钟起床,打电铃,服务员小张上去侍候她穿衣、梳洗,吃完早点,看文件、报纸,有时叫沈同副处长、护士和服务员上去打扑克。吃完中午饭江青由沈同陪着散步,下午还是看文件或者打乒乓球。晚饭后散步或打扑

克,有时候看话剧、京剧。

出去看戏时,江青和司机坐前排,沈副处长、护士和上海警卫处孙立志同志坐后排,我和程师傅、服务员小张坐随车。记得一次看京戏《杨门虎将》,是杨七郎被俘于辽军,在战场上七郎杀回马枪时被辽军乱箭射死,江青认为此戏是歌颂叛徒,气得唠唠叨叨地说:“看了个叛徒戏!”回到住地后立即给柯庆施打电话,次日早晨报纸报道:“此戏因故停演。”

江青打乒乓球时,都是警卫处王济普处长陪打,我们负责捡球。王济普同志文革期间为江青搜集其年轻时在上海的一些不光彩的材料,到北京给江青,被江青烧毁,又把王济普投入监狱,害死在狱中。

在此期间,江青以请吃大闸蟹为名,分别请柯庆施、陈丕显、曹荻秋来宾馆吃饭。

江青还去锦江饭店对面的法国俱乐部玩,俱乐部有吃饭、跳舞、游泳、保龄球、台球等多种活动。记得吃过饭,她还让一位冯师傅教她打台球,冯说他13岁就打台球,已打30多年的球,当时50多岁了,他介绍:球分推杆、拉杆,他打起球来可以连续得分,连续打下去,他和江打球时,有意让江,否则他可以一直打下去,而江就一直无机会打。

江青爱好照相。我们工作人员在大礼堂的玻璃上发现了一只蜜蜂,沈同副处长说:“把它逮起来,留给江青同志照相用。”又说:“这不是修了嘛。”意思是江青生活修正主义了。当时我听了一惊,这要让江青听到,还不惹上大祸。

江青为了表示谦虚与群众打成一片,提出外出她要坐公共汽车。沈同副处长说:“江青同志,您可不能坐公共汽车,那样做要出麻烦的,一是您的安全没法保证;另外,群众出于对您的热爱,都想看看您,肯定会造成拥挤,要出乱子的。”江

青后来再没提此事。

江青这次来上海,没有看过电影。工作人员考虑给她调剂一下生活,和她商量能否看看电影。她同意了。于是在礼堂安排放电影。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和沈同副处长陪同。我们工作人员关灯后悄悄地进去。开始调银幕光,我们认为很好时,她说不行。继续调。调到 we 感到目眩,头开始晕了,江青突然大喊:“我的妈哟!晕死我啦!”灯突然亮了,江青两手捂着双眼瘫在沙发上。护士赶忙上前照护。她继续嚷:“我本来不能看电影,这都是你们想看,来鼓动我……”气氛顿时紧张,电影没能看成,江青被护士搀扶着回了她的房间。

江青怕声音,她的听觉特别灵敏,即使是微小的声音她都能听到。她提出,夜间她的房间地下有响声。这可惊动了宾馆的领导。宾馆管行政的刘科长带领工作人员连续3个夜晚在管道地沟里检听。终于弄清响声是暖气管子焊接处,水流到那里由于阻力,发出“刺溜”的微小声。原因找到了,立即采取措施,把首长房间地下水管有焊接的管子全部换成无焊接的。换后,再听没有声音了。

江青散步都是由沈同副处长和护士程美英陪同,程美英搀着江青。江青怕声音是出了名的。一次江青问沈同:“沈副处长,我们走路裤子有声音,你怎么没有声音?”沈副处长:“我这儿提着呢。”(即两手提裤子外侧,裤子内侧互不摩擦就不会有声音了)江青听了哈哈一笑。其实,江青也不是什么声音都怕。比如,跳起舞来,音乐响声很大,却从来没听说她怕这种声音。

上海还为江青办过舞会,也是在俱乐部,此舞厅的舞池是椭圆形,弹簧地板,跳起舞来省力。跳舞时,沈同几次要我去请江青跳舞,我说:“我跳不好,不好意思请江跳。”沈同说:“跳好跳不好是技术问题,请不请是礼貌问题。”我一听,可不敢失去礼貌,于是就硬着头皮去请江青跳舞。跳了两次,休息时,江青去了休息室。次日我问小张:“首长说什么了?”小张说:“首长说华参谋紧张,我也紧张,出了一身汗。”

12月初,毛主席去了上海,在毛主席生日时,江青交代,要请上海的工作人员和北京去的人员吃面(有酒菜)。上海市委王副秘书长参加,

次日上海请我们吃了面。

张耀祠副主任找我谈话,要我在江青处工作,我说:“我不行。”张耀祠说:“不要说不行。”之后张耀祠和江青说要我在他那儿工作,江青说:她那儿不需要人,要我到毛主席那儿去吧。张后来对我说:“你跟我们走吧。”即和他一起跟主席走,于是我离开江青。

毛主席在上海住了段时间后,又乘专列直奔杭州。我按张耀祠主任指示随车同行。上车后,在主席的车厢见到一位新人,大眼睛,梳两条大辫子。我问:“这位是谁?”别人回答:“这是小张(后来知道叫张玉凤)协助小×(老列车员)工作。”也就是新上车的见习列车员。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张玉凤。到杭州住在汪庄。汪庄位于已坍塌了的雷峰塔遗址的南边。我们察看周围环境时登上去过。雷峰塔只剩底座及一些碎石破砖,一片瓦砾。主席住的平房屋顶还低于塔基。雷峰塔是在一座小山上。汪庄叫汪庄招待所,所长姓刘,是王芳(时任副省长兼公安厅厅长)的夫人。在此处主席接见过几批外宾。我记得见过班达拉奈克夫人,班夫人的安全官拿走宾馆一大花瓷盘。他说:“毛主席住的地方就是皇宫。要拿件皇宫的东西留作纪念。”

住了几天后又乘专列去南昌。专列停在一军用机场。方志纯省长专门到列车上看望我们工作人员,还带了大米、花生、肉和油。他说:“你们在首长身边工作紧张,很辛苦,需要把伙食搞好些。”主席还进城到旧励志社也就是古滕王阁遗址的宾馆接见过秘密来访的外宾。当时负责接待工作的是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静大姐。水静指挥服务人员给主席和外宾上茶端水送饭上菜。一片紧张忙活。水大姐为人精干机敏,待人热情,善交际明礼仪。

在机场,主席散步时,本来有一条平坦小路,主席不走,偏偏要下一个被雨水冲出来的约2米深底宽2米多的大坑。张耀祠急了大声喊:“华参谋!”没等他说完我已跳下坑底了。大家在上边拽,我在下面接,总算使主席安全地下了坑底。主席气喘吁吁还发出“嘻嘻”的笑声。■

(作者曾为中央警卫团常务副团长)

(责任编辑 黄 钟)

林彪“散记”中对毛泽东的思考

○ 李根清

林彪的“散记”

林彪的大脑像一台计算机，每天都在不停地高速运转。

从他自己随手写的和口述的文字看，林彪每天所思所想有军国大事，如政治、经济、军事等，有哲学、历史、马列主义理论，有穿衣、吃饭、出汗、着凉一类生活琐事，也有对于一些人物、事件的思考。

林彪许多重要决策是在这种思考中形成的。如关于“四个第一”“三八作风”“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的提出，关于突出政治的指示，关于取消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的建议，关于在京津等无险可守的平原地带建造人造山的建议，关于加强部队在江河湖海和水网地带军事训练的意见，文化大革命中关于保持军队稳定的指示，命令，以及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等，都是踱步中做出的，考虑成熟就口述下来，然后制成正式文件，下发落实。

林彪大量所思所得所言没有公之于众，只是被保存在档案里，或是写在一一张张散纸上，或是记在书本里，或是写在卡片上。林彪每天在不停地思考，同时也在不停地写着心得笔记。这是林彪的习惯，有所得必有所记。叶群常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千年文字会说话。”林彪就是天天用“烂笔头”，给后人留下许多“会说话”的“千年文字”。

下面摘录几例，看看林彪每天都想些什么，记些什么：

例一：“中庸，张春桥、柯庆施”。这是林彪口授由我写的一张卡片。“中庸”的“忠”字，我写的是“中”，林彪在下面又加了个“心”。林彪心目中的张春桥是一个只会耍笔杆子、喊口号的平庸之辈。

例二：“人是物质中最重要物质，不尊重人就

会犯最大错误，青（指江青）威风正在犯大错误。”这是林彪口授让林立果写在《毛主席语录》上的一段话，说明他对江青的不满。

例三：林彪写了许多关于马列主义理论研究的笔记。他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物质的可分割性……几个原子总是结合在一起——分子”这段话旁边写道：“恩格斯未解决此点，而列宁则解决了，列宁说电子也是可以分割的。列宁有牢固一是多的观念，而恩则无，列高于恩，列由多引出二，恩是硬套成二”。

例四：林彪认为立场是决定观点、方法的。他写道：“立场、观点、方法之比重（是）7:2:1”。

他还写道：“两点（论）是说明问题（的）方法，解决问题要用唯（物）论，查明情况才能定（性）质定政策。”

例五：林彪重视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他写的散记中有大量关于发展经济的内容，比如他写道：“只有影响人的生活的事是社会最大事”。“猛发展这一点”是“人类的灵魂、国魂、党魂，劳苦大众的良心，负责人的气概，高贵的品格”。党“须为经济努力”。善于倾听群众的呼声和了解他们的迫切需要是“党兴亡定律”。

例六：在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的情况下，林彪总想避免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他在一张散纸上写道：“古策：（1）主先臣后（切勿臣先抢先）；（2）主倡臣和（切勿臣倡或不和）；（3）主劳臣逸（视察之类）”。

林彪不爱交际，他认为“交际搞不出名堂来（且有百害——坚决天马行空）”。

例七：关于政策，林彪写道：“左中右——三节，用中节，循天命，勿过，勿不及”。“左的政策只能领导少数左倾分子，右的政策只能团结右的少数分子，中间政策就能团（结）左及中，也能使右接近，只有这种政策能团结多数。”所以应该“左而留中。左，但反极左极右而成之”。

例八：林彪精心研究战争，写了许多关于打仗的笔记。其中，我在一张卡片上就记了林彪这样几句话：“唯利是图，唯胜是图，纵虎归山，战争中要善于投机取巧，见利则进，不利则止（仗不在大小）。”

叶群把林彪每天随手写的、闲聊说的、口述的文字称为“散记”，甚为重视，时常整理、追记。在叶群办公室有一个被称作“卡片柜”的木头柜子，是专门用来保存卡片资料的。其中，就有许多是经叶群整理后的“散记”卡片。叶群办公室还有一个小保险柜，那里还有叶群的追记——《一〇一笔记》，林彪与叶群聊天时林彪的言论，叶群就追记在这个笔记本里。

每当整理“散记”，叶群都会让我去帮忙。一般的是把林彪亲笔写的制成卡片，存入“一〇一”卡片专柜；把林彪与叶群聊天时说的，记在《一〇一笔记》里；也有林彪亲笔写的一张张散纸，被原封不动地存进“一〇一”“手迹”专柜里。

叶群做事不专一，时常边整理边打电话，一个电话能打一个多小时，一句“那就这样吧”不知重复多少次才会把电话撂下。所以，每次整理“散记”都要花上几个小时。

在林彪的“散记”里也有对毛泽东的思考，从中可以看出，林彪并不像在公开场合所说的那样，毛泽东什么都正确。

林彪心中还有另外一个毛泽东。这个毛泽东不是完人：

一是，理论上“使人迷糊”。

林彪读过我给他抄写的毛泽东《矛盾论》中的一段话“按照辩证唯物论的观点看来，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中”之后写道：“指什么呢？有时是指总体，有时是指两成分，有时是互冲突。悟出，一指化合体，一指两成分，非同语异议，故使人迷糊了。”

林彪还写道：“没有单纯的过程，一切都是可再细分的，此点毛尚不了解。”

他在一张散纸上写道：“辩（证法）之基（本）规（律）为联（系），而非动、质、矛。斯毛（指斯大林、毛泽东）未如此了解，他（以）为矛（盾）为基（本规律）。”

毛泽东说：“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林彪则认为：应该加上“感觉、概念、实验”。林彪写道，获得正确认识，不仅是和实践的关系，还有“和感觉、思维的关系”，“单只实践仍

得不到（正确）认识的”。

可以看出，林彪并不完全赞同毛泽东的一些理论观点。

二是，“自我崇拜”。

林彪在《学文化词典》一书“个人崇拜”词条旁边写道：“他自我崇拜，自己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

在林彪看来，毛泽东的“最大忧虑在表决时能占多数否”。

林彪认为毛泽东搞“小帮帮”。所以他说：“毛应该照顾他，使他没有小帮帮的必要，他就不小帮帮了。政治上对其每一创举与功绩公道主动的指出来，则他自无锋芒的必要。”

三是，“忌才”。

林彪认为艾思奇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但是毛泽东却不重用他。对此林彪写道：“艾之不起，乃因一号（指毛泽东）怕他影响超过自己之诡计也。才之害，忌才，故大智必愚。”

在毛泽东之下，不露才能，不出头，这是林彪的要领。所谓“不建言、不批评、不报坏消息”的“三不主义”也是为了避免毛泽东的猜忌。

四是，“捏造”。

林彪在《新华月报》的一张散页上写道：“他先为你捏造一个‘你的’意见，然后他来驳你的意见，并无，而捏造——老东的惯用手法，今后当注意他这一着。”

林彪时刻警惕陷入党内斗争旋涡。他深知，毛泽东的权威是不容挑战的。所以，他的选择不是对抗，而是被动自保。从“散记”中，可以看出林彪自保策略主要有三：

第一策是“拥”。

林彪在《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一书中写道：“终生不犯错误之法，得个拥××的称号。”“仿斯之于列、恩之于马、蒋之于孙”，“人工的、有意识的、主动的、正面的、去作出拥的表示。”

“最迅速地响应他人每一新的倡议，因为他正迫切等待着别人的态度。”

从这里可以看出，林彪“高举”“紧跟”是有私心的。

第二策是“顺”。

林彪与毛泽东打交道几十年，深知毛泽东对敢于违逆自己意见的人是从不留情的。彭德怀、

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一个一个地倒台,使林彪懂得了“犯上者殊,用上者存”的道理。所以,他把“顺”“大顺”作为自保的“总诀”。林彪写道:“……有个永远不犯错误的办法,就是不提不同主张,永远不会出乱子,听命。”“自主事——唯胜是图(对下对事)。他主事——惟命是从。”“不为一号事先,动而辄随。”

林彪并不认为毛泽东的主张、决策多么正确,他说“同意,非同意其事,乃同意其人”。

第三策是“默”。

林彪把“默”“大智若愚”作为一条行为准则。他写道:“国有道则言、国无道则默。”“一个车只可一个司机。你先说,他不同意怎么办?故宜后帮。”“你先说了东,他就偏说西,故当听他先说才可一致。”“莫性急、莫立即回答,迟几天无关系,等请示和商量后再回答,中宣部国庆节规定口号的教训不可重复。”

以上可以看出,林彪在毛泽东面前是非常谨小慎微的。

“听文件”

林彪不参加会议、不看报纸、不听广播、不接触群众,又很少会客,获取信息就是靠每天上午、下午听秘书讲两次文件,每次不超过半个小时,此外就是听叶群给他“说事”,或者是听儿女给他讲点事情,远远不能兼得方方面面的信息。就是每天两次听文件也坚持不好,常常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我每天都及时把收到的文件、电报、信件等进行初选、分类,然后分送给分管秘书,由他们向林彪报告。秘书也不是逢文必讲,凡事必报,还要精挑细选,分析综合,归纳整理,以便能用最简洁的语言、最少的时间,把国内外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报告给林彪。因为半小时实在讲不了多少东西,所以不少时候,只能把需要林彪表态的中央内部传阅件讲给他听。林彪如果出汗了,传阅件也讲不下去,不论文件上有没有“急件”“特急件”的标签都得等着。秘书常常上午等下午,下午等明天,明天又有新文件、新情况,于是手头“待讲件”越积越多,只好天天“挤水分”,把可讲可不讲,可多讲可少讲的文件一压再压,精而又

精,只要听到内勤通知“首长要听文件”,便拿起文件夹一路小跑到林彪那里去。

秘书给林彪讲过的文件都会打一个“√”,与我收到的文件数量相比,打了“√”的文件实在是寥寥无几。

秘书给林彪讲文件需要有较强的分析综合能力,要能从大量的、零碎的情况反映中抓住苗头性、方向性、本质性的东西,要能用高度概括的语言报告那些重要的、复杂的事情,不能照着文件念,也不能离开文件随意发挥,还要吐字清楚,举止自然。秘书赵根生就因为爱皱眉头多次被叶群批评。

林彪对怎样讲文件曾经向秘书提出过明确要求。他说:“为了节省精力,你们要侧重于方向性、政治性的内容,给我讲也主要讲方向性、政治性的,也就是大政方针方面的、原则性的东西。少讲数字、比例。这些东西是常改动、变动的,记也记不住,而方向性的东西则是管一个时期的。太专门性、太专业性的内容可大大省略。”

叶群也经常交代秘书给林彪讲文件一定要“少而精”。她针对秘书“怕误事”的心理,经常说:“天塌不下来。天塌下来有我和首长顶着呢!”久而久之,一些秘书的急性子都被磨了下来,甚至忙里偷闲,下棋、打乒乓球、扯闲篇。

林彪之所以不亲自看文件,不拿处理公文当作一回事,源于他的身体,也源于他对文件的看法。他写的“散记”里就有这样的话:“文件——死的,如山之多,抛到九霄云外。人——活的,大有启发,闲聊出火星,出燎原大火”;“文件藏头掩尾,修饰打扮,不易看出重点、本质”,所以“勿听演讲、文件,作文,而应聊天,有一针见血(本质),开门见山之效”。

由于林彪对文件的消极态度,给叶群越俎代庖提供了便利。叶群经常对秘书说:“首长今天身体不好,有什么事给我说说吧。”如此这般,许多本来应该由林彪当家的事情便由叶群擅自做主了,许多本来应该让林彪了解的重要情况也被叶群“贪污”了。即便如此,叶群还命令秘书“不要从右边往首长耳朵里吹风”,从而又使林彪丧失了许多事情的知情权。

叶群为什么告诫秘书不要从“右边”往林彪耳朵里吹风呢?这起源于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



周恩来、林彪与毛泽东在一起

东的一个批示。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的一段时间,林彪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确实关心了一阵子。有一次,他把一份反映西安、太原等地群众游行中极少数人呼喊反革命口号,把毛泽东像撕碎踩在脚下的《快报》送给毛泽东。林彪写道:“送主席阅。西北情况甚堪注意”,想以此引起毛泽东对局势的重视,不料毛泽东批示道:“林彪同志,这是大好事。左派要准备牺牲几千人,换取右派几十万。”

同一时期,周恩来也向毛泽东呈文反映,文化大革命以来许多地方党委、政府遭冲击,工作受到很大影响。毛泽东看后也批道:“不要如丧考妣,乱就乱他一阵子。我听说那里乱了,我就高兴。这个乱是乱了敌人,乱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还在那里按部就班的工作,我就不高兴。”

毛泽东对林彪、周恩来呈送文件的批语都在中央内部传阅。

毛泽东把林彪认为的坏事说成是“大好事”,把周恩来对社会动乱的担忧说成是“如丧考妣”,引起林彪、叶群的重视。叶群从此以“不能干扰毛主席的决心和部署”为由给秘书立下规矩:少给林彪讲文化大革命阴暗面的东西,更不能把反映阴暗面的文件推荐给毛泽东。从那以后,林彪就不再给毛泽东报送反映文化大革命负面消息的文件了。

宋庆龄是敢于对文化大革命说“不”的人。她曾几次写信给毛泽东和林彪,直陈己见,毫不掩饰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反感。有一次,她在信

中写道:我不懂文化,说小说都是政治,而且都是毒草,我糊涂了。一夜下来,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变成了走资派、反党集团、野心家、牛鬼蛇神。中央要我批判揭发刘少奇,我不会做的。少奇主席在党中央工作了三四十年,今天会是叛徒、内奸?我不相信,一个叛徒内奸当了七年的国家主席?现在宪法还有效吗?怎么可以乱抓人、乱斗人、逼死人?这种无法无天的情况、自己伤害自己的同志、人民,是罪行。我们的优秀干部从与国民党的战斗中

走过来,却死在自己的队伍中,这是什么原因?

宋庆龄的声音,秘书认为应该让林彪听到,却被叶群阻拦。她教训秘书说:“宋庆龄是什么人?她说什么都可以,可你们的脑子就不能是大镜面、大漏斗,来什么报什么。你们要做过滤器、加工机,要过滤,要加工。哪些该给首长讲,哪些不该讲,要心里有数。你们不能从右边往首长耳朵里吹风,不能让首长犯右的错误。”就这样,宋庆龄对宪法的呼唤被叶群这个“过滤器”过滤掉了。

那些年,中央专案林立,各专案组时常向中央报告一些审查对象的情况,如彭德怀、贺龙等在监管中的情况和诉求,刘少奇绝食、强迫鼻饲、冤死开封,邓小平在江西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信要求工作等,叶群都不准向林彪报告。她说:“这些事情有人操心,你们告诉我知道就行了。”致使林彪不能及时了解许多老干部惨遭迫害的真实情况。

林彪与叶群

林彪与叶群之间的关系用林彪给叶群的一幅题词概括也许是恰当的,那就是1970年初林彪写给叶群的条幅:“发不同青心同热,生不同衾死同穴”。后来,林彪又把后一句改为“生少同衾死同穴”。在这幅题词中,林彪称叶群为“爱妻”。这是在林彪写给叶群的诸多题词中第一次使用“爱妻”这个词。

叶群对林彪这个题词甚为珍视,叫人装裱后挂



林彪与叶群

在墙上,后来又镌刻在砚盒上。不久,叶群回赠林彪一幅:“为有恩情报不尽,他年相随到黄泉”。

林彪以往给叶群的题词,如“天马行空,独来独往”;“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等,都是告诫叶群要严格约束自己,不要逾越规矩,唯独这次对叶群说及生死,叶群也马上回应定将相随黄泉。

从林彪、叶群1942年7月结婚到1971年9月13日同机身亡异国他乡,两人做夫妻二十九年。但叶群不止一次流露,她跟林彪“并不幸福”。林立衡骂叶群是坏人,但也曾经说过:“作为一个女人,叶群也是不幸的。”

战争年代的林彪一心关注战争,精心指挥打仗,心无旁骛,对叶群的冷落不言而喻。1938年那次负伤,林彪捡回了一条命,但却造成了终生不愈的病痛,怕这怕那,又讳疾忌医,加上性情孤傲,不善交际,与性格活泼、不甘寂寞的叶群形成鲜明对照。1964年年底我到上海后,渐渐发现林彪与叶群并不同居一室。林彪住楼下,叶群住楼上,而那时林彪刚五十七岁,叶群才四十四岁。不久搬到苏州南园,林彪住南,叶群住北,后来叶群干脆搬到另一栋楼房去住。在北京毛家湾,他们各自的卧室分别在工字房的東西两端,中间隔着几十米远的数重房间。

林彪、叶群各自有自己的作息时间。林彪每

天早晨6点钟起床,晚上9点多钟睡觉,一年四季,按时作息,从不熬夜,且只要躺下,便不许打扰。叶群却是“夜猫子”,上午10点以前不起床,凌晨2点以前不睡觉。赶上开会,清晨四五点钟才睡下,中午十一二点才起床。躺在床上还要王淑媛给她做头部按摩,陪她“瞎”聊,时常聊得王淑媛打瞌睡,脑门磕在叶群脑门上。

林彪的饭菜单调乏味,从不讲究。叶群每餐四菜一汤,花样常新。山珍海味,南北佳肴。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在大连住时,一天她特地把饭菜端到林彪客厅,边吃边对林彪说:“这里的扇贝很有名,我叫他们给你做点鲜贝肉尝尝怎么样?”林彪摇摇脑袋说:“你吃吧,我不行。”

林彪一家四口人从不吃一个锅里的饭,人人有自己的食谱,人人有自己的餐桌,人人有自己的饭点。我从没有见过林彪一家人在一起吃过饭。偶尔见林立衡或林立果端着饭碗在林彪跟前边吃边聊。林立衡、林立果都很尊敬林彪,“爸爸”叫得很甜,但对叶群却不那么亲近。他俩跟工作人员一样,只叫叶群“主任”或“叶主任”,从不叫叶群“妈妈”。林立果背后称叶群为“叶胖子”,甚至“他妈的,叶老胖”。庐山会议后,林立果和叶群走到了一起。

林彪从不游山玩水,从不穿行于闹市,叶群却爱动爱玩。她跟随林彪每到一个地方,总要出门走一走,看一看,景区、商场都是她爱去的地方。上海、苏州、杭州的景点都被她看遍了。1965年4月到无锡只住了一个星期,她也抽时间到梅园、蠡园、鼋头渚去玩。每次游览回来她都会到林彪那里滔滔不绝,把看到的、听到的讲给林彪听。林彪不反感叶群说这些轻松愉快的话题。

林彪喜欢叶群活泼开朗,叶群给林彪讲笑话常使林彪乐不可支。但林彪又受不了叶群“说事”时的啰唆,常常制止叶群说话,有时甚至一连几天不许叶群见面。林彪相信叶群的精明,一些文件放手让叶群“把关”,但是又不喜欢叶群的张扬,限制她外出,限制她串门,限制她开会。1967年至1970年几年间,林彪除时常口头训诫叶群外,还多次口授“座右铭”让我写下来挂在叶群床头。比如“少吃多餐”;“开朗、愉快、活泼”;“说话

莫啰唆,做事莫越权”。在叶群被“假党员”困扰时,给叶群写“充其量坏不到哪里去,不要着急”,“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庐山会议后,又给叶群鼓气:“说到底,坏不到哪里去”,等等,都充分表现出林彪对叶群既喜又烦、既亲又疏、既放又管的心态。

庐山会议后与林彪的几次见面

庐山会议结束后,林彪没有直接回北京,而是又去了北戴河,在那里住到9月下旬才回北京参加国庆纪念活动。

1970年国庆节的报纸、电台、电视的报道依旧一派鼓乐升平气象,似乎不久前在庐山上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我们留守在北京的工作人员并不知道庐山上的变故,倒是叶群此地无银三百两,接连几天一个一个地找秘书谈话,有意无意地透露一些庐山会议的消息。那天叶群把我找去,见到我,一反过去颐指气使的神态,一副异乎寻常和蔼可亲的样子,忙从沙发里站起身主动跟我握手,招呼我坐下,问这问那,还问我身体怎么样,对象谈得怎么样。这种反常举动使我感到有些莫名其妙。叶群绕了一个大弯子后说:“这次庐山会议上陈伯达出事了,他搞的一个材料捅了娄子,主席批评了他,首长和我也批评了他。陈伯达是个文人,爱写文章,难免出差错,不过也不算什么大事,以后你若是听到什么,不要紧张,只管安心做好工作,如果收到有关陈伯达的文件,不要压,要及时交给秘书讲给首长听。”最后叶群问我:“你那里保存有陈伯达的书信、题词吗?”我答:“没有。”叶群说:“好吧。如果发现陈伯达的信件、题词直接交给我。”当时,我揣摩叶群的心思,是急于销毁与陈伯达来往的证据。那天,我发现陈伯达写给叶群的“继往开来”的条幅已经从叶群办公室东墙上消失了。

从10月中旬起,中南海发出的毛泽东写了批语的文件便一份接着一份送达“林、周、康”。关于陈伯达问题的中共中央文件也开始向全国下发。虽然毛泽东的批语只批陈伯达,但林彪心里清楚,毛泽东也是批他的。

过了新年,林彪把我找去,对我说“你写句话挂到叶群卧室”,接着口述道:“说到底,坏不到哪里去。”

当我照林彪吩咐去叶群那里取条幅准备写字时,叶群说:“不用写了。告诉首长,我知道了。”

1968年夏,有人揭发叶群是“假党员”,吓得叶群在林彪面前哭哭啼啼。那时,林彪就让我给叶群写过“充其量坏不到哪里去,不要着急”这样的话。庐山会议后,在叶群被毛泽东迫使做检讨的时候,林彪又向叶群传达类似的信息,说明在1971年到来的时候,林彪的心态还是平和的,甚至是坦然的。在他看来,他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错误,毛泽东不会把他怎么样。所以,他告诉叶群不要惊慌失措,不必紧张得睡不着觉。

但是,随着毛泽东采取“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角”等一系列措施,深入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步步向林彪进逼的时候,抱着“坏不到哪里去”心态的林彪,不可能再心安理得。一天,叶群叫我把毛泽东的一个批件拿给她,当我把文件送到时,她正在林彪那里。她接过文件给林彪念了毛泽东的批语,然后拿着文件在林彪面前晃动,显然有些激动地说:“你看看,这不是冲着你来的吗?”当我退出的时候,只听林彪厉声吼叶群:“你不要在这里烦我了!你走,我要休息!”当时我感觉,叶群是在林彪面前搬弄是非惹得林彪不耐烦,实际上此时的林彪可能真的有些烦躁不安了。

1971年4月15日至29日,中央在北京召开有九十九人参加的“批陈整风”汇报会,除继续揭发批判陈伯达外,对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五个人的错误进行批评。会议进行期间,林彪、叶群从北戴河回到北京,但没有出席会议。会议结束前,周恩来代表中央做总结。他指出:“军委办事组五同志所犯错误,是方向路线错误”,也就是“在政治上是方向路线错误,在组织上是宗派主义错误”。会后,中央决定,在党的基层组织传达陈伯达的罪行,在高级干部中传达黄、吴、叶、李、邱的检讨。之后,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各总部、各军兵种陆续向中央和中央军委报告传达讨论情况,纷纷表示拥护中央对陈伯达的处理和对军委办事组五人所犯错误的结论。虽说这些文件、电报都是表态性的,并不透露五人检讨的具体内容,却令叶群十分紧张。她把我找去交代说:“几个老总(指黄、吴、李、邱)是跟毛主席的,他们是上了陈伯达的

当,是好人犯错误。毛主席批评他们是信任他们,爱护他们。他们跟陈伯达的性质不一样,几个老总做检讨的事让秘书们都知道了不好,以后这类绝密文件、电报你不要送给秘书看了,直接交给我,我给首长讲。”按照叶群吩咐,此后一连几天,我便把此类绝密文件、电报直接交给叶群。当这些文件、电报再回到我手里时,我从上面看不到任何向林彪报告过的标志。

一天我给叶群送文件,只听她在电话里对人说:“林彪同志最近身体不好,人很憔悴,每天晚上要吃两次安眠药,体重只有八十多斤了……是啊,历史上都是支持的……没有想到啊……”

1971年五一劳动节,中央照例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焰火晚会。出发时间到了,林彪却表示请假,拒绝出席,说身体不好,上午的活动已经参加过,晚上的活动不参加了。任凭叶群怎样劝说,仍旧靠在沙发上闭目养神,一动不动。周恩来给林办来电话催促说:“主席已经出发了,也请副帅赶快动身吧,今晚的活动不参加不好。”林彪还是无动于衷。叶群见状,双膝跪在林彪面前哀求道:“你去吧。你要不去,咱全家都得死啊!”林彪说:“没有那么严重嘛!”他虽然这么说,还是缓缓起身,穿上内勤递过来的大衣,出门乘车去了。

按照往常,林彪总是要比毛泽东提前几分钟到场的,这一次,他迟到了。按照往常,林彪要在天安门城楼上送毛泽东离去后才会返回,这一天,他早退了。我们看到林彪的车开出去不过半小时就返回了毛家湾。秘书们感到惊讶。据跟随林彪上了天安门的内勤小毕说,林彪坐下不一会儿,毛泽东就起身去了休息室。少许,林彪也起身回了毛家湾。

5月中旬的一天,接近中午时分,林彪把我叫到跟前,对我说:“下午总理来,你找一张大大的纸,写几句话贴在这里。”他走出客厅,指着客厅门口南侧的墙壁说:“这里。”接着口述道:“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说完,林彪用双手比画出一个圆圈:“字要写得大一点。”

我回到办公室立即找出一整张白纸,用排笔蘸着红广告色把林彪口述的三句口号写了上去,在林彪午休的时候贴在了西客厅门外的墙上。那里是周恩来进门必经之处,我把字写得很大,

很扎眼,我想,总理进门肯定能看见,也许还会驻足看一眼。因为周恩来经常到林彪这里来,那面墙上是从来不贴字的,不知道周恩来看到林彪突然张贴在门口的三句口号有何感想。

过了几天,林彪向秘书于运深口述了一封给毛泽东的信,建议对现任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大军区的第一把手、第二把手实行“四不一要”的做法,即“不逮捕、不关押、不杀、不撤职”;“遇特殊情况,要执行主席面授的机动指示”。

林彪说,他是看了“批陈整风”汇报会的文件,“有的同志在担心着安全问题”才产生以上想法的。

林彪认为,经过五年文化大革命和“批陈整风”,“现任中央和中央局人员,基本上应当说是可靠的”。

林彪要求,把这一规定传达到卫戍区每个士兵,隔几个月传达一次,十年不懈。此外,林彪还建议把三十八军调离华北,等等。

林彪口述这封信的时候,毛泽东对林彪的信任已经动摇。军委办事组几个人的检讨已向下传达,军队干部有些人心惶惶。这封信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林彪对军队一批高级将领政治生命和人身安全的担忧。

于运深把信稿交给我,让我誊清后送林彪签发。也许是林彪又觉得自己的想法不合时宜,难以落实,或其他什么原因,这封信始终没有再交给我通过机要渠道送达。

我最后一次见林彪是1971年7月1日,那天是我结婚的日子。上午10点钟左右,我和爱人去见林彪和叶群,叶群会见后带着我们去见林彪。林彪正在客厅踱步,见我们进门便迎了过来。叶群轻轻拍着我爱人的肩膀向林彪介绍说:“这就是小李的爱人小刘。今天他们结婚,特地过来看看你。你看看,好不好呀?”林彪一边伸出手来与我爱人握手,一边连声说:“好,好。祝福你们!祝福你们!”当林彪听说我爱人的父亲是开滦煤矿井下采煤工人时说:“小李是农民家庭,你是工人家庭,都是劳动人民家庭,好,好!”这天,我看见林彪又消瘦了一些,但精神还不错,胡子刮得很干净,说话也有底气。

1971年7月16日,林彪又去了北戴河,从此踏上不归路。■

(作者为唐山市开平区政府退休干部)

(责任编辑 黄 钟)

计划经济时代的“黑孩”问题

○ 杨支柱

中国到底有多少没户口的“黑人”，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公布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时曾说是1300多万。“黑孩”的问题并非今日才有，也不是知识界和媒体自以为的是从独生子女政策实施以来才有，而是到1973年就不少了，以至于能引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注和表态。

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编辑、广西军区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1978年1月翻印的《毛主席、周总理、华主席对计划生育的指示》显示，华国锋至少连续3年谈到了“超生黑孩”问题。虽然书中注明“根据记录整理未经（华国锋）本人审阅”，但是考虑到1978年1月以前华国锋在中国政坛和社会舆论中的地位，那时应该没有人敢伪造他的言论。

1973年12月25日华国锋在全国防治慢性气管炎工作会议和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议上说：

有的地方规定，不按计划生育的不报户口。这不行。人家生出来了嘛，在新社会还要叫他健康成长。

1974年9月19日，他在接见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代表及女用长效口服避孕药科研总结会部分代表时又说：

有的规定生第三个孩子不上户口，不发布票，不给口粮，这都不行。去年也讲了，要靠宣传、靠过细的思想教育，强迫命令就会事与愿违，带来不好的后果。

1975年5月22日，在接见全国卫生工作会议预备会领导小组时，华国锋说：

要做好宣传工作，注意防止强迫命令。不要一说抓紧搞，就搞摊派指标，生了孩子不给报户



1975年户口簿

口。《规划》主观性也大。一个单位分两个指标，人家年轻时候生一个，一排指标，到40岁才轮到再生一个，当然这只是个别现象。有的单位卡得很厉害，怀孕六七个月还非叫流产不可。

有的内部刊物也提到了“黑人”问题。《公安工作简报》1975年第20期中有一篇题为《有些地区对不按计划生育的小孩不给报户口》的文章，摘登了《广东公安简报》增刊第十期的如下内容：

广东省公安局在进行一九七四年度人口统计工作中，发现有的地区对不按计划生育的小孩不给报户口的情况很严重。据统计，到去年年底，全省非计划生育的四万七千三百多个小孩，都没有报上户口。其中多数是不按计划多生的小孩，少数是不符合晚婚条件私自结婚生育的小孩。

在一九七三年和一九七四年的计划生育汇报会上，中央领导同志一再强调，对不按计划生育的小孩不要采取不给入户口的办法。但是目前有些地方仍未认真贯彻执行。这样做，使不少小孩没有户口，成为“黑人”，吃饭、穿衣、上学等都成了问题，不利于落实安定、团结的方针。不按计划所生的小孩，既然已经出生了，还是应当给报户口。广东公安局建议在省召开的人口规划现场会上解决这个问题。

仅仅广东一省到1974年年底就有47300多个“黑孩”，而公安部在按语中说这种做法“天津、浙江、福建、四川等省市也存在”。在高度集权的中国，通常一个地方发生的怪事就是所有地方发生的怪事。其他地方也未必没有，可能只是没那么多，未引起中央注意而已。

1977年1月，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室将它1976年收到的群众来信642封编成《一九七六年人民来信概况》，其中提到：

如规定四十岁以下已有两个或三个孩子的夫妇，都要作“结扎”手术，已上节育环的也要取环“结扎”，并限期完成；对未安排生育指标而又怀孕五个月的也要动员中止妊娠，个别的甚至派民兵强拖硬拉到医院。对思想不通，不肯实行手术的人，有的就扣发全家口粮，不让出工或出工不记工分，甚至倒扣工分；有的规定生第三个孩子起，扣发产假工资，不准报销住院费；有的规定不给报户口，或报户口不给口粮；个别工厂规定“小三子”喂奶的时间要扣工资，小孩入托要增收入托费等等。以上错误做法，严重影响了党和群众的关系。

到了1988年，[88]公(治)字106号《公安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加强出生登记工作的通知》中再次要求公安机关“摸清出生不登记户口的情况。凡经核实出生未登记户口的，应按有关规定办理入户手续”。《通知》中还说：

近年来，出生婴儿不登记户口的现象日趋严重，特别是农村地区，已成为户口管理和人口统

计工作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有些地方违反国家户口管理规定，搞“土政策”，不给超计划生育的婴儿申报户口。据统计，每年超计划生育的婴儿未落常住户口的约有一百万人左右。有些地方为降低出生率，无视户口管理规定，弄虚作假，对新生儿不做出生登记，而作为迁入人口进行登记，这是近几年每年末全国人口统计中总人口增长数比人口自然增长数多约二百万人左右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种情况极不正常。此外，由于一些群众法制观念淡薄，认为履行不履行出生登记，对个人无所谓，因而不主动申报、登记出生的情况也很突出。上述问题严重影响了户口管理制度的实施和人口统计数字的准确性，同时也影响了社会安定和人民日常生活。

此后，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前公安部都曾单独发文或与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发文，要求清查“黑人”，给没有户口的公民落户。■

(作者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黄 钟)

SIEMENS

西门子助听器

Hearing Aids

服务热线：010-84608877 400-610-0896

盒式助听器苏食药监械(准)字2012第2460530号
数字型耳背式助听器 苏食药监械(准)字2012第2460710号
数字型耳内式助听器 苏食药监械(准)字2012第2460711号

声望听力
www.sw-tl.com

注：请认准西门子标识 / 请详细阅读产品说明书或在医务人员的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禁忌内容或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
苏医械广审(文)第2013120253号 西门子听力仪器(苏州)有限公司

阳江“乱打乱杀事件”始末

○ 陈宝德 李学超

广东省阳江县的乱打乱杀现象始发于1968年1月5日。该日,程村公社中平大队支部书记、治保主任黄某主持召开群众大会,自立法庭,宣判枪杀两名地主。县公安局军管小组向县军管会副主任原某汇报,但他不制止。3月31日,新洲公社副书记黎某在蹲点的龙潭大队召开群众大会,斗打怀疑参加反革命组织、地主出身的黄万齐,致其重伤后,令民兵执行枪决。同期,新洲公社东安大队对一名从事副业的人搞逼、供、讯,迫其供出乌有的“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军”组织,即分别通知这一“组织”人员所在大队,这些大队枪毙了受株连的人。对此,县军管会也知道的,但不追查。

1968年5月11日至15日,湛江地区在海康县召开由县领导带队参加的全区公社革委会主任会议(简称“海康会议”),以“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和坚决粉碎右倾翻案妖风”(简称“反三右一妖风”)为主题。这次会议精神,提出“反三右一妖风”,要把矛头对准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一切阶级敌人,绝不能把矛头对准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其实质是在农村把斗争对准地、富、反、坏、右人员。会后,由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的派性武斗仇杀转向了对叛徒、特务、走资派、地、富、反、坏、右人员的残酷杀戮。贯彻“海康会议”精神,是阳江个别地方乱打乱杀现象演变为全县性乱打乱杀成风的直接原因。

5月15日,“海康会议”结束回阳江的当天晚上,县军管会主任于某召集参加会议的公社革委会主任开会,做了一个多小时报告。于某在报告中夸大了阳江阶级斗争的严重性,指出要反掉右倾保守,必须“敢”字当头,对四类分子要摸底排队,发现有破坏活动要狠狠斗,对资产阶级势力要狠狠斗。各公社要召开三级干部会,规模要大,声势要猛,行动要迅速。

各公社革委会主任回去后,迅速召开了三级

干部会,布置对四类分子摸底排队,对认为表现“坏”(实际不一定如此)者开展批斗、殴打、杀死、枪决,全县乱打乱杀现象愈演愈烈。5月24日,县军管会发出《关于召开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和坚决粉碎右倾翻案妖风大会的通知》,全县乱打乱杀现象加剧。至6月1日前,“海康会议”精神贯彻半个月,全县不完全统计,被枪决打斗死的地、富、反、坏、右人员及其子女178名。全县总共25个公社,有17个开始乱打乱杀,最严重的是织篢、溪头、程村、塘口4个公社,其次是大沟、雅韶、蒲牌、北惯4个公社。当时织篢公社革委会决定让各大队开展批斗地、富、反、坏、右人员及其子女,仅几天打死和枪毙四类分子及其子女55人。溪头公社各大队7天内枪毙、打死和自杀52人,并作为成绩向县军管会报告。

在乱打乱杀已成风的情况下,县军管会的领导积极执行“反三右一妖风”政策,表扬打死人的公社阶级斗争抓得好,批评未打死人的8个公社抓阶级斗争不力、保守,继续夸大阶级斗争严峻性,继续夸大自己队伍内部的右倾,并于6月1日至15日召开2800多人参加的“反三右一妖风”四级干部(县、公社、大队、生产队)大会。会议强调:要进一步组织群众开展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全面地、主动地向阶级敌人开展猛烈进攻;要进一步加强群众的专政,对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的破坏活动,给予坚决的打击;要批判自己队伍内部右倾保守思想。会上表扬溪头公社4月26日的做法(指炸溪头“红司”司令部小楼事件),同时指责了未有行动的公社、大队,说:“敌人磨刀,你们睡觉。”这次会议本质是在大规模乱打乱杀已成风的情况下继续鼓劲乱打乱杀。

会后,全县各公社都召开三级干部(公社、大队、生产队)大会,贯彻会议精神,各公社在会上都组织群众对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子女和某些所谓

有“罪”的群众进行批斗、专政,在批斗中,均有打死或枪毙人的,多则12名,少则1名。比如在程村公社三级干部会上,当场被打死12人。这样,就形成了全县乱打乱杀高潮。至7月23日,全县乱打乱杀致死573人,其中枪毙204人,打死274人,被迫自杀95人,乱打乱杀遍及全县。

1968年中央“七三”“七二四”报告下达后,县军管会才开始派员制止,乱打乱杀才减少,但不少地方仍不听制止而背着杀人,杀人行为依然在肆虐,至1969年1月中旬底才停止。乱打乱杀长达13个月时间,死亡909人,其中被枪杀的330人(内中有23人是在派性武斗中被打死的),被斗争打死的374人,自杀的205人。加上1970年至1971年“一打三反”自杀61人,共死亡970人。这970人中,地、富、反、坏、右人员435人,地、富、反、坏、右人员子女316人,一般群众111人,干部(含教师)37人,职工62人,其他人员9人。当时,全县共25个公社都出现乱打乱杀事件,最为严重的是程村、溪头、塘口、织箕等公社。程村公社就杀死90人。全县有乱打乱杀行为的大队233个,占全县大队总数373个的62.5%。

在乱打乱杀的过程中,所使用的手段极端残忍、野蛮,有用枪支射死的,有用锄头锄死的,有用木棍打死的,有用石头砸死的,有用匕首刺死的,有用禾叉叉死的,有用鞭炮炸死的,有用煤油烧死的,有用河水淹死的,有直接活埋或被打得半死后活埋的,还有用铁线穿鼻子的。

导致乱打乱杀这一灾难性局面的政治原因,是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在这一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是对“阶级斗争思想”的迷信和“人道主义思想”的批判,是全社会对法律的践踏和蔑视,是“群众专政”对法律的践踏和蔑视,是“把暗藏的阶级敌人统统挖出来,全部、彻底消灭干净”的政治口号,是对“阶级敌人斩草除根”的政治口号(这一口号是导致地、富、反、坏、右家属子女被杀的重要原因)。

导致这一灾难性局面的直接原因是,“海康会议”精神是极“左”的,当时阳江县军管会主要领导和部分副职思想是极“左”的,全县大部分公社、大队两级党政组织思想也是极“左”的。对乱打乱杀现象,县军管会开始是放任的,后来是纵容、支持、鼓励的(1968年5月间,已靠边站的县公安

局局长覃兰川向保卫组军管小组副组长陈某汇报一部分公社、大队出现乱打乱杀情况,并提出采取措施制止时,陈某说:“打死几个坏家伙算得了什么?”从开始至高潮,从未开过一次制止乱打乱杀专门会议,直到中央“七三”“七二四”布告下达,才开专门会议制止)。当时由于全县大部分公社、大队两级党政组织思想是极“左”的,致使“海康会议”极“左”精神得到极力贯彻。全县性的乱打乱杀行为实际上是在县、公社、大队三级组织指挥下以“全部、彻底消灭干净阶级敌人”名义进行的。

导致这一灾难性局面的人性原因是,在“全部、彻底消灭干净阶级敌人”“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等口号鼓动下,一些人人性泯灭、兽性大发,借“革命”“阶级斗争”“群众专政”名义,行杀人、强奸、越货、复私仇之实,连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子女包括襁褓里的婴儿也杀害(共杀316人),突破了人性的底线。

同时,相邻的阳春县乱打乱杀行动早(始于1967年9月23日)、规模大、手段残忍、致非正常死亡多(2664人),也给阳江带来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当时,阳春河口公社上双、龙门等大队,不用经过批准就可随便杀人,更为残忍的是,他们将当地定性为地、富、反、坏、右人员及其后代(其中有不少是吃奶的小孩,还用仔带背着)用长长的麻绳绑成一串,勒令其站在河边,或是开枪扫射,或是用棍毒打,并把他们扫射死后的尸体和毒打后的被捆绑的活人推进河里,惨无人道,致使漠阳江遍布尸体。

回首这一段不堪回首的悲惨历史,其教训是极其深刻的、惨痛的。这教训就是:必须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理论和文化大革命运动,任何美化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行为都是对历史的无知;左的思想在党的历史上根深蒂固,任何时候都必须防止左;必须重新审视“人道主义理论”,“人道主义理论”中的人生而平等,人的生命和尊严至高无上的思想是正确的;必须深刻认识人性的恶,必须运用法律解决社会问题,而绝不能用群众运动去解决社会问题;必须摒弃人治,实施法治,必须摒弃“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群众专政”的理论;必须坚持建立和谐社会理念,依法理性地处理社会各阶层矛盾,彻底否定用“阶级斗争理论”解决社会矛盾。■

(作者单位为中共阳江市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 黄 钟)

熊大缜冤案平反经过

○ 王端阳

关于熊大缜的冤案,已有很多书籍记载过,网上就更为详尽。我父亲王林的几篇日记,则是记述了最初给熊大缜平反的经过。

熊大缜,曾是清华大学教授叶企孙的高徒,1935年毕业后留校,1937年考取赴德国留学名额。此时七七事变爆发,清华大学准备南迁昆明,叶企孙全面负责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的抢运工作,熊大缜于是放弃出国和新婚,做了叶企孙的重要助手。抢运工作还没有结束,日军就进了清华园,叶、熊被迫转至天津。

1939年初,冀中军区卫生部部长张珍潜入北平,搜罗根据地急需的知识分子。他找到他的辅仁同学孙鲁,动员他和自己一起工作。春节,孙鲁回到天津老家,在英租界找到熊大缜,并向他介绍了冀中抗战的情况。于是熊大缜找到叶企孙,很郑重地提出自己要到根据地参加抗日。

熊大缜到达冀中军区后改名熊大正,深得司令员吕正操的赏识,3个月后,便被任命为供给部部长,全面负责整个根据地的物资工作。在叶企孙的帮助下,熊大缜还聚集起100多名平津大学生和其他青年知识分子,为创建抗日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

就在这抗战的紧要时期,延安的除奸运动扩展到冀中,冀中军区也成立了除奸部,一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被当成国民党的“内奸”被“除掉”。从国统区天津来的熊大缜未能幸免,被定为特务,在军区机关的转移途中被秘密处死。在最后时刻,熊大缜为了省下一粒子弹去打日本鬼子,宁愿被石头砸死。

熊大缜的冤案后来还牵连到恩师叶企孙,使之在文革中蒙受牢狱之灾。

粉碎“四人帮”后,胡耀邦开始为历史上的一系列冤假错案平反。在这种大气候下,为熊大缜平反已经势在必行。但具体去做,阻力还是很大的。最早提出为熊大缜平反应该是在1982年,

在王林12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

与张珍同志谈起抗战初期一九三九年熊大正案件,我说我曾促孙鲁同志写材料,呈请有关机关给予平反问题。张说他也曾给孙谈过想法平反问题。回住处后立刻给孙写信,催他赶快写成书面材料,以便为蒙受冤案而屈死者平反昭雪。

十几天后,孙鲁从天津赶来,在张珍家研究了为熊大缜平反之事。王林日记:

1983年1月7日

孙鲁同志由天津来,晚同他找张珍同志研究为熊大缜(即熊大正)平反昭雪问题。

两天后,是个星期日,他们又来到吕正操家谋划此事。王林在日记中不仅记述了经过,还点了延安来的大员舒同和余光文的名:

1月9日星期日

上午同张珍同志到吕正操同志处谈为熊大缜(即熊大正)平反昭雪事。下午帮助孙鲁同志写申请平反昭雪报告。熊大缜是一九三四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生,为系主任叶企孙的高材生,留校当助教。又被叶推荐去德国留学深造。因七七事变未成行。张珍同志由冀中来平津动员爱国人士去冀中参军,先动员孙鲁,孙鲁因肺病未能去,乃转荐熊。熊当时正同叶搬运仪器迁校昆明。在津遇见孙鲁(清华同学),熊去冀中,不久即任军区供给部长。一九三九年春不幸被误杀。吕等在谈话中透露,当时在晋察冀边区搞极“左”的是舒同政治主任和除奸部长余光文(吾必成),当时株连甚多。为杨经国被诬陷事,孙志远曾流泪。

这里提到的杨经国,参加过一二·九运动,西安事变时和我父亲同在东北军学兵队,后又在冀中相遇,曾任冀中军区骑兵团政治处主任,在1942年五一大扫荡中牺牲。我父亲在《十八匹战马》中提到曾和孙犁找过他。孙志远时任冀中军区政治部主任,此时任国家三机部部长。

半年之后,吕正操亲赴天津大学,走访了孙

鲁。王林日记：

7月5日

上午陪吕正操同志访天大孙鲁同志，谈如何为熊大正平反问题。

7月9日

上午孙鲁老同学来，谈寻找熊大正烈士的亲友问题，顺便谈起中国的民主与法制问题，他要求迫甚，但忧上边只有一张空文，下边不听。我说这是一场斗争，马克思主义说的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没有人民群众的“创造”（推动），确是只有一张宪法，等于历史文献。他对此倒点头称对。

从这两篇日记看出，平反的事并不那么简单，下边有阻力。转眼就到了1984年。为此吕正操还去了趟上海。

1984年4月5日

上午到吕正操同志家。他说去冬到上海找到熊大镇（正）的兄弟。此人是上海市委的常委。他写的情况，与孙鲁老同学写的一样。

不管怎么说，平反工作进入文字阶段，我父亲义不容辞地拿起笔。王林日记：

4月20日谷雨

为熊大镇（熊大正）平反昭雪事，替吕正操同志起了申请草。并补写了个材料：《关于冀中区党委在一九三八年夏与天津地下党取上直接联系，以及有关天津的“党政军联合办事处”的情况》一文。

张珍同志看了同意，由他与吕约定时间当面研究定稿。

但最大阻力还是一位当事人王文波，熊大镇任供给部部长时，他任政委（后曾任商业部副部长），他的证言十分关键。可是他的态度……王林日记：

5月4日

昨同张珍同志找王文波同志，谈为熊大镇（熊大正）平反昭雪事。王当时任军区供给部政委。他根据当年的印象，一方面对此案划问号，一方面认为天津“党政军联合办事处”是蒋介石系特务组织。我请他叫冀中抗战史研究分会首先弄清这个组织的性质。看来，熊的平反问题，尚很复杂。

一个星期后，王林来到王文波的家取证明材料，同行的还有冉淮舟和小崔。可是看完材料，

王林的火就来了，不顾情面地当面指责王文波，场面十分尴尬。据冉淮舟讲，王林当时气得直用拐杖敲打地板，他们都甚为吃惊。王林日记：

5月13日星期日

王文波同志以当年供给部政委的身份，为熊大镇（熊大正）案件写了书面材料。我看了看，当面质问他：“从你写的材料看来，熊大正仍然是当时用逼供信逼出来的罪状：汉奸兼国特。”他哼哼唧唧不肯明白说出自己的观点，因而推托不是这意思。

我指着他写的材料问：“炸药研究所，为冀中军队研制了大量军用炸药，有的，如门本忠（清华大学毕业）在白洋淀牺牲得非常英勇，其他成员如汪德熙同志至今仍任二机部原子能研究所所长，可以说这个研究所的成员，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建国三十多年，没有一个出问题的，而且都有贡献。”可是王文波政委写的材料，仍然用含沙射影的口气说得这个研究所十分可疑，并说他们有秘密电台。

他是用含沙射影的口吻写材料，企图坚持使冤假错案不得平反，却又不肯明白说出自己的心思，所以才用一些含沙射影的字句和把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的手段。这种人就用这种手段，一直升官！

我当面戳穿了他的用意，冉淮舟和小崔都感到吃惊。王文的客观效果，一言以蔽之，继续用含糊其词、含沙射影的口吻巩固当年错误的肃反扩大化的恶果。澄清此文造成的混乱，要花费一定的文字证明才行。张珍同志低估这种反面势力的作用，是不现实的。

冉淮舟说，从王文波家里出来，王林的气仍未消，用拐杖戳着地说：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屁股后面冒烟嘛！（指部级干部配给小汽车）第二天：

5月14日

张珍同志下午对冉淮舟、小崔做第三次叙述，谈到一九三九年五月因熊大镇（熊大正）案遭株连而被逼供信式审讯时，审讯者最后居然这样引供：“你对你们冀中的吕正操、孙志远、黄敬……也都谈谈吧！”由此看来，当时晋察冀“逼供信”大师们的目标尚不止在熊大正、张珍等这些爱国的科技知识分子身上，而已侧目于创造冀中平原根据地的人们！

呜呼！其实这次冀中除奸运动隐藏在后面的目的是吕正操、孙志远、黄敬。很多历史的真

马骞的检举信与七千人大会

○ 董忠义

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灾难性的损失,造成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经济损失估算为1200亿元。(丛进著《曲折发展的岁月》,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9页)1961年全国征购粮食720亿斤,中央上调60亿~70亿斤。9月庐山会议时,中央与各中央局协商,决定第四季度上调粮食32亿斤,到11月中旬各地上缴中央的粮食只完成20%多一点。(1961年11月23日《中央关于抓紧完成第四季度粮食调出任务的紧急通知》)京、津、沪三大城市随时面临断粮的危险。

1961年11月12日晚,毛泽东根据邓小平关于召开一个地委书记以上干部会议,解决粮食征购问题的提议,决定召开一个县委书记以上的五级干部会议,把过去几年的工作总结一下。会议搞10天,大会套小会。11月16日,中央下发会议通知,其中要求“中等城市党委二人(第一书记和工业书记)”参加会议。

安徽省蚌埠市属于中等城市,马骞时任蚌埠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分管工业,接到了参加会议的通知。

“大跃进”以来,由于中共安徽省委工作的重大失误,全省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出现了严重困难,病、饿、逃、荒、死的问题十分严重。

马骞任职的蚌埠市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58年开始下降,至1961年的4年间,平均每年出生人数由过去的万人以上降至5457人,死亡人数由过去



马 骞

的每年2000多人上升到4000多人。1960年总死亡人数10746人,死亡率高达25.81‰。这一年安徽死亡率高达68.6‰,名列全国第一。(《安徽省志——公安志》,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5页)

蚌埠地区凤阳县是马骞的老家,全县人口总数1958年370710人;1959年364136人;1960年306543人;1961年291958人。1961年比1958年减少了78752人。(《凤阳县志》,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第95页)

蚌埠地区定远县老瞿村,1959年春,公共食堂每天向村民供粮0.6公斤;到5月降为0.25公斤;到11月降为0.1公斤;到年底食堂因断粮而停伙53天,全村198人中有101人饿死。(陈意新著《困难时期安徽农民的生存问题》)

马骞的哥哥和弟弟饿得没办法,到蚌埠找马骞讨口饭吃。下了火车,兄弟俩饿得走不动,只好拦了辆黄包车。然而这也没能避免悲剧的发生,哥哥刚到家就咽气了。

马骞老家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姓杨,村民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杨驴子”,此人在“反瞒产私分”运动中,表现极其蛮横。到老百姓家里搜粮食,用步枪的探条在地上捅,一点点粮食都能搜出来。农民的锅灶被全部扒掉,食堂又吃不饱,有些农民实在饿得扛不住,在家里煮点瓜菜充饥。“杨驴子”晚上在山坡上瞭望,看见哪家生火冒烟,马上

相,尚待揭开。

遗憾的是,我父亲没有等到熊大缜的平反,一个半月后他因手术事故去世。

以后听说为熊大缜平反的事,吕正操还找过

曾当过河北省委书记的刘秉彦,具体的细节我就不清楚了。结果是又拖了两年,熊大缜的平反才于1986年10月得到中共河北省委的批准。■

(责任编辑 黄 钟)

带村干部过去检查,没收粮食和锅碗瓢勺。

马骞给弟弟送了一个兔子笼,里面有一个隔层,藏了几斤粮食,实在饿得受不了时煮点稀饭充饥,幸好没有被抓住。后来马骞又想方设法从蚌埠市豆制品厂搞到一些豆腐渣,用船送到凤阳县,准备送给家乡的饥民吃,县领导却打肿脸充胖子说,粮食都吃不完,豆腐渣给谁吃?没办法只好又运回来。

蚌埠市区的情况要比农村好得多,职工每人每月口粮标准27斤,规定要向灾区捐献3斤,实际供应24斤,而且还要搭配一半粗杂粮,妇女、儿童和老人相应减少。由于吃不饱,营养不良,马骞浮肿,腿上一摞一个坑。

从1959年开始,中央和中央监委陆续收到大量关于安徽饿死人的人民来信。1960年11月,中央监委候补常委、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王维纲率检查组来安徽调查饿死人的问题,他深入到凤阳县,了解和掌握了饿死人的真相。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对此大为不满,指使安徽省委监委书记曾庆梅、蚌埠行署专员单劲之告反状,联名给中央发了《王维纲到凤阳调查非正常死亡》的电报。中央接到电报后,通知调查组回京。

1960年12月28日到1961年1月3日,中央监委召开常委会,听取赴安徽检查组的汇报。列席会议的曾庆梅、单劲之受到严肃批评。尽管如此,曾希圣仍然坚持认为中央检查组反映的情况不实,极力封锁消息,掩盖饿死人的真相,安徽的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王从吾传》,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第221~222页)

马骞1940年参加革命后,一直在安徽工作,曾任乡长、区长、县长、皖北淮河航务管理局局长等职,他知道农村饿死人的真实情况,并对错误迟迟得不到纠正而焦虑。为此,他对中央召开的这个会议充满了希望。

1962年1月11日,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大会以省(包括各部和解放军)为单位共分35个大组,以地(市)为单位共分400多个小组。从1月11日至26日,大会以大组或小组为单位,围绕刘少奇代表中央做的书面报告,进行分组讨论和提出修改意见,总结本地区“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

曾希圣要各小组组长在讨论时“引导和把握

代表们的发言”。在这种引导和把握下,“直到十七号大家未讨论出什么问题”。各小组发言整理上报后,曾希圣又到小组会上说:“你们要提意见啊,大会简报上一点看不到我们安徽的消息不好啊!”很多同志气愤地说:“横竖我们是属顺风牌的,你说东风就是东风,你说西风就是西风。这样一来,越讨论越松劲。”

眼看会议就要结束,马骞心里十分着急,他萌生了给中央写信反映安徽问题的念头。但是,安徽省反右派、反右倾斗争以来恶劣的政治生态环境,在马骞心中投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这封信写了会有什么样的结果,马骞心中没有底。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马骞横下一条心,就是坐20年大牢也要向中央如实反映情况。会议期间两人住一个房间,写信不能让人知道,他只好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写。

马骞的信是写给“中央并敬爱的主席”,他在信中写道:“我们安徽问题很多,盖子没有揭开,在少奇同志的报告里面,都严重存在着,并已发展到根深蒂固。不把这些问题反掉,回去工作也是搞不好的。”

马骞在信中提了两条建议:“我也考虑这么多负责人长期在京开会,家里工作是会受影响的。我提两个办法:一是谁省先解决问题就先回去,我们留下继续搞;二是按时结束回去,中央派负责同志到我们去掌握搞,把问题彻底解决。”

马骞在信中最后希望“我意见我这信不要转给我们省委同志看,因他们作风还未转变前,我还不相信他们对人不打击报复的”。

为了引起中央的重视,马骞在检举信的最后署上了自己的姓名,1月25日把信寄出。

1月27日下午,大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刘少奇做口头报告。刘少奇说他的书面讲话已经发给大家,就不在会上宣读了,他准备在报告的基础上再讲几个问题,其中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认为“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公开宣布不能再用“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到处这样套。胡绳事后回忆:“刘少奇在台上讲,毛泽东不断插话,我就担心主席是否能够接受。”

刘少奇讲话之后,毛泽东宣布:大会准备在30日结束,至迟31日结束,从28日到30日,3天

的时间,拿出一天到一天半来,由中央的领导同志在大会上讲一讲,其他时间分组讨论。这时,马骞的检举信已经寄出3天,没有任何动静,他认为这次没有希望了。

变局发生在1月29日下午,林彪在第二次全体会议讲话后,毛泽东出人意料地宣布:“这次用这么个方式,在北京开这么个会,要解决问题。现在,要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是:有些同志的一些话没有讲出来,觉得不大好讲……我们常委几个同志商量了一下,希望解决‘出气’的问题。”听了毛泽东的讲话,马骞隐隐约约感到自己的检举信起了作用。

毛泽东讲话后,会议转入“出气会”阶段。当晚各中央局召开会议,迅速部署如何开好“出气会”。1月30日上午,各省召开动员会,号召大家对省委的工作提出批评。

1月30日下午,大会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不点名地批评曾希圣:“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

马骞的检举信与毛泽东改变七千人大会原定的议程,决定延长会期,召开“出气会”究竟有什么关系?

2002年9月23日,李葆华告诉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聂皖辉:“1962年,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大会快要闭幕的时候,中央收到两封匿名信,一封是安徽的,另一封是四川的。中央决定将会议延长。”李葆华时任华东局第三书记,“出气会”阶段陪同刘少奇处理安徽问题,他的回忆应该是权威和准确的。(《李葆华纪念文集》,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308页)

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张素华在《变局》一书中写道:“在一月底中央准备结束会议的时候,一封来自安徽的匿名信和另外的几封来信,猛然搅动了看似平静的一池水面。几封信几乎都在传递着同一个信息:许多代表和他们一样,话没有讲完,还憋着一肚子气,省委压制民主,不让人讲话……这几封信是使毛泽东做出延长会期,开‘出气会’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马骞的检举信符合毛泽东“要解决问题”的想法。

近几年民间研究成果披露,七千人大会期间,至少有3个人给中央写了检举信:一是马骞,他曾多次告诉儿子马方晨,自己在检举信上署的是真名,寄信的时间是1月25日。二是明朗,当时任四川省梁平县委第一书记,他在信上署名“一个四川干部”,落款时间1962年1月,此信中央办公厅1月25日收到。三是东北“一个厂子的行政负责干部”,他在信上署名“党内胆小者”,此信中央办公厅2月5日收到。

1月30日晚,刘少奇和中央监委副书记钱瑛、李葆华等人第一次来到安徽代表团驻地——北京友谊宾馆,在健身房召开安徽大组会议。刘少奇上来就说:“这次会议上反映出两方面情况:一种是不让人家讲话,一种是不敢讲话。用眼色、语气、态度不让人家讲话是很恶劣的,要充分发扬民主,有气出气,不要有话不讲,气出完了就好,在北京把气出完,回去就舒畅……在座的有一个同志给中央写了一封信,我没有带来。他说他抱着一肚子希望要把肚子里的意见讲出来,但是现在看来不行了。安徽有些同志肚子里的气没有出完。”

刘少奇接着说:“死了这样多人,生产力有这样大的破坏,受了这样一个挫折,历史上不写,省志上不写,不可能的。这个盖子必须揭,与其迟揭不如早揭。”会议的气氛十分紧张。(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安徽大组会议上的第一次讲话,1962年1月30日晚)

刘少奇把安徽有人给中央写检举信的事捅开了,后来又当着与会代表的面把检举信交给省委4位领导传阅。马骞看到这一幕后很紧张,散会后他找省委书记处书记李任之摸底:“信是谁写的?”李任之回答:“不清楚,落款是‘一名共产党员’。”马骞听后心中稍安,原来中央已将检举信印成铅印件,落款处隐去了他的姓名。

七千人大会前,中央通过人民来信,中央监委调查,领导干部实名举报,等途径,知道安徽的问题很严重,但是不见底。这次刘少奇下决心查清安徽的问题,他分别找省、地、市的领导同志谈话,宣布一条纪律:饿死人瞒报一例,一律开除党籍。刘少奇叫秘书打电话找各市、县委书记,一个个核对当地到底饿死多少人。有的书记不知道真实数字,刘少奇就让他们现场打电话回去问。有的怕担责任,层层少报,刘少奇火了:“不

说实话就枪毙你!”

军方高层支持刘少奇“揭盖子”,“出气会”期间,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告诉安徽省委常委、省军区政委李世焱:“你大胆讲,不要有顾虑,今后如果不好工作,可以调到其他省去。”

听了刘少奇、毛泽东的报告,特别是听了刘少奇在安徽大组会议上的动员,面对前所未有的经济困难,在付出了几百万生命的代价后,安徽绝大多数地、县级领导打消思想顾虑,开始讲真话了,大会小会“揭盖子”,背靠背地进行揭发批判。

杨尚昆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安排35个人每天到各大组搜集讨论情况。

他在1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由于少奇、恩来同志坐镇安徽、福建,这两省已经慢慢地展开了,向省委领导上初步提出些意见,还待深入。”

2月3日下午,刘少奇第二次参加安徽大组会议。曾希圣第一次作检查,刘少奇听了很不满意,他问与会者:“曾希圣同志作了检查,你们满意不满意呵!”众口回答:“不满意!”

刘少奇说:“我想了解安徽一些真实情况,希望大家说真话,说心里话。问题严重的有山东、河南、甘肃、青海几个省,安徽没有算在里面,但安徽问题比河南严重,比河南严重的是把问题一直包到现在,直到这里还不讲老实话。讲假话是不允许的,在今天以后,再讲假话要立即开除党籍,不管是谁,三十年党龄也要开除党籍。”会议的气氛充满了火药味。(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安徽大组会议上的第二次讲话,1962年2月3日下午)

2月7日下午,七千人大会结束。中央采纳马骞的建议,把安徽代表团留下来“继续搞”。2月9日下午,曾希圣在第二次检查时说:“有一封信(指马骞的检举信),我们省委同志看了,认为是一个文化水平较高的同志写的,因此想摸底是谁写的。内心虽然没打击报复之意(也不敢),但戒



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期间,马骞与入党介绍人刘云(轻工业部原副局长)在北京八达岭长城合影。

备之意是有的。”

曾希圣检查说:“省内死了几百万人,我心情是沉痛的……现在我深深认识到我的错误是异常严重,给安徽工作造成不可挽救的损失,我的心情是十分沉痛的,我的罪过是还不清的,我唯一的决心是倾听大家的意见,永远倾听群众的意见,在实际工作中改正错误,带(戴)罪立功。”(曾希圣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安徽大组会议上的第二次自我检查,1962年2月9日下午)

为了避免互相猜疑,人人自危,马骞经过慎重考虑,在会上当场写了一个字条,请人递给刘少奇,希望公开

检举信是他写的。

刘少奇接到字条后当即宣布:“同志们,检举信是马骞同志写的,马骞同志请你站起来,和大家见见。”曾希圣尴尬地说:“马骞同志,谢谢你。”马方晨说:“这件事安徽参加七千人大会的所有人都知道。”

2月9日晚,刘少奇第三次参加安徽大组会议。他在通篇讲话中历数曾希圣的种种错误,态度之严厉,语言之尖锐,实属罕见。刘少奇最后宣布:“中央决定将曾希圣同志调动工作,曾希圣同志检讨时也讲了,要求中央把他调离安徽……中央决定派李葆华同志到安徽当第一书记,代替曾希圣同志。”

会后,中央又一次采纳马骞的建议,派钱瑛率工作组到安徽,指导改组后的安徽省委做好甄别平反工作。

1962年4月,马骞调任安徽省委监察委员会专职常委,这一任命显然与他在七千人大会期间写检举信有关。1995年9月,马骞在合肥病逝,享年79岁。■

(作者为山西省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棉花品种研究室原副主任)

(责任编辑 黄 钟)

地下党“不能承认党员身份”的纪律

○ 孙丹年

“不能承认党员身份”相关纪律的形成

由于环境严酷,中共组织制定地下斗争策略非常细致,比较苛刻。地下党员们一旦被捕,是不能承认党员身份的。

中共注意在实际斗争中掩饰党员身份,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土地革命时期。1928年至1931年周恩来在上海负责隐蔽战线工作时,十分强调组织活动的隐蔽性,要求党员们单线联系,尽量职业化、社会化。

1940年5月4日,毛泽东起草指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提出了地下党活动原则“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经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作为党在国统区工作的“十六字方针”(严格说来,“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是方针;“隐蔽精干”是政策;勤业、勤学、勤交友及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的“三勤三化”是方法)。

抗战期间,周恩来多次指示南方局机关工作人员和下属各地党组织,一旦有党员被捕,马上紧急处置,迅速隔离,切断关系。1941年1月17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布对“皖南事变”处置的通令,当天晚上,周恩来在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二楼的过道中,向全体工作人员说:

……我们一定要作最坏的准备,要准备反动派可能搞突然袭击。他袭击我们,主要是要搞我们党的机密:密码、文件、地下党员名单等。因此,必要时我们也要进行适当的抵抗,把机密文件毁完了,就准备坐牢。……他们要问你们是不是共产党员,男同志都承认是共产党员,女同志承认是家属,因为我们是公开的共产党机关。问你们党的组织情况,就说我们的中央在延安,主席是毛泽东,这里有支部,书记是周恩来。再问还有哪些负责人,就说

有董必武、邓颖超。再要问就说不知道,让他们问支部书记周恩来。我们在牢里,要坚持不泄露党的机密,好好保养身体。……(《周恩来传》第48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

周恩来在紧急情况之下的这个讲话,提出了对付敌人逮捕审讯方面的一个重要原则,即国共合作期间,在国统区公开的中共机关的男同志可以承认党员身份,但女同志不要承认。以此类推,地下党的同志一律不要承认党员身份。周恩来不仅顾及党的机密这一最高原则,同时也很人性化地指出,党员们应该很好地保护自己,尽量减少损失,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之后,周恩来指示成立一个秘密工作委员会,制定《保密工作条例》,明确规定了若干安全措施,已成惯例的“夫妻之间不能谈论党的机密”,就是这个《条例》中制定的正式纪律。

到1947年3月,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国统区没有公开的中共机关了,“不能承认中共党员身份”成为国统区地下党员们被捕后应付审讯的主要原则之一。因为,在审讯中,被捕者只要承认了一点,紧跟着敌人便会提出第二点来逼迫承认,一步一步紧追不舍。因此,地下党员们在审讯中必须把抵御的防线牢牢地构筑在第一道关口,一问三不知。

1949年12月《国民公报》连载杨祖之的文章《我从集中营出来》,在其“鬼门关”一节中,从实际情况出发对这一点进行了解释。由于当时杨祖之还不是中共党员,他是从“进步青年”的角度来理解和说明的:

……你承认自己“进步”,他必定叫你承认“思想左倾”;你承认希望“政治民主”,那你“思想左倾”已有铁证,他必定要你交出共产党组织!因为共产党才谈这个。不说,就是不坦白。这简直成了他们的公式。他们对犯人的要求,是无止尽的……

再看因《挺进报》被捕的陈然烈士的审讯记录,堪称“隐蔽身份”的经典:

徐远举:你就是陈然!把你的组织交出来吧!

陈然:办报是自由职业,有什么组织不组织,不让办,不办就是了,交什么组织?

徐远举:好一个自由职业!谁叫你办的?说吧。

陈然:办报有什么罪?有这么严重!

徐远举:你办报,为什么不登记?为什么偷着办?老实告诉你,你的全部材料,已经有人交了出来,你还不交组织?

陈然:没有登记,现在登记也不迟。至于说到有什么人交出材料,那不是很好吗?那还要我交什么材料!

徐远举:你在强辩!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你今天要听我的,我看你有什么本领不交组织?

陈然:不交又怎么样?

徐远举:不交,就强迫你交!

陈然:那你就强迫吧!(《陈然烈士传略》蒋一苇等著,重庆出版社1983年)

再看1948年在上海工人运动中被害、年仅24岁的王孝和烈士。王孝和1941年5月加入共产党,1948年4月被逮捕。他对特务说:“我是上电(上海杨树浦发电厂)2800名职工选出来的工会常务理事,为职工说话办事是我的职责,没有什么需要向谁讲清楚,更无自首的必要。”

王孝和给怀孕妻子的遗书中说:“(告诉孩子)要继承父志,完成未竟事业。”给狱中难友的信中说:“要为正义继续奋斗下去。”9月30日殉难前夕,他大呼:“特刑庭不讲理!你们的执行是非法的!特刑庭乱杀人!”始终绝口不提与中共党员身份有关的任何情况。(《不死的王孝和》柯蓝著,工人出版社1955年7月)

“承认党员身份”至少是违纪

当年的地下党员全都明白,按照周恩来亲口布置的、不成文的地下工作纪律,“承认党员身份”属于变节行为,至少是违纪,严重的甚至可以上升为背叛。

由谭竹安填写的江竹筠“被难烈士登记表”中,实事求是地填写“结果只承认了自己的立场”,就是说江竹筠承认了自己是共产党员。

在《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蒋美特务重庆大屠杀之血录》纪念册第37页“被难烈士事略”中,为避英雄讳,画蛇添足地加上“这个承认是经过了渣滓洞全体难友通过而请求她承认的”,为之后《红岩》小说的创作扫清障碍,使“江姐”这一人物原型顺利通过艺术加工。

同样在毒刑之下“承认党员身份”的,还有殉难于渣滓洞的女烈士邓惠中,邓惠中迟至1983年才被评定为烈士。80年代初期为了落实“未定烈士”问题,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派出调查组,赴四川南充地区了解邓惠中的狱中表现,找到1948年参加过侦讯邓惠中的岳池县军法室人员。根据其提供的证明材料,邓惠中在毒刑之下承认自己是中共党员,而据此做出的组织结论,也认为承认共产党员身份是犯错误,但为可以原谅的错误:

(被询问者供述)……当时我们千方百计去感化她,但邓惠中却瞧不起,说:我几十年没有见到国民党,只见到共产党人。我们见感化不行就施以毒刑,在这种情况下邓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结论:邓没有损害党的言行,表现坚强,在严刑拷打下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据四川南充地区档案馆资料)

更典型的一个例子是殉难于白公馆的刘国钰烈士。刘国钰的侄子刘以治写了《回忆罗广斌》一文,其中提到刘国钰在烈士级别序列中的位置最低,还差一点儿就评不上烈士了,原因也在于他承认了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

……我刚到重庆的时候罗广斌正忙于为“11·27”死难烈士筹办追悼会。有一天他兴致冲冲地跑来找我,叫我给他一张钰叔(即刘国钰)的照片,说是每一位甲等一级烈士都要画一张油画像。不料几天以后情况大变,罗广斌把像片退了回来,说是经过激烈讨论之后,刘国钰的烈士排名降到了丙等三级,也就是最后一级。……原来在审查时发现,国钰被捕后,由于要掩护一个同志,承认了共产党员的身份。据说由西南局派来的一位姓田的同志,坚持己见,认为虽然动机是好的,但性质属于背叛行为。绝大多数人都不赞同这一意见,认为这太脱离实际了。大家都认为,刘国钰的英雄事迹和光辉形象,在人民群众,特别是在青年学生中影响很大,如果连刘国钰都评不上烈士,这太说不过去了,只会造成思想混

乱。这样一来才评上最后一级。(载《重庆党史资料》1994年第3期)

江竹筠曾“承认中共党员身份”

1950年1月15日,重庆市各界举行“追悼杨虎城将军暨被难烈士大会”,会后印发了一本纪念册《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蒋美特务重庆大屠杀之血录》(小16开本,内页共84页,繁体字竖排)。在其“被难烈士事略”中,第37页对江竹筠烈士的介绍有这样一段话:

一九四八年六月十四号,在万县被捕,当晚在万县警察局严刑拷讯,始终没有说出任何东西。解到重庆中美合作所后,特务们一点不放松她,戴重镣,坐老虎凳,吊鸭儿浮水,夹手指……极刑拷讯中,曾经昏死过三次,但她只承认自己是个候补党员。而这个承认是经过了渣滓洞全体难友通过而请求她承认的。

最后两句非常费解——“她只承认自己是个候补党员。而这个承认是经过了渣滓洞全体难友通过而请求她承认的。”



1950年《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蒋美特务重庆大屠杀之血录》封面

为什么要加上这么两句?

承认自己是“候补党员”,比承认自己是“正式党员”,程度上轻微一些吗?

读者实难明白,被牢房高墙隔离着的渣滓洞全体难友,是怎样“通过”这一提议,然后在怎样的境况下“请求她承认”的?江竹筠在渣滓洞刑讯室里受刑(竹筷子夹手指)只有一次,当她正忍受煎熬死去活来时,渣滓洞全体难友正在开会?会议决定,为减轻痛苦,请求江竹筠承认自己是中共党员?为了程度上的轻微,只承认自己是“候补党员”而不能承认是“正式党员”?这个决定是由谁、以何种方式传达给江竹筠的?

还有另一个印证。1949年秋天,在重庆白公馆、渣滓洞系列大屠杀中被害的殉难者,大多数都由其亲友填写过一份“被难烈士登记表”,交给“烈士资格审查委员会”,以此作为重要的烈士评审依据。

江竹筠烈士的“被难烈士登记表”于1949年12月9日由谭竹安(江竹筠丈夫彭咏梧烈士在老家的妻子谭正伦之弟)填写,其中关于“被捕原因及狱内经过情形”一栏,是这样写的:

被捕曾受刑表现英勇未供只字解渝后因丈夫彭的关系受刑极重曾死去三回电刑夹手指老虎凳结果只承认了自己的立场。(注:原文除最后句号外无标点)

表格中反映了江竹筠面对酷刑的英勇不屈,但也说明“结果只承认了自己的立场”,即“承认中共党员身份”。

填写人为什么要特别说明这一点?

事实是,当时中共地下党有不成文的纪律——党员被捕后不能承认自己的中共党员身份。

“渣滓洞全体难友通过”可以代替地下党的纪律吗?

人道主义与英雄主义

极端思维往往导致极端判断。在文艺作品中,当一位革命女性正在遭受毒刑拷打时,我们对她的心理期望,根据从小接受的教育和宣传,当然是:你不能呻吟,你不能喊疼,你不能有哪怕半点软弱,你必须咬破嘴唇以忍住疼痛,你必须金刚怒目,昂首以对,语气决绝,语言铿锵,以树

• 37 •

都過着貧苦的生活。她讀書全靠她舅父幫助，從小學一直到大學。川大認識彭咏梧，他們是朋友又是同志感情很好，為了工作上的方便，與彭同志結婚了。他們就到重慶中央信託局工作。一九四七年下半年，在重慶領導育才，女師學院，西南學院等交際學生運動。好幾個同志，都覺得她對人很好，作風正派，很能愛護同志。十一月，彭同同志一道下鄉，到雲陽，奉節一帶，從事武裝鬥爭。她這時就負責與重慶方面聯絡，許多重要的文件、藥品、器材，都是她通過敵人嚴密的檢查，冒險地送到鄉村。四八年一月，雲陽起義，彭同志殉難。當同志們告訴她：「老彭已經遇難，而敵人還把彭的首級割下在奉節示衆……」的時候，她沒有哭泣，祇發出憤怒的吼聲：「好！我們到重慶去，向黨報告老彭他們失敗的經過，從新檢討一下，我們再來！」就這樣地回到重慶。後不久轉到萬縣地方法院作職員。爲中共下川東地委之一。

一九四八年六月十四號，在萬縣被捕，當晚在萬縣警察局嚴刑拷訊，始終沒有說出任何東西。解到重慶中美合作所後，特務們一點不放鬆她，帶重鍊，坐老虎凳，吊鴨兒浮水，夾手指……等極刑拷訊中，曾經昏死過三次，但她祇承認自己是個後進黨員。而這個承認是經過了渣滓洞全體難友通過而請求他承認的。

她在敵人面前的這種不屈不撓的精神，鼓勵了渣滓洞每一個難友。便由何雪松烈士執筆集體寫了一首「靈魂頌」獻給她，中間有一段是：

「你是丹爐的化身，你是蘇菲亞的精髓。不，你就是你，你是中華兒女的革命典型！」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八日，是彭咏梧同志死難的周年紀念日。渣滓洞全體難友，爲了懷念這位親友，停止了娛樂並且各室都去信安慰她。表示崇高的悼念，應化悲痛爲力量！她接到信後回答着

而能堅守信念保持忠貞，令人肅然起敬。江竹筠烈士有血有肉，慘遭毒刑折磨時，她會覺得疼的，她會呻吟甚至喊叫的，也會因為不慎或別的原因，偶爾會出現應對失誤的。人們不能容忍她呻吟和喊叫，不能容忍她偶然失誤嗎？

一般來說，人道主義應該居于英雄主義之上，

文藝作品不能一概只強調英雄主義而忽視甚至無視人道主義。■

(作者單位爲原重慶市文化局創作室)

(責任編輯 黃 鐘)

《如此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蔣美特務重慶大屠殺之血錄》第37頁

立一個崇高正義、流芳百世的英雄形象，以證明某種理論的無限正確。

女英雄形象一旦確立，就需要維護，需要保鮮，讓她在億萬青少年心中永遠存活。這就是人們一般不能接受“江姐”英雄形象出現瑕疵的心理原因。

文藝作品必須使用文藝手法。文藝手法一般有集中、虛構、渲染、形容、比喻、想象、誇張等等，以突出主題塑造人物。小說《紅岩》、電影《烈火中永生》、歌劇《江姐》中的文藝形象江雪琴，當然可以虛構，她當然可以昂首挺胸氣壯山河地回答特務頭子：“上級的姓名住址我知道，下級的姓名住址我也知道，但這都是我們黨的祕密，不能告訴你們！”

而文藝形象江雪琴，不是真實的历史人物江竹筠，後人不能用絕對嚴格的理論概念作為放大鏡，吹毛求疵去指責複雜環境中的历史人物。我們只能心懷悲憫，從史實出發，考察逝去年代中種種具體的情況。

真實的历史人物江竹筠烈士，一位年輕女性，面對錯綜複雜的嚴酷環境，承受殘酷折磨

启 事

《炎黄春秋》杂志尚有少量
往期刊物零售，有需要的读者
可电话咨询购买。

联系人：崔秀岭

手机：13611159388

电话（传真）：010-60342528

汇款地址：

北京市房山区102488信箱3分箱

邮政编码：102488 收款人：崔秀岭

欢迎订阅2015年《同舟共进》月刊

邮发代号：46-56

可直接汇款到本刊发行部或到当地邮局订阅 每期10元，全年120元（港澳地区300元）

地址：广州市广州大道中87号同舟共进杂志社 邮编：510600 电话：020-38308908

传真：020-38308918 邮箱：tongzhougongjin@126.com （以下是2014年第3期部分目录）

专题策划

•如何避免误读历史•

今天如何读历史

农民起义是历史的动力吗

宋朝是一个专制王朝吗

慈禧：从“女人家”到政治家

议政论坛

改革不容迟疑

“法治思维”的新探索

前沿观察

解析泰国政局之“乱”

中国千年外交史上的特殊国家关系现象

往事历历

最后的一笔

李洁非

安立志

吴 钧

叶曙明

袁 刚

徐松林

宋清润

袁南生

阎长贵

附录：亲聆毛主席讲“五七指示”
灯下话旧

“基度山”一案新探

民国法庭如何审判日本战犯

一位台湾女作家经历的禁书事件

以史为鉴

勉为其难的民族英雄郑成功

徐继畲：“东方伽利略”的遭遇

文化广角

《东方红》：一首西北民歌的变迁

谁曾记得《长城新曲》？

舟边絮语

从王实味想到卡廷案件

“实年”与“官年”

古代的名人品评

戚本禹

叶永烈

刘 统

贺越明

曾纪鑫

王 龙

狄 马

毕星星

刘兴雨

许家祥

晏建怀

红军指导员李传书之死

○ 胡发云

李传书是我岳父李传常的四哥。

李传常的父亲李永坤出身穷苦,生有岳父兄弟6个:李传体,李传梓,李传岗,李传书,李传常,李传勇,还有一个行三的女儿李传碧。除了老大李传体照顾父老留守乡土,老幺李传勇年龄尚幼,其余四兄弟都参加了红军,老幺李传勇后来也参加了解放军,在朝鲜战争中英勇战斗,身负重伤,荣立三等功。岳父视他革命领路人的四哥李传书,在长征途中与国民党的战斗中英勇牺牲。

这就是我妻子李虹从小就耳熟能详的革命家史。

就像2003年10月2日李虹的姐姐李晓青在岳父逝世3周年的悼文中写的那样:“我们的爸爸出生在四川省宣汉县清溪乡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家中大小十几口人,靠爷爷做木匠活为生。奶奶在爸爸4岁时便因生活困难,病饿而死。爸爸是跟着大爹(大伯李传体)生活而长大的。爸爸弟兄六人,生活十分艰难,常常吃不饱穿不暖,为生活所迫,爸爸从小就参加了劳动,给有钱人放牛,割草,稍大一些就和大爹一起给地主扛长活,吃的猪狗食,穿的破衣烂衫,连一块好布也没有披过。我们的爸爸虽然生在贫苦人家中,但却继承了劳动人民勤劳勇敢吃苦耐劳的品德。”

“1932年,川东地下党王维舟领导的农民运动开始了,爸爸和当地的贫苦百姓,均参加了川东游击军。跟着游击队打土豪、吃大户、抗租抗粮,和当地的恶势力做斗争。当红四方面军长征经过家乡时,我们的爸爸和他的二哥、四哥都参加了红军(红四方面军)。当时爸爸只有12岁。爸爸随红军的队伍北上,爬过雪山(两次),过了3次草地,吃过草根树皮。爸爸的二哥在行军打仗中,腿部负伤掉了队。以后就讨饭回到家乡,他的四哥,在过草地的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了。爸爸跟着朱德领导的右路军,历尽了千辛万苦,

冲破了敌人重重包围,1936年胜利到达延安。爸爸常常给我们讲他的长征故事,就像小说电影里一样,那样令人激动。爸爸是千万个红军中的幸存者。当我们问起,那么苦,那么难,是怎么过来的?他乐呵呵地回答:‘那时我们胸中有远大的理想,为了使天下穷苦人翻身得解放,为了不让子孙后代再吃苦,革命大家庭的友爱团结,有崇高的理想和奋斗目标。所以什么也不怕。’”

这是一种悲壮而浪漫,完全符合革命美学的经典红色叙事。

所以,当我和李虹相爱之后,一个与国民党厮杀了半辈子,数位至亲为此非死即伤颠沛流离的家庭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是可想而知的。岳父得知此事之后,对李虹大发雷霆说:“你给老子搞第三次国共合作?”李虹向父亲辩解,说胡发云的父亲只是一个医生,不拿枪打仗,我岳父斥责说,他把那些国民党的伤兵治好了,再来打老子!

那个时代,此话于情于理都无可辩驳,文革中批斗审查我父亲的那些人也这么说,我父亲的检讨认罪书也这么说。

岳父终究还是做了我的岳父。我和李虹还生下一个两家人共同的后代——他身上流着共产党的血,也流着国民党的血。

20世纪最后一年,岳父带着半世战火硝烟,一身刀疤枪伤离开了这个他亲自参与创建的世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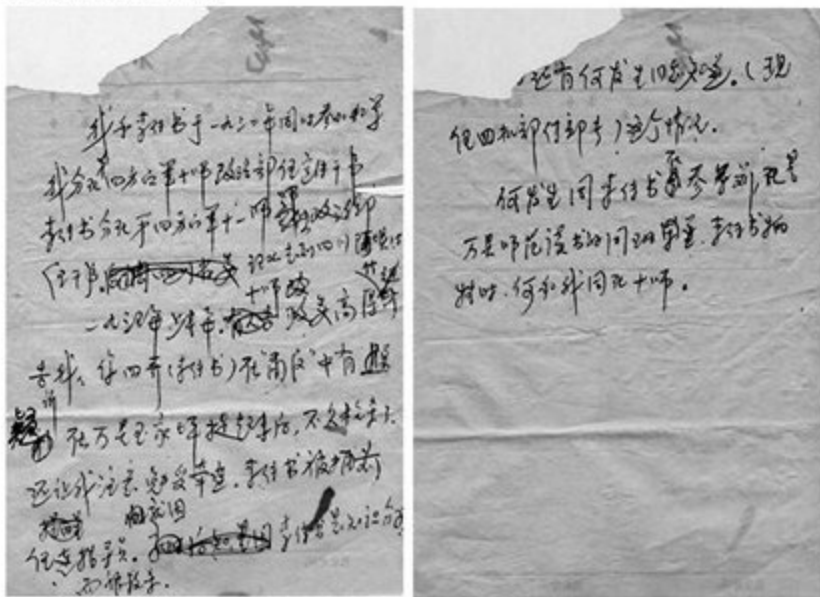
岳父去世5年之后,李虹因胃癌离去。

为我们这30年惊天地泣鬼神的恋情与婚姻,我想写一部真实的书,写我们两人,写我们两家,写这波诡云谲山重水复的一个世纪。我想看清我们两人的来路,看清我们前辈们的足迹。

我开始收集整理我们自己及两家人的各种史料——自传、书信、日记、照片、履历表、检讨书、认罪书、大字报、批判稿、外调证明、交代材料及各种相关人的回忆……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

我发现了很多从来不为人所知的历史碎片,由此渐渐拼接出一幅更为真实的历史画卷,有些是让人震惊的。

李虹的家族也给予了全力支持,将他们能收集到的所有材料都给了我,将所知道的往事都讲给我听,一些新发现的材料新的说法,是他们自己也闻所未闻的,其中就有一份关于李传书死亡的说明材料:



这份材料没有标题,没有抬头,也没有落款和写作时间。但从内容和笔迹看,是岳父写的无疑。写作时间,应该是在文革高潮时期,和我手头上岳父关于自己历史说明的一份材料的字体、用语与格式相似,李晓青说,1967—1969年间,经常有各种组织各种单位前来审查或外调,岳父写过很多这类的材料,时间、地点、事情经过、证明人,都是不可缺少的元素。

这薄薄的两张纸放在一个牛皮信封里,是几年前应我要求,彻底清理岳父遗物的时候无意间发现的。这份材料写在译电纸的反面,有些破损,但除了第二页有两三个字缺失外,不影响全文意思的完整。她说,应该是一份外调材料的草稿。全文内容如下:

“我和李传书于一九三二年同时参加红军。我分在第四方面军十师政治部任宣传干事。李传书分在第四方面军十一师师政治部任干事。

“一九三五年上半年,部队走到四川阿坝时,十师政委高厚竹告诉我:你四哥(李传书)在‘肃反’中有问题,在万县玉家坪捉起来后,不久枪杀了。还让我注意免受牵连。李传书被捕前任连连指导员,就因李传书是知识分子而被枪杀。

“(缺失字两至三个,疑是‘当年’二字)还有何

发生同志知道。(现任四机部副部长)这个情况。

“何发生同李传书在参军前,是万县师范读书的同班学生。李传书牺牲时,何和我同在十师。”

李晓青又说,长征途中,岳父李传常曾改名李长青,一直到去延安一段时间之后,才又改了回来,估计与李传书事件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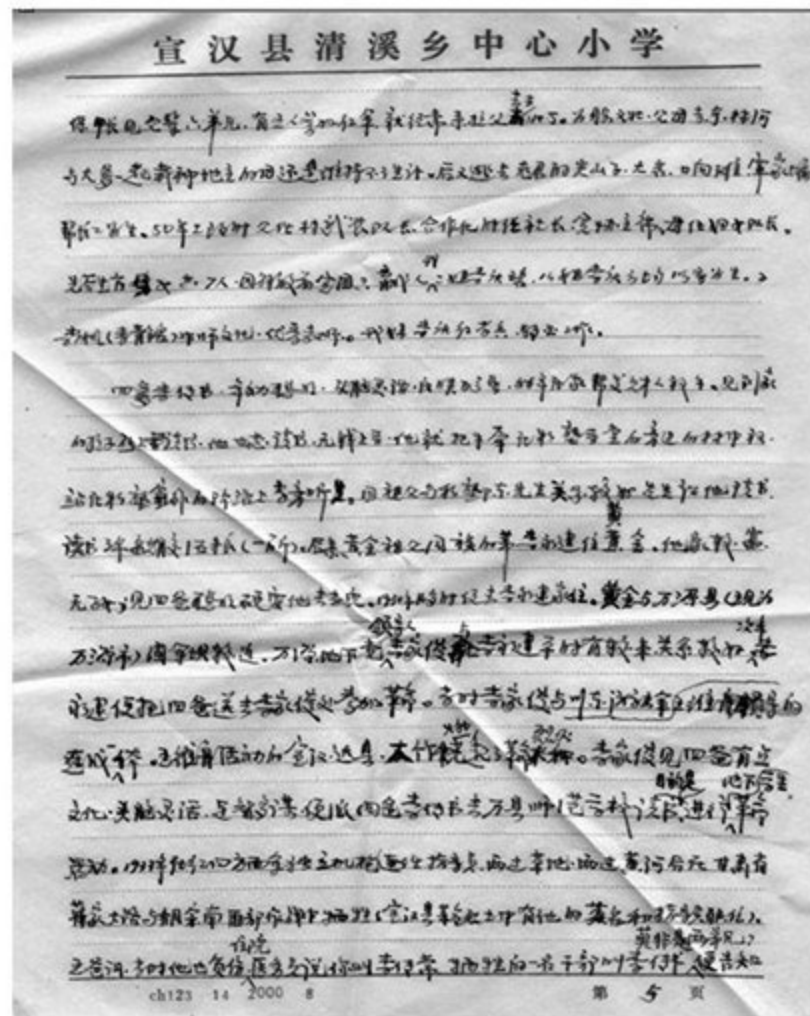
红军内部的“肃反”运动,一直是个讳莫如深甚至危险的话题,以至于岳父这样身经百战的老革命都小心翼翼地回避着它。

李传书自1935年遇难,到30多年后的60年代末期,因那一次极端运动,岳父才被迫第一次披露了真相。这份材料没有任何反馈。岳父也没有再提此事。在家族小圈子里,李传书依然是一个壮丽又浪漫的红色故事。直到40多年后无意间被发现。

李传书遇难时,21岁。他是李家兄弟中学历最高的一个。

关于李传书,老三李传岗的儿子李庆明这样写道:

“四爹李传书年幼聪明,头脑灵活,反应力强,幼年在家里帮发财人放牛,见别家的孩子能上学读书,他也想读书,无钱上学,他就把牛牵在私



李庆明关于李传书的记述

塾学堂的旁边的林中放,站在私塾室外石阶上当旁听生。因祖父与私塾陈先生关系较好,先生让他读书,读书三年,每期交1石粮(一百斤)。后来,黄金(地点)祖父同族的弟弟李永建住黄金,他家较富,无子女,见四爸聪明,硬要他去当儿子。1930年16岁时便去李永建家住。黄金与万源县(现为万源市)固军坝较近,万源地下党领导人李家俊与李永建平时有较来(交往)关系较好,次年李永建便把四爸送去李家俊处参加革命。当时李家俊与王维舟领导的川东游击队连成一体,王维舟活动的宣汉、达县、大竹燃起了革命的烈火。李家俊见四爸有点文化,头脑灵活,足智多谋,便派四爸李传书去万县师范学校读书,目的是进行地下学生革命活动。1933年在红四方面军独立机枪连任指导员,两过草地,两过黄河,后在甘肃省蒋家大路与胡宗南匪部作战中牺牲(宣汉县革命烈士中有他的英名和指导员职位)。五爸(李传常)讲,当时他也负伤住院,医务员说,你叫李传常,牺牲的一名干部叫李传书,莫非是两兄弟?便告知五爸说,李传书与你同模样,莫非是兄弟?五爸忍着伤痛,去见后确是他四兄,便抱着他哭。第二天便把四爸埋了,还立了块木碑。五爸又去痛哭,直到他的首长把他劝后才离开了四爸的坟墓。(五爸讲的)”。

关于李传书牺牲的地点,有几个版本:除了李庆明一说,还有前面李晓青说的“在过草地的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了”以及在离甘肃省蒋家大路300多公里之外的腊子口一役中战死。大约是岳父多年中在不同的场景里讲的。

李庆明生于1946年,是宣汉县清溪乡中心小学的一位乡村教师,现已退休,依然居住在祖辈故地。对于李家的家史家事,他是知道得最多的一个。在李庆明撰写的家史中,李家六兄弟都读过或长或短的私塾,这一点从岳父参加红军后历任的工作及他留下的战争年代的日记、书信、工作笔记可以得到证实。

关于李传书,李庆明还写道:“……土改时,为四爸的二百元抚恤金,二爹要去和李永建争,最后还是五爸(李传常)给二爹写信说:‘二兄,不要去争那点抚恤金了,我们一家人都在革命阵营里工作,将来有你们享受的了……’并在信上写了四爸牺牲的时间,地点。这信我都见过。所以

五爸按月给大爹,我妈,么爸寄钱和穿的,粮票用以资助老家的人过难关。他为革命、为国家忘了小家,参加革命离家几十年,只回家(一次)祭祀了祖父母,看望了老家的亲人。”

我注意到以上叙述中的三点,第一,李传书已经和比较富裕的李永建家有某种类似于过继的关系,不然李永建不可能伸张他对那笔在当时看来数额不小的抚恤金的占有权,而李传常也劝李家放弃。第二,在李传书的家乡,依然将他当作重要的革命烈士给予一次性高额抚恤,看来李传书之死的真相,地方政府并不知晓。第三,中共建政以来,李家从未对李传书之死提出调查、甄别并在此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恢复名誉平反昭雪的要求。而是让他以一个虚构的战死烈士之名,进入一个县级的革命烈士名册。这无疑是李传书的第二次悲剧。

岳父曾跟我谈起过许多的往事,从来没有提及他的这位四哥,也没有对他的任何子女亲属说起过李传书的死因。这其中该有多少难言之隐痛。

岳父1932年跟随红军离家,1969年第一次回乡省亲。1969年,岳父历尽无数批斗,写了如山的检讨,腰椎被打骨裂之后,终于熬到“解放”,重新进入“三结合”领导班子。劫后重生,万千感慨,决定回老家看看。那时,他父亲李永坤已去世17年,待他如父母的长兄长嫂也垂垂老矣,二哥李传梓和他两个尚未成亲的儿子已在1959年饿死。三哥李传岗1964年病故,余下亲人依然过得如他当年离家时一样苦寒。他和岳母有限的资助,无法改变家乡亲人的生活……临走时,他把三哥李传岗幼年失怙的小女儿带上,送去部队当兵了。那是岳父一次与故土及家乡亲人的诀别。

根据李庆明所写家史,李家兄弟六人,老大李传体一直在家务农。生有四子二女。二子李庆生当壮丁,据说1947年去台湾,现无音信。老二李传梓,1932年当红军,1935年随西路军过黄河时被打散,在外流落数年后返回老家,生有二子,长子李庆华1947年当壮丁,1948年被俘再当解放军,1950年入朝,立三等功,1954年复员返乡。父子三人均在1959年饿死,一门绝户。老三李传岗,1933年与妻杨氏一起当红军,1934年长征至甘孜,部队被打散,一路躲避一路颠沛,回家路上双双被国民党军队拉去当兵,后逃跑流落他乡数年后回到老家。老六李



李传常视若父母的长兄李传体夫妇(岳母何靖康摄于1969年)

传勇,用李庆明的文字来说:“么爸李传勇(李战雄)党员,从小读了两年私塾。1945年被国民党拉去

替二爹当壮丁,1947年解放(指被俘后参加解放军),1950年入朝,在朝鲜战场入党。在解放陕西扶风、清涧县的战斗中立过功,在朝鲜战场立大功(额头受伤,7天后才醒过来,额上存有鸡蛋大的一个坑),志愿军首长彭德怀亲自接见。见他作战勇敢,彭把他的名字改为李战雄了(县档案馆、人武部立功人员名单有李战雄和李庆华的光辉名字)。”

风雷激荡倒海翻江的20世纪,从国家到个人,从党派到家族,有多少荡气回肠生死沉浮的大故事,光是川东山乡这个李家,就是一部大书,可是在宏大的革命叙事中,终于被抹去了所有丰富色彩,变成了一段千篇一律的红色童话。半个多世纪以来,许多的老干体家史与传记,都成为真正的历史虚无主义样本。

今年刚好是李传书的百年诞辰。他早已尸骨无存,他的名字与遭际,也已无人提及。

谨以此文,纪念一个从革命史中消失的灵魂,并将此当作他的一座文字坟茔。■

(作者为武汉市文联文学院作家)

(责任编辑 黄 钟)

社科人文 文学小说 党建管理 经济管理 书画摄影

正规出书 约稿通知

书稿内容:(一)社科人文类书稿:回忆录、自传或人物传记、年鉴、社科著作等;(二)管理和学术类书稿:党建管理、行政管理、经济、金融或企业管理等研究专著;(三)文学类书稿:散文、诗歌、杂文、时评、游记、通讯等;(四)小说类书稿:历史、当代、言情、武侠、反腐等长篇、中短篇小说;(五)美术类:画册、书法作品集、摄影作品等。

书稿要求:书稿(作品)内容健康,艺术性强,底蕴丰厚,文笔流畅。字数为6万~8万字以上,个人专著、多人合集均可,公开发表或未公开发表均可。

出版发行办法:以丛书形式或独立书号形式出版,以畅销书或合作出版方式运作;达到畅销书要求的,签订标准出版合同,按版税或买断方式支付稿酬;根据作品和作者意愿,面向国内或海外公开发行。其中国内公开发行的,由专业权威出版社出版,国家标准书号,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备案查询。

全国免费投稿热线:400-680-8368

投稿邮箱:北京朝阳区八里庄东里3号654信箱

综合编辑部收;邮编:100025

电话:010-57733086、57192229、57733087、57192223

传真:010-89506878;在线投稿:bookbj@126.com

联系人:文馨、王双、舒婷、牛萍萍(编辑)

新书欣赏、订购,请登录:<http://www.bookhk.net>

北京东方朝阳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华源书阁

北京华源书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HuaYuanShuGeCultureCommunicationCo., Ltd.

全国免长话费咨询
4000050480

我是华源书阁,我来了,你在哪?

——为了“您”和书的邂逅!

千元出书 赠送交流
回忆自传 家谱族谱
单书套餐 免费发行
丛书套餐 全国代理

A类:丛书号出版优惠套餐最低11500元

B类:无书号出版用于交流赠送最低1000元

服务热线:010-56223866 56223877

公司邮箱:huayuanshugue@163.com

公司网址:(华源出版网) www.hychuban.com

公司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汤立路218号明天生活馆A座206室

《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读后

○ 李玉贞

关于李敦白的书

1993年李敦白先生出版了他的回忆录 *The Man Who Stayed Behind*, 作者严肃认真, 不讳饰, 不躲避, 坦诚勇敢, 直面历史。但该书的叙述仅限于在中国的35年。这个版本对于了解李敦白的一生太显单薄。于是徐秀丽决定给他做一部完整的口述史。《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就是这样出现的, 虽然主人公是一个人, 但两本书的内容很少重复。

该书与一般回忆录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徐女士对重要事件所做的注释, 字数不多, 画龙点睛, 从而增加了回忆录的可信度, 提高了书的史料价值, 特别是选取了当时报纸杂志上李敦白发表的文章, 置入书中给读者一个直观印象。况且李敦白先生的命运跌宕起伏, 他丰富的经历本身就是传奇。在中国生活的35年里, 近16年是在牢狱中度过的。但十分离奇的是他不仅是中共党员, 还一直在中国共产党高层工作, 在中美高层外交往来中有他的身影。对这些非凡的经历, 李敦白先生文中没有夸张渲染, 给人以响鼓不用重锤敲的印象, 形成凝练浓厚的历史感。

几点思考

如书名所示,《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是“见证中国重大历史变革的个人回忆”, 涉及20世纪中后期许多重大历史问题和人物, 无论什么感受都是李敦白先生个人的。看过本书后的确浮想联翩。作为一个读者, 只能循作者的感受来做自己的思考, 看他如何理解这段历史, 也可称作感受的感受。

1. 李敦白先生怀抱追求光明、正义、平等的美好理想来到中国。

他目睹美国社会的弊病, 种族歧视, 并不罕见的社会不公, 司法是“你有多少钱, 你就可以买多少公道, 你没有钱, 你就没有公道”。他感到这与他看的童话、故事大不一样。他不能接受“没有公道”的事实, 总要想找一个讲公道的地方, 他不能忍受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 产生了改变社会的冲动和愿望。讲到最早对共产党人的认识时, 他充满欣羡和景仰, 认为这些人从“细胞里”就是高尚的, 所以他参加了美国共产党。对于中国读者来说, 这样的经历也是相当熟悉的。这事实上是“人之初性本善”的反映。

后来他看到了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 对毛泽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是延安的宝塔吸引了他, 中国人民奋战日本侵略者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吸引了他。鉴于他的美国共产党员的身份, 对于中国共产党, 对于中国共产党师法的苏联和苏式共产主义, 他甚至有血缘的友好情结。他的外公是犹太人, 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员。李敦白在美国接受过几个月的培训, 和美国共产党人一起学习过斯大林“苏联的东西, 斯大林的东西”, “崇拜斯大林”。他说他们“了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斯大林宗教。我们也学联共(布)党史, 跟后来在中国一模一样”。对于苏联的党内斗争特别是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斗争, 他的好恶, 也是按照联共(布)党史的观点形成的: 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 当然是坏人。

这一切形成了他后来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基础。他到中国后, 到延安可以说是如鱼得水, 新奇之余, 感受到的一切都似曾相识。在美国从事劳工运动等的经历, 使他比较容易接受延安革命的氛围。他相信苏式共产主义, 相信中国共产党的道路, 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所以无论身陷囹圄关在铁窗内, 还是活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间, 他始终保持着对该党的真挚情感。

2. 对于苏俄十月革命。

作为读者, 自然而然会考虑李敦白和他的同

时代人到底憧憬的是什么。李敦白先生的书多次提到十月革命和他学习联共(布)党史的情况。书里的传统观点在中国可以说尽人皆知。列宁要通过革命暴力消灭资本主义。但他手里有的仅仅是贫苦人劫富济贫的义愤,他主张并实现的是改朝换代的革命暴力。十月革命就是这样摧毁了资产阶级所有制和资产阶级的文明,但是直到苏联解体,这条道路并没有在苏联创造出比资本主义“高许多倍”的劳动生产率,也没有建立起新的“文明”,相反,东正教深入人心,看看今天俄罗斯的宗教仪式,为游客们设计的“金环旅游路线”,人们不得不重新考虑宗教是毒害人们的鸦片这一论点,以及苏俄十月革命后的宗教政策。



毛泽东与李敦白在一起

笔者敬佩李敦白先生在美国从事工人运动的经历和勇气。那是他探索社会改造道路的尝试。如同中国近代历史上许多人一样,他们同样做着种种探索,如后来被共产国际称为国民党右派的张继,他年轻时和几个国家的志同道合者一起到了比利时德国交界处的一个山村,试图把自己从里到外进行一番改造,接近平民百姓,他们穿起农民的衣衫,自己耕作,自己养牛,挤奶,人人参加劳动,自己种菜,收获后挑起担子沿街叫卖。大家平均分配劳动果实。自己印制宣传品,向附近的农民做社会革命的动员工作。这里没有剥削。黄发垂髫都怡然自乐。宛如桃花源。到那个山村的初期大家还充满希望,但是他们不仅没有得到什么同情者,几个月下来,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孤岛般的村庄里连自己的生计也难以维持,张继深有感触地记述说,脱离开社会,不看整体的经济发展条件,在这里建设什么共产主义,纯粹是乌托邦,是空想。在中国若论最早实践共产主义的人,张继应该榜上有名。后来他积极投身第一次国共合作,希望两党携手打倒军阀统一中国。但是当苏联顾问们试图迫使孙中山带领国民党走十月革命道路实行一些激进措施的时候,张继坚决抵制,他不认为顾问们那一套是科学社会主义,说那是空想,因而被苏联顾问们称为国民党右派。

说到那一代政治活动家,应该承认,早期的

中国共产党人确有高尚的追求,他们有为国为民的抱负,陈独秀、李大钊等无不冒着风险向着自己憧憬的目标前进。他们对十月革命有各自的理解,就像李敦白一样。远远地看着红都莫斯科,听信那里美好的宣传,把理想投射在十月革命之中。这是一种追求,每人都有构筑理想的权利。然而,历史情况和苏联的经验说明,把理想和目标升华为政策,伴以强劲的宣传,拉着人们牺牲日常利益多做奉献、少拿工资,为了共产主义这个远大而美好的目标去奋斗,可以收一时甚至一段时间的效果,但那是不可持续的,一旦人们真正醒悟,局面将不可收拾。苏联解体的原因,人们尽可以仁智各见,但苏联没有在这条道路上达到那个理想中的目标,却是不争的事实。

3. 李敦白把自己界定为“一个中国的美国人”。

这个说法很贴切。在书中这一点十分耀眼:李敦白先生是美国名校北卡罗来纳大学的毕业生,受的是美国教育,但是在中国的岁月给他的生活特别是思维打上深深的烙印,某些元素甚至融入到他的血液中。打开李敦白的书,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他的“中国习性”和明显舶自苏联的“思维”,他把它称为“布尔什维克思维”。

这特别明显地表现于他的遣词造句。叙述家世时,他说“我的妈妈出生在一个进步家庭”。讲到外祖父,他使用的是“革命”,“我的外祖父是

俄国人,在俄国参加革命”。说到3个姨妈时,他同样以“进步”为其定性。依据是她们拥护列宁。之所以说这是舶自苏联的“思维”,乃是因为从十月革命后,苏联史学就把俄国革命模式称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宇宙真理。而这种“革命”的核心内容是阶级斗争,是没收有产者的狂风暴雨的群众运动。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中,那些出手凶狠的人往往就是与“反革命”斗争最“坚决”的“革命者”,最能“紧跟”党的政策的人。对于“阶级敌人”必须奉行“己所不欲,必施于人”。个人尊严、人性在政策中没有体现。苏联这种党化史学的影响极其深远,特别是在昔日社会主义阵营中。中国读者太熟悉这种以对苏态度划分进步与落后的做法了。1957年反右运动时划分右派的标准中就有一条是反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人们会思考,究竟应当以什么为标准来判断某一个党派或某一个群体是否进步,特别是在中国?

4.李敦白先生的确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

他表里如一。始终朝着他理想中的革命者的方向前进。这是难能可贵的。他把自己看到的和理解的无产阶级革命,用中国人熟悉的话说,融化在血液中,他是一个真正充满美好希望的理想主义者。李先生为人正直,生活节俭,工作认真,一直把中国的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始终不渝为之奋斗。他让他刚上小学的第三个孩子帮助他背熟了“老三篇”。这种执着是令人敬佩的。书中关于他同王玉琳女士的爱情描写,直白而坦诚,不仅反映他的思想情怀,而且让人感到他时时刻刻努力要构筑一个革命者的生活。请看他处理诸如爱情择偶这样个人事务的段落时如何表述对王玉琳女士的看法:

“我仔细想了想,除了喜欢她爽利直率带点泼辣的性格,她的正直无疑是吸引我的主要因素,我也喜欢她质朴清新的外表,我觉得她虽然不是特别漂亮,但很耐看,我以前只顾漂亮,吃了大亏,这次得改正这个毛病。而且,她是工人阶级出身,十几岁就入了党,根红苗正,有这样一个人在身边,有助于我政治上的正确。”

至于这个17岁才第一次吃水果的“工人阶级出身”的苦孩子,“根红苗正”的妻子如何“有助于”他“政治上的正确”,那是李敦白先生的体会,

但“正确”一词表达的是李敦白先生紧跟中国发展步伐的心愿,同样是他的美好追求。

5.除了“布尔什维克思维”,李敦白还有中国人的忍辱负重。

近16年的牢狱生活,没有动摇他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哪怕在铁窗里,他抱定的还是他的理想,还是他理想中的那个社会。

他到延安时,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已经结束,关于整风的情况,他是后来在新华社工作时听到和见到的,许多朋友和熟人“几乎都在整风运动中挨过整,有的神经衰弱,有的不再能够写作,只能改行摄影之类的工作,有的战战兢兢什么都怕”。但是,他第一次被捕入狱后,并没有放弃对毛泽东的信仰和敬佩,他描述自己的思想状况说,“但我不能埋怨党,那样的话我这个人就变了,就不是原来的我了。我也不能被整垮,那样的话离开这里之后就不能正常工作了。我也想到,把我搞错的事传出去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影响不好”。

“因为相信并熟悉了辩证唯物论的世界观,我才能够利用那个时间,认真学习,取经于像毛泽东的《论持久战》那样杰出无比的哲学著作,来研究毛泽东的哲学观点和方法,并努力运用于自己的情况。我还取经于毛泽东树立的加拿大白求恩大夫的光辉的国际主义形象。最后,我觉得自己并没有吃亏,而是有相当可贵的收获。”

李敦白1955年4月4日出狱,5月2日到广播事业局上班。1967年2月他被指定为电台三人领导小组的负责人,一时出尽风头,到处做报告,接受采访。他成了造反派,但是言多必失,他得罪了江青,他背上介绍王光美加入CIA等十分离奇的罪名,他又入狱了。他是中共党员,记述了在监狱里的遭遇,也许对他比对“中国人”客气些,但也免不了皮肉之苦,他“到现在还有严重的耳鸣”。

然而,在监狱里他时刻不离手的是“毛主席亲笔给我签名的那本《毛主席语录》”,“我对文革也没有怀疑,我的唯一信息来源是《人民日报》,我以为一切都很好。直到出狱之后,我才对这段历史有所认识。”

对于自己的经历和磨难,他的基本想法是“娘打孩子”。打孩子的娘充其量是辣妈,但娘终归是

娘,为了孩子好才动手打他。在这样的心态中,他“天天提醒自己,党审查我是正确的……我的感受是,我不能让中国共产党的声誉因为我而蒙受一丝一毫的损失”。对中共的情感跃然纸上。16年的铁窗依然没有使他割舍那个美好的梦和追求,他只相信自己相信的,他不改初衷和执着的追求,对中国美好未来的憧憬给了他力量。

李敦白先生的疏离感

然而,也正是这种憧憬引出了他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社会变化的疏离感。李敦白先生在书中写了他的思想变化,用了一个无可奈何的标题:“是回去的时候了”。显然,先后16年的牢狱生活,给他留下不愉快的烙印,这不言而喻。主要的是他没有在中国找到1945年他想象中的那个国家。他的回忆录描写了这种特殊的“失落”:

“从1945年来中国,到1980年回美国,中间整整隔了35年。多少岁月过去,多少人事变幻,我在中国有过贡献,受过迫害,出来了,解放了,应该可以安享晚年,而我在美国什么都没有。他乡已成故乡,故乡却早变他乡,怎么又动了归去的念头呢?这其中有几重原因。”

在他列举的原因中,首先是他对当时金钱至上的现实不能适应。他的孩子学习世界语,辅导老师向他收钱。可他过去辅导过多少人学习英文,从来是分文不收的。他把这种不习惯归结于“与社会隔离了10年,出狱之后,我没有多少变化,社会却已大变”,他甚至说他的“思想比较僵化”。这里再次透出他的追求完美,他的情操。他感到遗憾的“是这个社会显然染上了”他早年“深恶痛绝的病态”。回到美国后,他过的也是普通的市民生活,起初靠妻子教点中文和烹饪得到一点微薄收入维持生计。

固然,社会风气的某些不良变化,拜金主义、人情淡漠,均非人所愿。水至清则无鱼。拜金主义的出现有复杂的社会原因。这是社会发展和文明进化中难以避免的现象,特别在中国,李敦白先生说的社会变了,完全符合实情。

1945年李敦白先生到延安后,没有感到疏离,因为他经历的是充满革命气氛的激情燃烧的

岁月。所以他觉得与他在美国从联共(布)党史中学到的东西合拍。一切都似曾相识。

新中国是在毛泽东领导下打碎旧中国而建的,旧军队旧政府悉被打碎,1949—1977年继续打烂旧社会。旧经济制度、旧企业、旧市场、旧学校、旧知识、旧传统、旧风俗一律被当作封资修予以扫荡。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后,人们不愿意再像过去那样愚忠,要改变生活。人们在摸索,走什么道路才能按照普世的观念构筑自己的行为 and 思想。这是一个普遍的状况。过去为了未知的美好明天或某个远大目标牺牲了个人利益。但人们的合法权益在主义的“高尚理想”笼罩下受到侵犯,个人尊严受到凌辱,人们会以“娘打孩子”来自慰。中国教育的失败在于长期以来受苏联党化教育的影响,要人们甘做“革命的螺丝钉”,而不是先从道德入手,从做人学起。至于“革命”——这是一个大大的箩筐。任何人都可以革命的名义违法乱纪,文化大革命就是顶级的说明。目前的反腐也是最好的例证,许多落马的身居高位者当初都是靠“忠于党”上升的,他们口必称马列,道貌岸然,事实上荒淫无度,男盗女娼。让李敦白先生产生“疏离感”的,原本是长期积累的种种因素叠加产生的结果。令人欣慰的是,这仅仅是万千社会现象的一种,人间真情毕竟还是存在的。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是不会改变的。在这个意义上,李敦白先生大可不必自责“思想比较僵化”。

同样的理想投射,一个对中国友好的外国人群体

李敦白先生的思想状况很有代表性,这是一些对中国人民真诚友好并关切中国命运的人才有的情怀。这样的事例很多。1994年我和丈夫应邀去访问一个荷兰作家,并到他家住了一个月。他名叫Sal Santen,住在荷兰阿姆斯特丹。

Sal Santen当时已经80多岁。他是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荷兰人习惯叫他Henk Sneevliet)的女婿。马林在中国人所共知,他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参加了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和第三次代表大会,促成国共合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组建了马列卢阵线从事反法西斯斗

争,荷兰政府为纪念他,用他的姓氏命名了不止一条街道。Sal Santen也参加过反法西斯斗争,对中国极抱好感,但他没有到过中国。我们在他家住的那段时间,他表露了对中国的浓厚兴趣,特别是对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赞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赞颂我们认其为灾难的那动荡的、几乎把中国引向崩溃边缘的10年。他讲了不少荷兰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深有感触地说:“我们这里毛病太多,你看有多少穷人。像中国文化大革命一样,欧洲、亚洲也有‘占屋运动’,一些土地或房屋闲置,穷人就占了。有的依法退回,有的还受到制裁。”对于擅自占房占地这个规模不小的运动,我听说过,但没有研究,只看Sal Santen先生为这些受制裁的人不平,我产生了相当复杂的感情。

关于中国的改革,他同样感到遗憾,“邓小平不搞文化大革命了。可是毛泽东那些年代,中国已经离共产主义很近了,工人阶级去领导教育,知识分子到贫苦农民中去。富人的房子分给大家了,人人一样,没有剥削。可现在呢?有人太富有了。他们是新生的资产阶级。”诸如此类。他还讲了他本人到非洲同本贝拉一起进行革命的经历。

Sal Santen先生很真诚,他希望中国人民共同富裕,他同样把希望投射在中国,他从文化大革命中看到是“离共产主义很近”的美好前景。这种现象在国外并不罕见。

还有一位知名的研究马林的荷兰学者狄教授,他请我到他家去做客。那是低地国家荷兰来说十分难得的有阳光的下午。他的夫人很客气地请我坐在沙发上,但是一个可爱的猫咪冲我坐的沙发叫开了,狄夫人不好意思地说:“请你坐这边吧,那里阳光好,是猫咪的位置。”我当然要给这动物让位了。

1992年,我在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做题为“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影响”的报告时,狄教授是主持人。他以这样的身份在会上只客气地说了一点不同意见,与会者人多,也不可能展开讨论。此刻在他家品茗聊天,可以自如些,得以畅谈。

我在报告中表达过一个观点:共产国际把俄国经验向全世界推广,认为那是科学社会主义。俄国是世界资本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那里

更加容易建成共产主义。改良或非暴力都是不对的,不革命的。报告中我说过,无产阶级、被压迫群众固然生活困苦,应当改变他们的境遇,但是没收有产者财产,只凭借无产阶级建设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仅仅是乌托邦。他说他无论如何不能同意。

做客哪能讨论如此庞大的问题。我只笑笑夸奖他家的猫咪,并告诉他一个小小的故事,文化大革命时,我因家里养了猫咪而受到有“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狄教授十分诧异:“等等,你说什么,为什么?”

回到李敦白书中记述的那个外国专家群体,如埃德加·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等,他们也一样,怀抱美好的追求来到中国,在不同的年代著书向世界宣传他们的见闻和观感,特别是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对于外国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情况起了一定作用,他终生向世界宣传中国,叶剑英称他为“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他的一半骨灰埋在北京大学。斯特朗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到了中国,她的《千千万万的中国人》记载的是那个年代中后期被苏联史学按照其马列主义模式称之为“中国大革命”时期广州武汉等地工农运动的情况。爱泼斯坦(艾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甚至认为20年代的宋庆龄支持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殊不知,正是不同意苏式土地革命政策在中国的实行,宋庆龄才和许多国共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等酝酿建立非国民党非共产党的第三党。斯特朗安葬在北京,史沫特莱热爱中国,她的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的苍松翠柏间。

把自己的理想投射到中国,是这个群体共同的特点,在文化大革命中也一样,为了真正接近中国民众,这些外国专家渴望融入中国社会和中国的政治生活。李敦白记述了文革中阳早、史克、寒春、汤普金森(汤反帝)等人于1966年8月31日写的大字报,他们为自己及子女争取政治参与权,要求参加文化大革命,同时取消生活上的特权。他们担心自己会因在中国受到生活上优厚的待遇,脱离工农群众,而“革命意志衰退”,“变为修正主义”。表示愿意放弃“特权”。由此可见他们在按照自己理解中的革命加苏式共产主义安排自己的生活。这种自我“完善”的精神

是可贵的,因为是真诚的。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熟悉毛泽东的思想。富则修,穷则思变,这个“变”就是革命,它一度被当成红色度量衡,于是全国一片红,人们以穷为荣。衣着一律灰蓝色或军装绿,这就是无产阶级生活方式。

毛泽东对阳早、史克等人的大字报做了批示:“我同意这张大字报。外国革命专家及其孩子要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不许两样。凡自愿的,一律同样做。”关于这个情况,徐秀丽女士还介绍了何蜀的《“文革”中的外国专家造反派》一文。这些专家得到了参加世界现代史上少有的在中国延续10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利,他们是坚定的造反派。

然而,中国彻底否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些友好人士和我们一起走过满布荆棘的道路,和我们一起探索,相信他们也和我们一起思考。

冷静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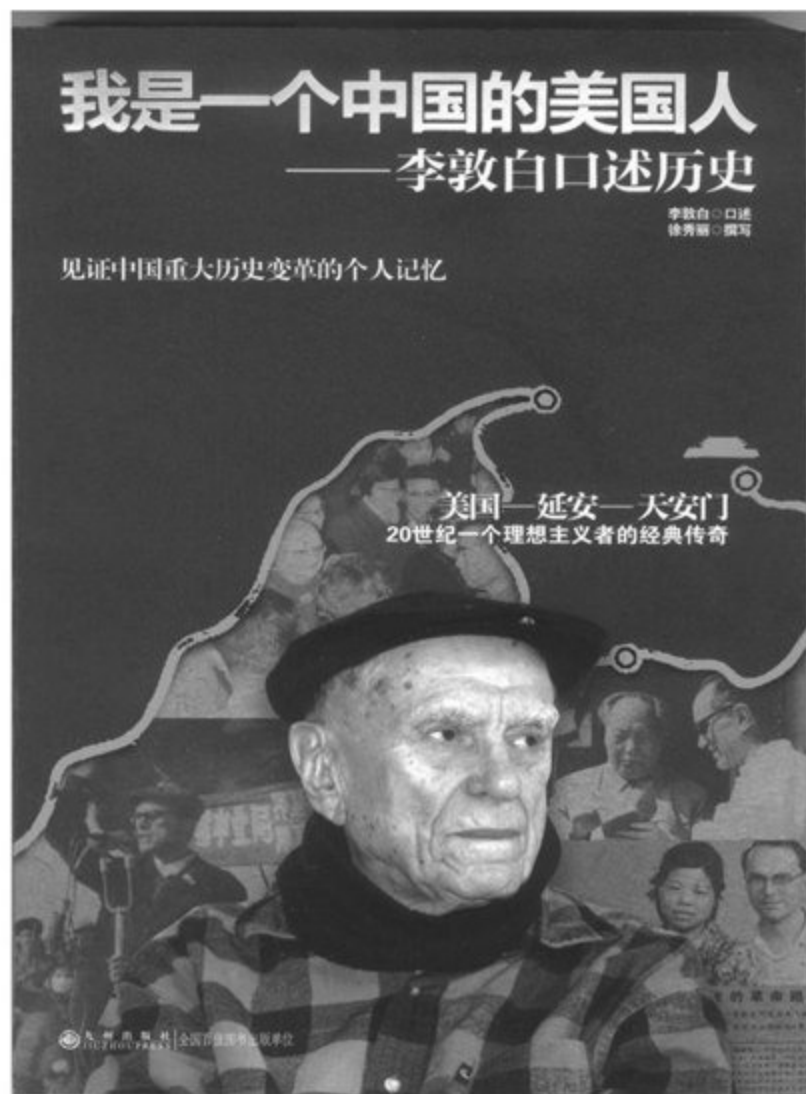
李敦白先生的书和他的经历有许多极有教益的内容。回顾那些风起云涌的年代,我们不得不思考今后的道路。

恩格斯在1886年2月就针对自己40多年前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说,那时他“还年轻,只有24岁,所以这本书就带有作者青年时代的烙印,反映着他青年时代的优点和缺点”。他坦承,那本书中写的内容和论点已经“成为过去”。书里有一个重要观点:“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阶级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在关系的狭小范围内解放出来的理论。”类似人们常说的,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也要解放全人类。他强调这个论点“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是绝对无益的”。1895年他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进一步否定了这条道路的实践性和可行性。他说19世纪中叶欧洲革命时,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写作时,“由于地方和民族的特点而分散的隔离的群众,他们只是由共同蒙受痛苦的感情联结起来,还不成熟,往往一筹莫展地摇摆于热情与绝望之间。”那时候,无产阶级队伍“还不够强大”,“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

的事情。”“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今天在一切实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在这里较仔细地加以研究的。”

无独有偶,1943年斯大林在共产国际解散时也说过,“无论马克思和列宁在世时的经验,还是今天的经验,都已经表明,不可能从一个国际中心去领导全世界的工人运动。”“当初建立共产国际时,我们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以为我们能够把全世界的运动领导起来。这是我们的错误。”(《俄共—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与共产国际1919—1943》第812页)

既然这样,如果说到坚持马克思主义,似乎必须先弄明白,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应予坚持的是什么?是否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之间能否画等号?能否把《共产党宣言》称为马克思、恩格斯的代表作?十月革命是马克思主义在苏俄的实施吗?等等艰深庞大的理论问题。且不说上述人等如何看待自己的学说,一



个简单的道理是,已经被中外历史证明是错误的东西,我们还要拿来坚持吗?例如以阶级斗争为纲。

至今记忆犹深的是毛泽东的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革命,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从毛泽东的革命经历,他的名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能够清晰地看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再现,甚至陈胜、吴广的影子。这些风云波涛诡异变幻中的弄潮儿,如恩格斯所说,由“共同蒙受痛苦的感情联结起来,还不成熟,往往一筹莫展地摇摆于热情与绝望之间”。历史证明,没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没有经济基础,单单凭热情是不可能达到共产主义的。况且在这个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下的实践,人际关系被异化,社会被撕裂,国家处于无休止的动荡中,有何发展可言。

一个留给历史的问题

李敦白的第一次被捕和关押(1949年2月—1955年4月),是一个涉及面很广的问题。由于某种原因,目前也不宜深究。但此案的国际背景很清楚:南斯拉夫铁托与斯大林的决裂,苏联担心其对于社会主义阵营控制力的减弱,斯大林也感到了毛泽东的“离心”倾向。早在1946年,斯特朗第五次访华,毛泽东会见她时,做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对世界产生不小的影响,在社会主义阵营名声鹊起。在斯大林眼睛里,斯特朗几乎成了中共的宣传员。斯大林很清楚,雅尔塔会议的结果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加上战后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做法不仅引起中国的不满,也加剧了美国苏联在该地区的角逐。一块坚实的铁幕垂落在中国东北,而斯特朗是这个时期国际上到过中国东北的著名记者。这一切都令斯大林不安。苏联于1949年2月(有说1月13日)以美国间谍罪名在苏联逮捕了斯特朗,关押在令人毛骨悚然的卢比扬卡监狱,6天后她被驱逐出苏联。

此事牵连到李敦白。这是历史遗留的一大悬案。之所以用“悬案”一词,是因为它真的蹊跷。他在中国被关押,而事情的起因并非中国,

却是苏联。据俄罗斯总统档案记载,1949年2月5日晚,苏共特使米高扬与毛泽东会谈,在座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和朱德,以及翻译师哲等人。这一天宾主讨论的是中共政策的现实问题。会谈最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等人从米高扬口中听到一个十分令人惊诧的事。

米高扬拿出他收到的莫斯科来电,说李敦白和马海德是美国情报机关的间谍。任弼时说,李敦白是经美国记者斯特朗介绍留在中国的。毛泽东说,从1936年起,另一个叫马海德的美国人也任中共中央驻地工作,马海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是经记者斯诺介绍到中共中央所在地来的。米高扬告诉毛泽东,美国人马海德也是美国情报机关的间谍。应该逮捕他。不久,李敦白就被逮捕了。斯特朗似乎成了三重身份的间谍:美国、中国、苏俄。

李敦白的罪名是什么?在监狱里,他被当成美国特务,要求他循着这个线索交代问题。药物产生的幻觉,使他几乎精神崩溃,但他没有找到自己的特务踪迹。他一直怀抱对中国的友好情怀。

斯特朗不仅对中国友好,对苏联也友好,对于世界上有革命风暴的地方她都十分感兴趣。她是一个热情家。当年她与从中国回苏联的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一起创办《莫斯科新闻》时,颇得苏联方面的支持,对于向世界宣传苏联的成就起了很大作用。她在苏联被捕是冤狱,赫鲁晓夫“解冻时期”已经为她平反并邀请她再访苏联。她在中国终老。

但受到她连累的李敦白被捕和关押,笔者没有见到文件。李先生回忆录中(第256页)记述了中国有关方面向他做出的口头道歉。目前见到的是针对李先生第二次在中国被关押的处理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文件中称,李敦白先生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诬陷为‘特务’,有‘现行反革命活动’”等均为不实之词,中国正式为其平反昭雪。

1949年的2月,中共正在准备掌握全国政权的时期,为了表示对苏联一边倒,奉莫斯科指示逮捕了李敦白。它留给人们的是沉重的思考。■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黄 钟)

普京时代对斯大林的评价

——以俄罗斯官学双方制定核准的文件为观察点

○ 马龙闪

普京的俄罗斯怎样评价斯大林,其实,这个问题一向是明确的,但由于我国思想界和学术界一些人,向来抱着计划经济和斯大林的情结不肯放弃,并把自己的愿望误当作现实,就将俄罗斯学界一小部分人,具体地说就是错把共产主义左翼一派的观点,当成了普京官方和整个俄罗斯学界的看法,所以,十数年来,我国学界这部分人关于俄罗斯存在“重新肯定”“重新评价”斯大林思潮的声音不绝于耳。2010年,在俄罗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5周年之际,时任总统梅德韦杰夫在纪念活动中有关斯大林的评价已说得十分清楚,但我国这部分人仍心存幻想,认为这是自由派总统梅德韦杰夫的看法,而不是现在俄罗斯真正权威者普京总统的看法。因此,在他们看来,普京的俄罗斯怎样评价斯大林,还有待观察。

好了,目前俄罗斯事态的发展进程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评价斯大林的新的最集中的观察点,这就是《俄罗斯历史统一教科书新教学法总体构思框架》大纲(以下简称《总构架大纲》)的产生。这是普京政府官方和俄罗斯学术界酝酿多年,联合协商、制定,最后核准的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可以充分准确地反映俄罗斯思想学术界多数和普京政府官方对斯大林的评价。

《总构架大纲》是俄官学双方制定核准的文件

普京一向对历史教育和历史教学十分重视。鉴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舆论界和学术界对苏联时期的历史,甚至对整个俄国的历史,产生了观点各异、众多混乱不一的看法;特别是对苏德战争提出的某些观点,造成俄罗斯民众和青年人的思想混乱,严重地影响到国家的爱国主义教育,不利于凝聚民心以进行现代化建设;同时,也

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俄罗斯的国家形象,普京早在第二任期就提出了重编历史教科书,实行“统一教育标准”的问题。普京认为,教育要有标准,需要的是对重大事件和重大问题认识的标准,在具体事件上可以有不同的看法,这里要求的并非“不是思维的标准化”,并不是用统一的标准对人的思想进行强制性的“梳理”和规范。[《普京文集(2002—2008)》,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年版,第473~495页]但是,这样做,行不行得通,这个界限怎样拿捏,在人们思想上多有质疑,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和争论。

为了达到上述目标,2007年6月21日,普京接见全俄人文及社科教师会议的代表,发表重要讲话。在讲话中,他进一步表述并强调了上述思想。但这时已是普京二任后期,没有来得及进一步抓下去,就无果而终了。

普京2012年5月再次上台,在同年12月的国情咨文中就提出了“上好历史课”的问题。普京说:“要复兴民族意识,我们必须将各个历史时期合为一体,要澄清一个最朴素的真理,俄罗斯历史既不始于1917年,更不始于1991年,我们有连贯一致的千年历史,只有依托这个历史,我们才能获得力量,理解国家发展的内涵。”[《普京文集(2012—2014)》,世界知识出版社、华东师大出版社2014年版,第263页]他还特别提到2012年是俄罗斯“历史年”,期待不久前恢复的俄罗斯历史协会和俄罗斯军事—历史学会为此展开积极的工作。

2013年2月19日,普京在一次会议上正式提出了编写历史统一教科书的问题。大家知道,苏联时期就曾有过统一的历史教科书用来统一人们的思想,所以,这个问题一提出,就在俄罗斯学界引起了激烈争论。2013年6月和7月,“瓦列达”和“全俄社会舆论调查中心”分别进行了民意调查,基本结果是,在社会公众中得到了较高的



斯大林在儿童中间(1936年在屠申诺飞机场拍摄)

民意支持度,在学界中多数人反对这种做法。

自普京提出编写俄罗斯历史统一教科书之后,俄教育部部长、文化部部长和总统办公厅主任,加上统一俄罗斯党主管部门,一齐响应,强势推动统一教科书的编写工作,并制定了编写工作的“路线图”。

2013年4月5日,俄罗斯历史协会理事会主席团决定,由该协会建立制订祖国史新教学法的工作小组,组长由国家杜马主席兼俄罗斯历史协会主席纳雷什金担任,副组长为教育部部长利瓦诺夫、文化部部长兼俄罗斯军事—历史学会主席梅金斯基;小组学术领导人是俄罗斯科学院通史研究所所长丘巴里扬院士。从这个阵容可见,该小组规格级别极高,其官方背景和权威性十分明显。

为了历史统一教科书问题,普京还专门同网民进行了一次对话。有网民担心,这会不会有重新回到极权主义的危险,普京回答:这个总体构想大纲,应有“我们的正式评价”,“没有正式的评价,就无法从根本上理解我们国家在过去一个世纪和过去几十年里所发生的事情”。他反复强调,“教科书对于我们国家的基本事实、主要的发

展阶段包括二战时期,应当有规范化的观点”,但对具体事件、具体问题可以有个人的看法;他认为,这不是“回到极权主义”。(张盛发《普京重任总统后再次治理俄罗斯历史教科书问题》,见《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3年第6期,第5~7页)

作为编写统一教科书的第一步,先要拟订一个俄罗斯历史教科书的总体构想框架大纲。经过史学界和教育界2013年一系列的工作,中间经过多次讨论、争论,以及网上征询意见、整合思想,最后经上述专门工作小组将《总构架大纲》起草完稿后,又经评审鉴定通过,在2013年10月30日召开的俄罗斯历史协会主席团扩大会议上,得到了核准。接着,普京又在2014年1月16日,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新历史教科书框架大纲的作者集体,也就是上述那个高规格工作小组班子的全体成员。

在这次接见中,普京指示,要在一年半到两年期间内,在这个总体构思框架基础上编写出俄罗斯历史的新统一教科书;在教科书问世之前这段时间内,从教学到各类考试,都要采取各种措施和办法,统一到这个《总构架大纲》的精神上来。(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见网址:src="//mc.yandex.ru/watch/20561137".)

那么,这个《总构架大纲》的精神是什么?从普京极力倡导、统一俄罗斯党和政府官员大力推动的情势看,它表达的是以普京为代表的俄罗斯社会政治中派对历史的“正式评价”,体现的是俄罗斯保守主义自由派的思想政治立场。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最关注的是,这个集中反映普京官方和俄罗斯学界主流观点的俄罗斯历史统一教科书《总构架大纲》,是怎样看待斯大林及其社会主义的,这与我国人民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评价,从而与我国进行的改革开放事业,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景,是有密切关系的。

《总构架大纲》对斯大林的评价

1. 斯大林与十月革命、国内战争

在我国,有位学者把斯大林比作华盛顿,称他为苏联的“开国领袖”,并由此制造了一种理论,可名曰“开国领袖崇拜论”。他认为,对斯大林、华盛顿这样的“开国领袖”树立“个人崇拜”,

是必须的,也是普遍的规律。且不说美国人是不是对华盛顿有“个人崇拜”,我们仅把问题集中于一点:斯大林是不是能同美国的华盛顿相提并论,可称为是苏联的“开国领袖”。

对这个原本并不复杂的问题,本来不需多费口舌,但由于过去《简明教程》造成的迷误和一些学者对苏联历史的无知,在此多谈几句,也并非多余。现在,《总构架大纲》回答了他们:否,斯大林无涉“开国领袖”之列。

《总构架大纲》是这样回答的:在涉及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的一章中,连斯大林的名字都没有出现过。

《总构架大纲》的结构是这样安排的: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国内战争,统统划归在一章之中,就是全书的第5章,题为“‘大震荡年代’的俄罗斯(1914—1921年)”。这里包括了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的全部历史。

按照《总构架大纲》的结构,每一章都包括这几个部分:总论;写作纲要(大事和问题);概念与术语;人物;年表。总论是阐述贯穿这一章的中心思想。写作纲要,实际大多就是章节的要目,包括要写的具体事件和问题。概念与术语以及所列人物,都是该章所写历史时段范围所应主要涉及的。

在1914—1921年这一时期,也就是包括俄国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这一阶段的俄罗斯历史中,在其所罗列的主要历史人物名单中,竟没有出现斯大林的名字。

在这个名单中,总共列出了22个人物,属于苏维埃革命阵营的11位,对立阵营的也是11位。所列苏俄革命阵营的党政军11位要人是:列宁、捷尔任斯基、斯维尔德洛夫、托洛茨基、图哈切夫斯基、布琼尼、伏龙芝、恰巴耶夫、柯托夫斯基、伏罗希洛夫、布留赫尔。但其中没有斯大林的名字。对此,应怎么解释,怎么解读?

其一,在从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到国内战争时期的这些重大事件中,斯大林参与其中的较少,他在政治、军事上的分量,随而决定他在政治地位上的重要性,与其中一些人相比,要逊色一些,因此,没有必要在此列出斯大林的名字。

其二,斯大林当时在党内所处地位的确不高,不仅在列宁、托洛茨基、斯维尔德洛夫之后,

而且也在加米涅夫和季诺维耶夫之后,在该名单中连加米涅夫和季诺维耶夫也没提到,当然,更没有必要提及斯大林。

其三,在夺取政权和战争年代,军人和将领有重要作用,党内人物参与其中的相对较少,因此,对党的领导人提及的比较少也是自然现象。过去在《保卫察里津》《列宁在十月》等电影里,显然对斯大林在内战中的作用是过分夸大了的;从这个名单里没列进斯大林姓氏,就是一个铁证,就是普京官方的“正式评价”。

其四,综合各方面分析,在十月革命和内战时期,斯大林在俄共(布)党内的真实地位应在第六七位左右,因此,这个名单中没有斯大林,是有道理的。

由此可见,过去的宣传,包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列宁在十月》等电影的描写,都大大夸大了斯大林在苏俄和苏联早期的地位。在十月革命和内战时期真正可与列宁并列,可称为“开国领袖”的是托洛茨基,而不是斯大林。

2. 斯大林与工业化、农业集体化

《总构架大纲》很少涉及党内斗争,因此对斯大林在党内斗争中的是非非,几乎未予涉及。但是对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大规模政治镇压”等,都是一一涉及了的,对这些方面的评价,可以透视出普京官方和学界对斯大林的“正式评价”。

《总构架大纲》在第6章“20—30年代的苏联社会”中,总论中有一段涉及这个问题时,是这样讲的:

20年代下半期和30年代,是作为一个超速工业化时期载入祖国历史的,工业化是以非常手段和多靠农村贫困破产实现的。工业化的代价极为高昂。30年代初同新经济政策时期相比,降低了居民的生活水平。优先发展重工业,导致国民经济失调。国家的悲剧,是强迫集体化,它伴随着对富农的镇压。粮食的困难状况,迫使政府1930—1935年间在城市实行票证供应制度。集体化和导致农村衰败的过度粮食收购,引起了1932—1933年的饥荒和疾病蔓延,据各种估计,这次灾荒总共夺去了300万~600万人的生命。

从这里可以看出,《总构架大纲》对农业集体化是完全否定的:“国家的悲剧,是强迫集体化”,它直接引起粮食困难、供应紧张和夺取300万~

600万人生命的大饥荒。应该说明,这个数字是最保守的估计,有的中学历史读本提供的数字,是在1000万~1500万人之间。

对工业化的评价,笔者以为,《总构架大纲》大体是正负面各半。它首先讲的是否定性的评价:“工业化是以非常手段和多靠农村贫困破产实现的。工业化的代价极为高昂。30年代初同新经济政策时期相比,降低了居民的生活水平。优先发展重工业,导致国民经济失调。”在做上述负面评价之后,仅从“现代化”的角度对工业化做了某些肯定:城市居民出现了明显增长,即城市化加快;工业飞速发展,出现了新的工业部门,有了汽车、拖拉机、化工、机床制造、发动机以及飞机制造等。同时,“用赶超的速度发展了军事工业,以及同军事相关的科学。以此奠定了1945年的胜利以及战后在宇宙和原子技术等方面成就的基础”。

同时,《总构架大纲》也指出了“苏联20—30年代的发展带有矛盾性”:“一方面,在加速工业现代化,实施城乡文化革命,发展教育和科学,有职业发展和职位晋升的机会(社会地位升降)。另一方面,取消了民主,多方寻找‘人民敌人’和大规模镇压。群众性镇压的高潮是在1937—1938年。”

3.对“斯大林社会主义”的评价

斯大林社会主义,其模式的主要构件,在经济方面就是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计划经济,鉴于《总构架大纲》对工业化、农业集体化的上述评价,再加上“斯大林社会主义”在政治体制方面的特征,自然就对这种社会主义做出了如下总体评价:

30年代在苏联建成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它的特点是,在管理体制上损害地区的高度中央集权,领袖独裁;用党的机关取代苏维埃的权力,优先用行政方法解决政治和经济任务;伴随着头两个五年计划出现的大型工业项目,也建成了强迫犯人劳动的古拉格绞肉机。

从这一行文表述来看,对“斯大林社会主义”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联系前面对苏联30年代现代化及其矛盾性的评述,再加上对造成了“国家的悲剧”的“强迫集体化”“代价极为高昂”的工业化,以及“优先发展重工业,导致国民经济失调”的计划经济,就大体构成了对“斯大林社会

主义”的基本评价:最多是倒四六开,恐怕到不了正负各半。

4. 斯大林与苏联伟大卫国战争

《总构架大纲》在《1941—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一章中,对斯大林的处理方式基本是采取回避的态度,尽量不提或少提。这从“人物名单”排列中可以看出掌握分寸和权重程度:这一章对历史人物,区分两个重量级别加以安排。斯大林自然在第一重量级别中;但对这个级别的人物,却是按姓的字母顺序排列的,斯大林的姓氏以俄文字母“С”开头,自然排列靠后。但其他章节中的人物,许多都是按重要性排列的,唯独对这一章做了这种处理。因此,从这种不无用意的人物排列中,可以看出在卫国战争问题上,普京官方对斯大林的态度和“正式评价”。

从该章“总论”的具体行文内容看,也正是与上述安排相适应的。这一章的中心思想,是贯穿俄罗斯爱国主义教育,用苏联军民的英雄主义鼓舞人心,把这场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看作是人民的胜利。将这场战争定性为全民的、“为生存”、“为捍卫国家”而战的神圣卫国战争。从没提过“为社会主义”“为斯大林”而战。

有关胜利的原因,《总构架大纲》是这样说的:“胜利的总的最主要因素,是爱国主义的高涨,前后方的团结一致,以及纳粹企图在苏联各民族间挑拨离间的毫无成效。”其中,特别强调了这一原因,“敌人的野蛮兽行、无人性行为”,激起了苏联人民奋起为生存而保卫祖国的斗志。但紧接着,说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话:“尽管他们许许多多的人在革命时期、集体化和大镇压时期都遭受过苏联制度的苦难。”这一句话,也就画龙点睛地、重重地把斯大林同卫国战争的关系“点”清楚了。

但也应注意到,由于这一章主要是关注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和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教育,所以,对苏芬战争付出的巨大代价,斯大林对德军突然进攻的缺乏准备,苏联初战的惨重失败和遭受的巨大损失,都没有一一提及;相反,一开战就讲德军的进犯和苏联军民的英雄主义。“总论”随后讲到苏联的军事动员能力,工业向东部地区的大规模疏散,以及改变坦克、飞机等军事装备落后于德国的局面,和战时外交的成功等,这在客观上也表明了苏联战时体制的有效性。这应该

说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斯大林不指名的肯定。但没有讲述人人皆知的战初的惨败、巨大损失等等,是否与此构成了功过的某种平衡,因此,到处都没有提及或很少提及斯大林的名字是否与这种考虑有关,尚有待研究。

5. 对“晚期斯大林主义”的评价

斯大林晚期,一般是指从战争胜利后,即1946—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

《总构架大纲》在“苏联体制的峰巅与危机(1945—1991年)”一章中,涵括了苏联后面一大半时间,46年,即60%以上时段的历史。这一章对“晚期斯大林主义”有着极大的关注。在这一章的“总论”中,出现了几个与斯大林名字有关的专用术语:“斯大林制度”“晚年斯大林主义”“非斯大林化”“斯大林罪行”“恢复斯大林主义”等。从执笔者使用这些术语的情况看,对斯大林及其思想、体制,是进行批判的。

这一章,专列“晚年斯大林主义(1945—1953年)”一节。认为虽然苏联整个处在全世界地缘政治、经济、技术和社会发展过程的轨道上,但“由于政治机制的保守主义,没能找到与之相适应的应对办法”。而随之而来的“非斯大林化时期”,即指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个人崇拜”进行批判的时期,则是在战后初期“延宕”“没有满足”人们期望的“结果”,“尤其,部分原因是没有实现人民对社会纲领和政治自由的期望”。这就是说,赫鲁晓夫时期的“解冻”和“非斯大林化”,是在1946—1953年的“战后初期”没有满足人们对改善物质生活和政治民主化改革的期望而造成的结果,因此,是带有因果关系和一定必然性的。

这里还指出:此后“揭露斯大林的罪过,取消劳动集中营体制,终止群众性的政治镇压,实现国家和党内生活的部分民主化,奠定了体制向制度‘柔性软化’方向的演化”。

在“晚期斯大林主义”一节中,《总构架大纲》还讲述了“1946—1947年的饥荒”,“斯大林及其周围的人,恢复垂直权力统治并强化行政命令体制”。同时,还包括以下内容:“法制的严酷,意识形态监督的强化,战后的镇压。‘列宁格勒案件’,同‘世界主义’的斗争,‘医生案件’,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件,李森科和李森科现象。”这些内容和对这些冤假错案的叙述,矛头无疑是指向

“斯大林主义”的。

在“1950年代中期至1960年代上半期的‘解冻’”一节中,《总构架大纲》讲述了赫鲁晓夫的一系列改革,从工业改革、教育体制改革,到行政体制和退休金制度改革等。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总构架大纲》讲道:该时期“延误了对计划指令经济体制的改革”“恢复斯大林主义”“经济停滞倾向的发展和意识形态危机”,以及“在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的大吹大擂的词句下,体制性危机发展成熟;而1985—1991年的改革政策,就是对这一危机的回答,随之苏联解体”。

这里,对历史事实的一连串叙述,字里行间贯穿着对斯大林个人及其体制的评价,实际上,对苏联解体的“体制性危机”因素,也做了合乎逻辑的解释。这样,苏联解体与斯大林体制、苏联模式的关系,也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斯大林奠定了苏联模式和斯大林体制的基础,赫鲁晓夫一连串改革没有成功,勃列日涅夫不仅“延误了改革”,还“恢复斯大林主义”,因此“体制性危机发展成熟”,戈尔巴乔夫针对这一“危机”进行改革,但积重难返,遭到失败,“随之苏联解体”。这就是《总构架大纲》不可置疑的历史逻辑。其实,这些年来,我国苏东史学界的主流,以《苏联真相》一书(陆南泉、黄宗良、郑异凡、马龙闪、左凤荣主编,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作者集体所代表的这个大多数,就一向是这样阐述苏联解体的原因和过程的,只有少数人,只有那些半官员半学者,另加一些对苏联历史一知半解的人,才持另一种被俄罗斯学界称作“阴谋论”的观点。我国苏东史学界关于苏联解体原因的主流派观点,现在已得到俄罗斯历史统一教科书《总构架大纲》的印证,应该说大体是正确的。

结 语

上面,我们既按历史时期,同时也按照主要问题,对《总构架大纲》与斯大林评价有关联的章节内容,做了扼要的介绍和解读。可以说,这基本上集中地、较为完整地勾勒出了普京官方与俄罗斯学界主流对斯大林及其社会主义评价的概貌,因为这是一个集中讲述俄罗斯(下转37页)

富田事变时刘敌给中央的信

○ 景玉川

1932年12月3日,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兼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奉总前委书记毛泽东之命,从总前委驻地宁都黄陂出发,带一连士兵前往吉安富田抓AB团。7日他们到达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即当时的江西省委,下称省行委)所在地富田,李指挥士兵迅速包围省行委和省苏维埃办公地王家祠堂,然后冲进祠堂,将正在开会的几位负责人捆绑,并满屋搜查。被捕的人中有省行委常委、赣西南特委书记段良弼,省行委秘书长李白芳,省行委军事部部长金万邦,省苏维埃财政部部长周冕,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倡……连同一般工作人员共120多人。李韶九亲自审讯这些被捕的人,不许对方辩解,只许承认自己是AB团,然后交代其他AB团成员的姓名。否则便施以“地雷公烧香火”、“点天灯”、烧阴户等酷刑。

由于严刑,8日凌晨,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倡被迫供出红二十军秘书长兼一七四团政委刘敌也是AB团。李韶九决定带一排人9日赶赴40里外红二十军驻地东固,捉拿刘敌及其他AB团分子。9日早饭后正要动身,遇蒋军飞机来轰炸,“为防犯人逃跑”,李韶九便将一批“不重要的AB团分子”40多人杀了,再押解谢汉倡前往东固。

一七四团政委刘敌率领独立营正在前线,11日接到军部要他立即返回的急信,还以为是打了胜仗要他去领取慰劳品和补充兵源。想不到一进军部,就被当作AB团要犯控制,李韶九亲自审讯他。刘与李是湖南同乡,且早相识,知道硬顶不是办法,于是改用长沙话与李攀谈,附和李韶九与军长刘铁超(3人都是湖南人),渐渐取得李的信任。李不仅不再说他是AB团,还要他好好干,示意将会倚重他,然后派人连夜送他回营。

侥幸脱险的刘敌回到驻地,独立营营长张兴和政委梁学貽见他平安归来,非常高兴。刘敌将这天的遭遇说了一遍,二人愤愤不平。第二天(12日)早饭后,刘召集张、梁二人商议,认定这次



1933年毛泽东在江西

李韶九来,是总前委的阴谋,是企图消灭江西党与部队的干部。3人商定请李韶九来讲话,趁机将他扣留。但血气方刚的张兴不等李韶九来便去军部质问,无异于自投罗网。刘敌闻张兴被扣,立即与梁学貽集合部队,迅速包围军部,释放了被捕的谢汉倡和张兴,抓了与李韶九合作的军长刘铁超,但跑了李韶九。

由于担心李韶九逃回富田杀害被捕的同志,刘敌率机枪连与独立营马不停蹄直奔富田,黄昏时赶到富田,包围省行委驻地王家祠堂,缴了李韶九带来的士兵的枪,释放了段良弼等被捕的同志。支持李韶九的曾山、古柏等趁夜逃脱,但误捕了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刘作抚)。

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有名的富田事变。

12日当晚,事变领导人连夜召开紧急会议,认定李韶九所为是毛泽东的指示,毛是“许克祥第二”。

为防止总前委派兵来,红军之间发生冲突,事变领导人决定红二十军西渡赣江,进驻永阳。

第二天一早,红二十军在王家祠堂前的广场(富田广场)上召开士兵大会。被捕同志在会上报告了事件经过,控诉李韶九的恶行,有人还脱下衣服展示身上的伤痕……整个会场群情激愤,人们喊出了“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

段良弼等释放了误捕的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并向其道歉;易批评他们未经中央表态提出“打倒毛泽东”的口号不对时,事变领导人接受了批评,还邀请易在会上做国际国内形势报告和传达前不久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精神。极富悲剧色彩的是:事变领导人积极执行党中央的路线,却不知这条路线的制定者李立三已经下台;当易尔士传达1930年9月召开的三中全会精神时,同样不知即将召开的四中全会(1931年1月初)会否定三中全会,王明以更“左”的面目把持中央……敌我阻隔,信息不畅,中央领导层频繁的斗争与更替,使远在江西的地方党与军队领导人,糊里糊涂成了路线斗争的牺牲品。

得知中央经费紧张,事变领导人决定将所有的200斤黄金由易尔士和段良弼送交中央。1931年1月5日,段良弼带着几十两黄金和近万字的报告《富田事变前后详情》前往上海,寻找党中央领导人汇报详情并献交黄金。刘敌则于1月11日在永阳给中央领导人写信,报告事情经过。

1988年,富田事变研究专家、江西省委党校副校长戴向青作为“富田事变复核小组”的成员,有机会接触中央档案馆提供的关于富田事变的原始材料,其中包括事变领导人刘敌和段良弼写给中央的信。他将信抄录下来。

由于事过80多年,当代读者可能对信中所说一些年代、事件、地名有点陌生,故笔者在括号中做简短说明或补充。

刘敌信全文如下(标题疑为中央档案馆添加):

赣西南富田事变

中共中央负责同志:

I 刘敌是在湖南马变(马日事变——

引者)秋暴(秋收暴动——引者)前加入党的,加入党以后没有一天脱离过工作和党,其中的斗争历史可以分作四小部分:

(一)十六年(1927年——引者)冬在醴陵南三区任区委书记,过着盲动主义的生活。

(二)十七年(1928年——引者)二月湘东工作整个塌台,敌走莲花。初任县委组织科长,次又担任书记。六月间白军进莲城,七月得病上井冈山调治。病愈又分配到遂川宁冈工作。三次会剿时,敌任宁三区区委书记。十八年(1929年——引者)二月“剿匪”军队撤退后,敌得县委(书记何长工同志——此系原文)之许可回湘东工作。此为边界工作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为盲动主义流毒过深,对六次代表大会所指出的资产阶级性革命非常怀疑,江汉波等同志认为敌之政治观念模糊亦此。

(三)因当时白色镇压非常严重,在湘东找不到组织乃由萍乡到袁州(今宜春——引者)才找到关系。十八年(1929年——引者)三月初被介绍到老二团的第一大队工作,直到(红)三军成立,敌任三支队政治委员。十九年(1930年——引者)七月(第)七次攻吉安,腿负重伤离家调治两月余。这是三年工作时期,在这一时期内经上级许多同志(刘峰云、江汉波等同志)的谈话,渐次才完全了解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六次代表大会的总结与精神。

(四)伤愈,赣西南特派敌到二十军工作,初任军委秘书长,九次攻吉(安)胜利后调一七四团政委,现任一七四团政委兼团委书记。

II 这次东固暴动(即富田事变——引者)的经过及其原因:

总前委决定一方面军一号在黄陂集中完毕,



王家祠堂当时是江西省行委(省委)与省苏维埃驻地,也是富田事变发生地,堂前广场即富田广场。



富田事变王家祠堂

二、三号出击,派刘敌带一七四团之第一营到兴国、泰和边界侦察地形,协助地方党做堵截蒋蔡东渡之工作。那时敌在兴国积极布置工作,每日有工作报告到军委(在东固,谢汉倡同志代书记),总不见一次回音。九号忽来信调敌回(是刘铁超借书记的名义),敌觉不解,以为是前方胜利调我带这一营到前方击敌。于是11号上午返抵东固,值开纪念广暴(1927年12月广州暴动——引者)群众大会,闻一七四团团部带三营前进了。敌即往见刘军长,一见刘面即与之谈部队的急需整理(发现连政委拐钱开小差),兴国党的危机,工作无基础,应如何挽救?并问他阶级决战情形如何还未打?又问曾炳春好了么?刘说好了许多。敌即不禁而作欣慰状。以上这些问题,那时问他的办法,他一点不回答,只说到AB团一样。并指出谢汉倡、金万邦、李白芳都是AB团,并说道:整个问题解决了,那些问题都是小事。那时敌便有点怀疑刘军长当时的态度与谈话,都失去了常态度。敌于是回营部吃饭,片刻军部传令兵叫我即随去到军部门口,见谢汉倡等均用麻绳套着在那里,李韶九在那里指手划足。(我)见他面时即招呼他,他不理会,自知一定有AB团乱咬了。我即走进军部,不一会李进来,先到内室与刘军长私谈了一会,然后靠近我身旁坐着,态度来得离奇。(他)开口问道:“刘敌,你很危险哪!”我即转头仰望着他说:“我有什么危险呢?”他说:“哼,很多人供了你咧。”我问:“供什么?”他说:“AB团哪。”我带着笑容仰对他说:“你看咧,我像不像一个AB团?”他说:“是呀,我也不信

哪,但是现在有人供你呀?”(我)又说:“你相不相信AB团有乱咬共产党员的阴谋?”他说:“那也不会,为什么单报你呢?”中间(我)还说了许多我的历史、现在的工作和思想。他说这都不足为凭。我自知对AB团惯用酷刑,乃用诚恳态度要求他说:“AB团要乱咬也是没有办法,只要求党放理智点去详细考察。死是不要紧,刑法是受不得的。”李装着

诚恳的样子说:“绝对不会,这决不是简单的AB团问题,完全是政治问题。只要承认错误接受教育,绝不是杀和打的问题。”当时军部的情况是酒肉火腿摆着(满)桌子,大喝大吃党素来认为观念不正确的。如胡灿等出入军长的内室,附耳低谈,鬼头鬼脑。李谈起怎样捆起丛允中同志,非常起劲、高兴,开口闭口都是总前委的代表,说起李文林同志等是AB团要犯,大家同又假作奇怪状,又非常喜欢,站在党的立场一点也没有痛惜的样子。尤其是李韶九说不是AB团问题,全是政治问题,更使我怀疑而肯定着里面一定有鬼。因我早知,李韶九是素来观念不正确、无产阶级意识很少的一个惯用卑鄙手腕制造纠纷(的人)。他又说起二全会议(指1930年8月召开的赣西南特委第二次全体会议——引者)是AB团的阴谋(我伤口愈时在延福参加北路代表会议,得知二全会议是接受中央指示,反对右倾转变农民意识与游击割据观念,注意建立城市工作……)。我曾听过中央批评毛是农民意识,毛主张割据五省,乡村包围城市……我对毛素来是不太信仰的,据所知道,如不肯杀袁、王,写给林彪信批斥中央,公开登在《红旗》上。中央八月一日来信宣布中国临时政府的主席是向忠发同志,而毛总是用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的名义——引者)出布告。尤其是打开吉安以后,会到各军素识的各级干部,都感觉非常不安,带着灰心的样子。觉得在共产党里面做工作还要学会溜勾子(溜须拍马——引者),真划不来。那时我也同情感觉到党的布尔什维克一天一天的削弱(这都是使

用政客手腕,造成个人系统的表现)。九次攻击(应为吉安——引者)以前,敌先会见毛,毛问了赣西南二次会议的内容,我据所听到的说了一点,毛即说:“平分土地攻打吉安是刘士奇同志的功劳。”我又问起李韶九的近况,毛说:“他任总政治部秘书长,李同志很有干材。”有了那些客观的原因(素来相信毛不能领导我们到底,李之素来卑鄙龌龊,刘军长之天天腐化,当时之情况和谈话),如是(我)有主观的肯定,认为一定不是AB团的问题,一定是毛泽东弄鬼,派李韶九来屠杀江西党的干部。

这样我肯定了他们已经远离了布尔什维克,如是站在党的立场,以诚相待,必是死路一条。乃转变态度离开立场(另有用意),改用长沙腔调说:“我是你老人家的老部下,我的政治水平非常低落,你老人家是完全知道的。现在幸喜你老人家来了,我只有尽量受政治教育,承认错误!我相信毛泽东同志总不是AB团,你老人家总不是AB团,军长总不是AB团。我总为你三位是追是随,我个人还有什么呢?”我这样来一着,他们对我的态度便不同了,便安慰我不要恐慌。因为他们又要审人了,要我到一小房子去坐,门口一条驳壳守着。听到李韶九审政治部政务科长尚子龙同志的地雷公(一种刑法——引者)打得呼天喊地,我便在房子里铺上睡着打主意。天黑了,忽有个连长耀武扬威的样子来叫我,我随去到军长室见谢汉倡同志(李说是谢汉倡供我,现在来对质)。我当时不高兴,向他说:“哼,谢汉倡同志,我与你有什么仇?你为什么要冤枉我呢?”谢对我笑着说:“同志,还有什么?我又是谁冤枉?”我知道刘铁超不满意我与曾(炳春)、谢接近,开会不附议他(刘)的意见,又批评过他违背军委决议案,老婆到军部。如是生定一计,将足暗踢刘一下,引他出来,(到)另一室谈话,专门顺着他说:什么他们江西封建的结合……谢汉倡很坏,曾炳春也要不得……等小话,并说明我是在军委,是没有办法,不得已,请军长原谅我苦衷,请求军长指示。如是他(刘)对我的态度,果其不同得多。我同他进军长室,又用足踢李一下子,眼睛朝他瞟一下子,李又随我出另到一间房子。那时我又横竖不要脸同他大排读(原抄件如此,大意就为恭维、讨好——引者)一番,专门讲小话。这样

一来,他完全相信了,就拿我那顶假AB团帽子一丢,往我背上一拍,握着我的手,貌合神离的样子说:“我原来相信你不会到这条路上去,定是他们谋害你的。你现在既然坦白的承认错误,我绝对不对你有何怀疑,只有站在党的正确指示之下坚决的干,拿出我撤调李湘航、要你到三支队当政治委员那时的精神来就对了。”那时我更坦白的肯定无疑是一种阴谋,如是想找点更明显与公开的材料。便道:“我是个脑筋迟钝的一个,环境的转变,我比人家接受得慢些(以六次代表大会决议作证),不过我知道了以后是有决心干的。现在请你先告诉我,现在政治形势转变是怎样干法?”他俩说:“你是聪明人,谁是AB团?谁与谁接近行动不对,一看便清楚。你晓得现在一七五团调得动、调不动还没有把握,一七二团肖大鹏靠得住靠不住你去想(想)看。只有你这个团要做二十军主力,你要努力些来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法将你这个团的AB团马上肃清。”

说了这一些,他派传令兵送我回营部。一到营部见张兴营长。那时党内一般干部都感觉得同志之生命毫无保证,非常恐怖。张兴同志说:“说这些人都是AB团,我硬不相信,恐怕他们自己不想革命来捣鬼。”

那时个人虽幸脱险,但为党的前途实在心痛不过。想起俄国之托洛斯基,想起蒋介石之中山舰事变,越想越俨然,再没有人来指示我。

十二日清晨即起,心里总难过。饭后即找张兴、梁学貽二同志到秘密处开紧急会议,首先报告这个事件,次之来个简单的分析,都同意是个阴谋(反布尔什维克的行动)。如是都站在布尔什维克的立场,挽救革命的危机。决定写信要李韶九来参加会,同时将他扣留,要他讲出阴谋。写信调齐(集)队伍(因为那时已派一七四团之三营去捕拿一七五团团政委……)放出被陷同志。散会后张兴同志恐(听)说李文林、曾炳春、王环……概被诬为AB团不确,故自去军部问一下。李、刘见他质问即行扣留。如是(我)马上集合队伍,经过群众路线,举行了更激烈的行动,即将军部包围,将刘铁超捆起,放出谢汉倡等同志(真的AB团如李佳中等乘机走出后又捉起了),当日下午即到富田救出一大批被陷同志。

东固暴动之经过概如上述。这一行动在组

织是绝不允许的,尤其阶级大战的关头,发生这一不幸更是痛心。但处在当时的环境,站在布尔什维克的立场援救被陷的同志,挽救党的危亡起见(更是无上级党指示),就毅然决然的来了这一着。刘敌始终站在布尔什维克的中央、省行(指1930年中共中央成立的中央行动委员会和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引者)正确指示下奋斗,誓死不移。这一行动之错误诚恳请中央给敌以严重的处罚。

致以

布尔什维克胜利万岁!

刘敌

1931年1月11日于永阳

段良弼走后,事变领导人一边等待上级党组织的表态与处理,一边继续领导军民与白军作战。

事变发生后,项英为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既指出了事变领导者的严重错误,又严肃批评了总前委的过火行为,认为应以解决党内矛盾的方法来处理这一事件。

然而,四中全会后的“左”倾中央局于1931年3月28日做出了《关系富田事变的决议》,将富田事变定性为: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全权处理富田事变”的中央代表团,从上海出发前往苏区。

4月17日,任弼时一行来到江西宁都苏区中央局所在地青塘村,传达了政治局决议,否定了项英的意见,并将他撤职,苏区中央代理书记一职由毛泽东接任。第二天,赣西南特委负责人和事变领导者遵照项英指示渡过赣江,前来参加会议、解决纠纷。他们不知道事情已发生突变,原定的党的会议被取消,他们一进青塘村即全体被捕,紧接着召开公审大会。会后,“罪魁祸首”刘敌被当即处决。其他事变领导人和省行委负责人也先后被处决。

4月19日,苏区中央局向在上海的党中央报告:“富田事变已被解决”。接着,红二十军番号被取消,副排长以上军官被处决。“左”倾领导人在全国各苏区掀起了大规模的肃反高潮,滥杀了成千上万对中国革命耿耿忠心的优秀儿女。

刘敌(?—1931.4),原名欧阳俊,湖南醴陵人。新中国成立后,刘敌仅有的妹妹,本为贫农,但因为刘敌是“反革命”,所以土改时被划为地

主,全家生活一直很惨。

邓小平1931年4月29日写给中央的《七军工作报告》中,也谈到富田事变:

这件事(指富田事变——引者)我们到赣南才知道。得到的事实是如此:过去总前委与省行委向来有冲突,如对军阀混战的分析,引敌深入的战术,开除刘士奇等问题。省行委常骂总前委是右倾,总前委常指省行委中有AB团的作用……此事发生后,一般同志特别是干部非常恐慌,人人自危以至不敢开口,特别不敢批评总前委……我对总前委之反AB团的方式亦觉有超越组织的错误,这种方法事实上引起了党的恐怖现象,同志不敢说话……(《党的文献》1989年第3期)

邓小平当年的论述较为客观与公正,也便于人们了解80多年前富田事变产生的时代背景与原因,以及对后来中国革命的影响。

文中所说的刘士奇当时为贺子珍妹妹贺怡的丈夫(后离婚),刘任赣西南特委书记时,被省行委开除。总前委书记毛泽东曾要求从轻处分刘士奇,但遭到省行委的拒绝。■

作者附记:戴向青、罗惠兰合著的《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出版后(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曾邀我合作将这一历史事件写成纪实文学。戴、罗二位老师还将他们所掌握的有关AB团的材料,连同由戴向青执笔起草的平反文件《关于富田事变的调查报告》(第一稿与第二稿),都给了我,包括戴抄录的刘敌与段良弼给中央的信。我曾提出要到事变发生地走一走,戴老师也答应了,但不久戴被诊断患有晚期胃癌,此书遂未成。

(责任编辑 黄 钟)

本刊启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及相关规定,结合本刊的实际情况,凡向本刊投稿,即视为作者将作品的数字化处理权、网络传播权、电子发行权、无线增值业务权授予本刊,同意本刊将以上权利转授予与本刊合作的第三方使用,稿件采用后即自动获得上述授权。本刊向作者支付的稿酬已包括上述使用方式的稿酬。如作者对上述处理有不同意见,请在来稿中声明,本刊将做适当处理。

炎黄春秋杂志社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

○ 陆南泉

总的来说,勃列日涅夫时期政治体制倒退,一步一步地向斯大林时期建立的后来逐步巩固与发展的高度集权体制回归,它对苏联社会的发展在很多方面产生了十分严重的后果,也是出现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一个基本原因。

“持不同政见者”是俄语中的外来语(Диссидент),意为“脱离国教的人”。有人认为,译为“异议者”更为确切。后来不论在苏联国内还是在西方,把各种对苏联制度各个方面提出不同看法的人一般称为“持不同政见者”。但苏联官方则称为“反社会分子”或“反社会主义分子”。从广义上讲,所谓“持不同政见者”,“是指不同意现行规则和制度的人;在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对于任何社会(包括苏联在内)所赖以生存的意识形态、政治、经济或道德基础都多少持有不同的见解。不仅如此,他们还公开表明自己的观点,并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将这些观点表达出来。换句话说,他们不光是私下对自己的妻子或挚友发发牢骚而已”。

在苏联从出现“持不同政见者”发展到“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是勃列日涅夫时期一个重要的特有的现象,它从一个重要侧面反映了这一时期由于政治体制倒退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在斯大林与赫鲁晓夫时期都存在“持不同政见者”,但都没有形成“持不同政见者运动”。

我们之所以说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已形成“持不同政见者运动”,这是因为:

一是在这个时期他们已从较为隐蔽的秘密活动转为公开的活动,活动的主要方式是集会与游行。

二是“持不同政见者”不论在形成的各种形式社会组织还是在人数方面都有了很大发展。据苏联克格勃的统计,1967年有502个被官方定的反苏组织,有2196名参加者;1968年分别有625个反苏组织与2870名参加者;1969年分别有733个反苏组织与3130个参加者;1970年分别有

709个反苏组织与3102名参加者。1967—1971年共出现了3096个被认为是“有政治危害性的团体”,参加这些团体的有13602人。从1967—1974年克格勃就发现了4408个地下秘密组织。

三是“持不同政见者”以各种方式自行出版的出版物大量增加,揭示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种种弊端,对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四是在“不同政见者”影响下,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夜间人”与“厨房政治”的现象日益普遍起来。这些人并没有公开加入“持不同政见者”行列,他们十分有兴趣地阅读各种地下刊物,“夜间人”表现为双重人格,他们白天上班所说的注意与官方保持一致,夜间回到家与家人或朋友在厨房谈的是另一套,抨击各种社会不公现象,交流听到的各种政治笑话与幽默,这种“夜间人”现象,明显地反映了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在知识分子圈子里出现了一种‘口是心非’的状况——内心不同意意识形态方针及其引起的生活方式,表面上却对现实认同或容忍,当时人们不得不采取说一套,想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的方式。”实际上,普遍存在的“夜间人”现象,已成为“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广泛的群众基础。

那么,缘何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形成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呢?

一、国内因素

首先,最为根本的或者说深层次的因素是,勃列日涅夫执政后实行向斯大林体制回归的政策。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社会又开始了“悄悄的重新斯大林主义化”。这是苏联著名政论家阿尔巴托夫回忆录中的一个提法,他指出:“我之所以把这个重新斯大林主义化的过程称之为悄悄的过程,就是因为它不是用一个正式的法令、一项专门的决定去推行的,它是渐渐地、一步一步

地把社会生活笼罩起来的,一个阵地一个阵地巩固起来的。那些想要回到斯大林主义的人,则是有意识地加以推动。”

应该说,重新斯大林主义化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并不是困难的事,因为:一是在赫鲁晓夫时期虽然捅了一下斯大林,特别是斯大林个人崇拜,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斯大林主义或斯大林时期形成与发展起来的体制。就是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做报告时,对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的问题是想得很肤浅的,可以说还根本没有触及制度性问题。二是植入苏联社会的斯大林主义,它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为了让它生根采取了各种手段,包括最极端的大规模的恐怖,从而使其在苏联根深蒂固。三是在斯大林时期,不只形成了以斯大林主义为基础的体制,还在这个体制下培养了适应和积极维护这个体制的领导干部。这些干部,同时又握有种种特权,他们离开了这个体制很难工作,会失去特权与利益。因此,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领导层中很多很多人仍然持旧的、斯大林主义观点。他们要在任何一个别的社会政治体制下为自己寻找一个位子即使说不是完全不可能,那也是很难的。这些当权者除了往下面贯彻‘上头’的意旨外,不会做任何其他事情。”在上述条件下,在苏联社会“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局面。只要最高领导一停止施加压力,使社会实现非斯大林主义化的种种努力,整个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设制几乎无须下达新的补充指示就会自动恢复原状,就像被按倒的不倒翁一样,只要手一松开,它马上便直立起来,或者像自行车一样,如果你不再用脚蹬,它就向一侧倒下去”。

勃列日涅夫在重新斯大林主义化方面,首先进行的步骤是恢复斯大林作为“伟大领袖”的名誉,最简单的办法是1965年利用纪念卫国战争胜利20周年庆典,提及以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斯大林为首的国防委员会。1970年在斯大林墓为他建立半身雕塑像。后来,利用撰写各种各样的有关二次大战的回忆录把斯大林重新抬出来。官方要求回忆录也好还是二战史也好,要符合当时的苏共路线、方针与政策的需要。这样,连十分重要的朱可夫回忆录中,也要把有损于斯大林形象的内容删去,如从书的原

稿中砍掉有关1937年斯大林对红军高级指挥人员实行镇压的一章。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捅了一下斯大林,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揭露了斯大林的很多错误乃至罪行,应该说这对推动苏联历史进步并为推行改革制造了有利的条件,但同样也应看到,斯大林时期留下的很多问题并没有解决,如当有不满时,“不同政见者”也就在反对斯大林高度集权模式的旗帜下展开了种种活动。

其次,平庸的勃列日涅夫不仅不反对个人崇拜,自己也搞起个人崇拜。随着勃列日涅夫个人权力的膨胀,个人崇拜也泛滥起来。勃列日涅夫在这方面采取的方法很多,如用编造历史来夸大其在战争中的作用,通过各种宣传工具,大肆宣扬其工作中的政绩,给自己颁发各种勋章奖章,军衔不断晋升,1975—1977年3年内,他由中将一跃而为苏联元帅。他拥有的勋章与奖章共达200多枚,死后在送葬行列中为他捧胸章与奖章的军官有44人之多。

如果翻开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苏联报纸杂



1970年5月,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生物遗传学家若列斯·麦德维杰夫因政治原因被苏联当局强行关进精神病院。就此事,若列斯·麦德维杰夫和孪生兄弟罗伊·麦德维杰夫出版了《谁是疯子?》一书。该书最后一章里写道,早在20年代,“扎米亚京在他的幻想小说《我们》里就描写过某种未来社会,在那个社会里所有持不同意见的人都自然地宣布为精神失常的人”。

志,对勃列日涅夫令人作呕的颂扬言论到处可见。1976年年底在为勃列日涅夫庆祝70诞辰时,掀起了颂扬的高潮,为此,《真理报》开辟了7天的专栏。而率先颂扬勃列日涅夫的是基里延科,他称勃列日涅夫为“我们党的领袖”,当时阿塞拜疆第一书记阿利耶夫称勃列日涅夫为“我们时代的伟大人物”。那些阿谀奉承、恭维勃列日涅夫的言论更多:“党和人民热爱您,列昂尼德·伊里奇。他们爱您,是由于您的仁慈和热忱,是由于您的智慧和列宁主义的无限忠诚。您的一生,您的智慧和天才赋予您获得并融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宝贵品质的能力,这些品质是我们这个时代伟大人物,我们党和我国各族人民的领袖的特殊品质。”吹捧的调子越来越高,如有人称勃列日涅夫是“真正列宁式的领导人”“党和国家的英明领袖”“英明的理论家”。

这里还要指出的是,组织人代为撰写的、以勃列日涅夫名义发表的几本小册子《小地》《复兴》《垦荒地》等,获列宁文学奖。其发行量之大也是惊人的,截至1981年年底,平均每两个苏联人就有一册。1978年11月12日《真理报》宣传说:苏联人在“读、重读、废寝忘食地研究勃列日涅夫的著作”,因为这是“无穷无尽的思想智慧和泉源”。还有些报刊吹捧这些著作是“党的巨大瑰宝”“政治才略的教科书”,是“令人爱不释手的诗篇”等。而这种做法所起的作用是极其恶劣的。阿尔巴托夫说,这像“全民演出了一出荒诞的戏”,人们“都并不信以为真。这大大加深了人们对政权的不信任感,加强了不关心政治和玩世不恭的消极风气,腐蚀了人们的思想和灵魂。从象征的意义上说,这个插曲犹如我国历史上我们为之付出了很大代价的这段可悲的时期树立了一块墓志铭。这是名副其实的停滞时期。其登峰造极之时我认为是1975—1982年”。苏联新闻媒体在报导1981年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六大做报告的情景时写道,在他报告的过程中,被74次掌声、40次长时间的掌声和8次暴风雨般的掌声所打断。

勃列日涅夫制造对他的个人崇拜的种种恶劣行为,不仅引起广大民众强烈不满,也是“持不同政见者”竭力反对苏联集权体制的一个重要因素。

最后,由于勃列日涅夫时期对文化意识形态实行专制主义的结果。强化对文化意识的监控,一个

重要办法是对社会科学与文艺作品进行严格的审查,不断地把不按党指示的报刊主编调离,任命与党保持“一致”的新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在出版领域特别严格控制这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一些被视为与党的方针政策不一致的作品,特别是被视为“持不同政见者”的作品,这是绝不许问世的;二是那些遵循苏共二十大路线批判斯大林的作品,同样经常遭到查禁与删改。

严密的审查制度,不放过任何一个在一般人看来无足轻重的作品。据当时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第二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回忆,1969年,斯塔夫罗波尔农学院哲学教研室萨德科夫出版了《人民团结和社会主义的矛盾》一书,从书名来看就与勃列日涅夫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强调的全面协调、和谐、统一等思想是不一致的。检查机关发现了,这时“莫斯科传来了信号:狠批。于是5月13日举行了边疆区党委会,讨论的问题是:关于斯塔夫罗波尔农学院哲学教研室副教授Ф.Б.萨德科夫书中的严重错误。我们可以说是把他批了个体无完肤。这的确是一个喋喋不休的批判会。我们的主要‘思想家’利霍塔要求将其开除出党……我的发言充满了火药味。萨德科夫受到严重警告,并宣布撤销其教研室主任的职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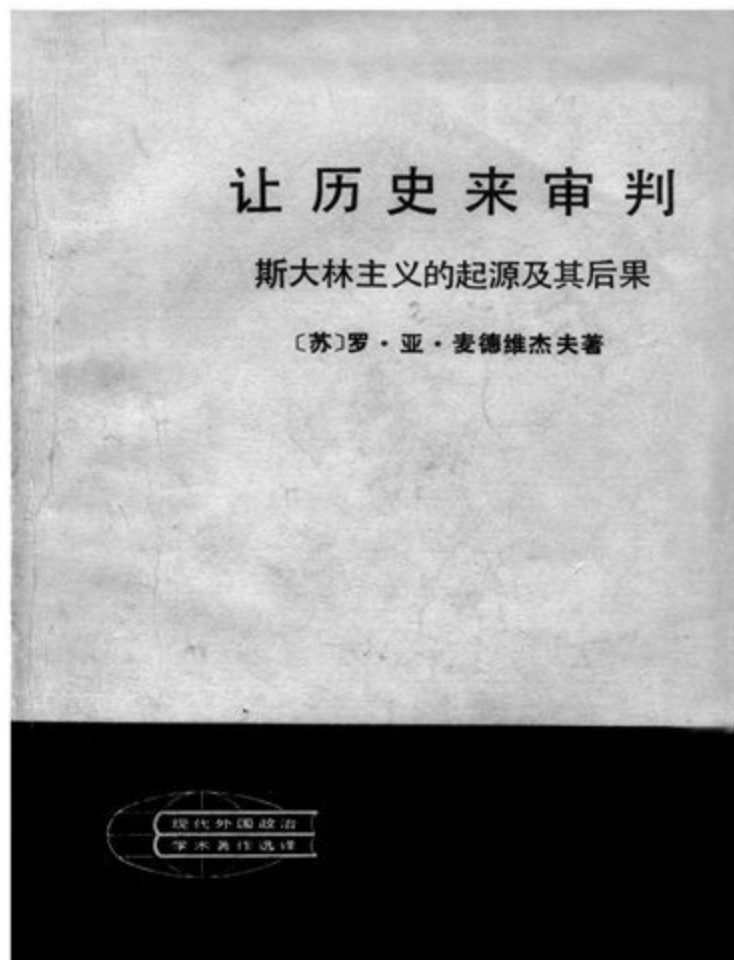
勃列日涅夫时期对文化意识形态严密控制反映在很多方面,如对一些重要报纸规定报道选题、报道重点,对要求发表的有关重要文章需向苏共中央宣传部请示报告,记者到国外采访与进行国际学术交流都要经过审批同意,报刊连改变纸型等亦要征得上级主管部门审批同意。勃列日涅夫作为苏联最高领导人十分关注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与《真理报》,这两个机构的领导人直接由他指挥。

勃列日涅夫时期为了对文化意识形态严密控制,增强了文化意识形态的管理机构。勃列日涅夫执政后不久于1966年5月,把赫鲁晓夫在1962年由联盟共和国宣传鼓动部,科学、高等教育与学校部和文化部三个部门合并为统一的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委员会撤销,又重新分成三个部:苏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科学与学校部,并把这三个部门的工作职能与管辖权划归苏共中央书记处。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苏共中央宣传部在控制文化意识形态方面所起的特殊重要作用。该部下设13个局:俄罗斯联邦局、加盟共和

国局、党务宣传局、群众性政治和文化教育工作局、报纸局、广播电视局、出版局、杂志局、出版物和印刷品发行局、体育文化和运动局、讲师团、专家咨询组与办公厅。十分明显,这13个局几乎监管了文化意识形态的全部领域。谈到严控文化意识形态的机构,不能不提及克格勃第五局。它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作用日益凸现。克格勃就其性质来讲是安全机关,但它在反对西方意识形态渗透与决定国内“持不同政见者”的命运等方面有其独特的作用。这期间,“秘密警察”机关作用加强了,鼓励大家告密,检查私人信件,偷听电话谈话多了起来。“苏共中央的高级负责人,甚至中央书记,在自己的办公室谈到尖锐的话题时,也常常看一看电话机,做出一种明显的手势——把手指按在嘴上,并转到另一个话题。”

可见,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像灭火队一样把赫鲁晓夫时期出现的某些“解冻”与活跃的气氛扑灭了,这引起了文艺界、理论界的强烈不满,为了争得言论、出版自由,不得不起斗争与反抗,斗争与反抗又遭到镇压,结果是矛盾进一步加剧,尽管在某个时候由于受到高压“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削弱了,但始终消灭不了,在某个时期还得到发展。我们可以从该运动发展的简要过程中看到这一点。

最早的起因是因两位作家(西尼亚夫斯基与达尼埃尔)先后在1959年与1961年在西方发表自己讽刺斯大林的文学作品。这两人于1965年9月遭逮捕,分别判处7年与5年的强迫劳动。此事发生后,1965年12月5日(苏联宪法日),几百名青年学生与知识界人士在普希金广场公开集会,集会者打出的标语是“请尊重苏联宪法”,“要求法院公开审判西尼亚夫斯基与达尼埃尔”。克格勃抓走20多人,40多名大学生被学校开除,这可视作“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开端。此后,每年的这一天,普希金广场差不多都有人要求保障实现苏联宪法所赋予的公民民主权利的集会。到60年代后期“持不同政见者”的各种组织纷纷出现,如1970年11月萨哈罗夫等三名著名物理学家成立了“人权委员会”。同时地下刊物大量出现,如《播种者》《时事纪事》与《政治日记》等广泛流传。1964年麦德维杰夫写成《让历史来审判》一书初稿,虽不允许公开出版,但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后来在西方出版。这是一部作者花了



罗·亚·麦德维杰夫是苏联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历史学家,红军老干部之子,1969年因在西方出版《让历史来审判》一书,被开除党籍。1989年恢复党籍,任苏联人民代表。1991年8月29日,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暂停苏共在苏联全境的活动”。代表中唯有他起身发言坚决反对“禁共令”。

10年时间在收集大量史料基础上深刻揭示斯大林主义起源及其后果的专著。1959年索尔仁尼琴完成了描写劳改营生活的小说《第一圈》和《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后一本书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的1962年被允许出版,引起了苏联社会的轰动。但在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对此书出版表示不能容忍,提出要追查出版此书的责任者,苏联开始批判索尔仁尼琴,他的作品后来在苏联不再允许出版了。

萨哈罗夫、麦德维杰夫与索尔仁尼琴,可称为“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三个代表人物。他们三人代表着三个不同的派别与思想。萨哈罗夫被认为是自由主义派,主张尊重法律与保护人权;麦德维杰夫被视为民主社会主义派,他的主要观点是认为,斯大林搞的那一套并非真正的社会主义,是国家资本主义,因此,他的著作主要是集中批判斯大林模式;索尔仁尼琴被称为新斯拉夫派,他是“集中营文学”的创始人。他对斯大林统治的残暴性进行深刻的揭露,但他崇敬十月

革命前的俄国,他反对西方式的民主政治,而主张建立俄国式的专制制度,而这种制度“不是建立在无穷无尽的‘阶级’仇恨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仁爱的基础上”。1970年10月8日,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在授予该年文学奖的颁奖词时说:“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具有全球性的艺术魅力,这种魅力来自他贯穿于许多伟大前驱作品中无可比拟的俄罗斯传统的继承。他和他的前辈作家各以不同的艺术形式象征地表达自己对俄罗斯苦难的沉思和对俄罗斯母亲的挚爱。”普遍认为,这一段话反映了索尔仁尼琴作品所要表达的核心思想,也是他本人的基本思想。他这次由于苏联政府的阻挠未能前往瑞典参加授奖典礼。

尽管以上“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三位代表人物其主张是有差异的,但有其共同点:反对在苏联建立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维护人权;尊重宪法,给人民言论与出版自由;主张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等等。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是爱俄罗斯这个祖国。

“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出现与发展,反映了广大民众对勃列日涅夫执政后出现的向斯大林体制回归政策与社会、经济、政治与外交等领域存在严重问题的强烈不满,这也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出现“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社会与群众基础。

二、国际因素

这里不能不提及1968年侵捷与1979年侵阿富汗对“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影响。1968年苏联出兵镇压捷克斯洛伐克,不仅扼杀了这个国家为摆脱斯大林模式的改革,亦使苏联的改革向后退缩,同时还导致苏联国内不少知识界人士对苏共与苏联政府的不满,引起了“持不同政见者”对侵捷事件的抗议活动,示威者高举着“不许沾手捷克斯洛伐克”“占领者可耻”等标语口号。俄罗斯学者认为侵捷是苏联的一次“政治道德失败”,对此,索尔仁尼琴指出,一个作家“应当对他的祖国或他的同胞所做的一切邪恶行径承担同样的责任,如果他祖国的坦克用鲜血淹没了一个外国首都的柏油马路,那么褐色的污点也就永远裹在作家的脸上”。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不少“持不同政见者”谴责与抗议苏联对别国的侵略行径,萨哈罗夫

表示:“如果对祖国的爱国主义反对了对人类的爱,那么他宁愿放弃爱国主义。”1980年7月,“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中的“女权运动”代表人物达吉扬娜·玛莫诺娃发动了反战签名运动。10月16日,7900名西方科学家为逮捕“持不同政见者”的苏联科学家,宣布中止同苏联的科学交流活动。

谈到苏联入侵阿富汗问题时,不能不看到它对苏联剧变所产生的影响。苏联在这场战争中最终的失败,不论苏联军队还是苏联这个国家的形象都是一落千丈,并且还对苏联国内经济发展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后果。截至1980年年底,苏军死于阿富汗战争中的官兵达11000余人,在这一战争期间每昼夜苏联平均的耗费为:1984年430万卢布,1985年720万卢布,1986年1000万卢布,1987年1470万卢布。苏联决定从1985年5月至1989年2月期间撤回驻阿富汗的100300名苏军,这一期间,由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决定的这场战争留给后人的沉重负担,亦成为促进苏联最后剧变的一个因素。

勃列日涅夫时期,对“持不同政见者”通常采取各种强硬的镇压办法,如逮捕、判刑、驱逐出境、流放、软禁、剥夺苏联国籍、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禁止出国、禁止接受外国记者采访等。1974年2月,苏联决定剥夺索尔仁尼琴的苏联国籍,并于2月13日将其押上飞机驱逐出境;1980年逮捕萨哈罗夫,将其从莫斯科驱逐到高尔基市,实行“准监禁”;麦德维杰夫多次被抄家,日常活动一直受到克格勃的监控,失去了自由,只是到了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的1985年5月才撤销了对他的监控;苏联政府对女权运动代表人物达吉扬娜·玛莫诺娃的处置提出两种方案:服无期徒刑或离开苏联。用这种威胁的办法迫使她离境。

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对“持不同政见者”除了采取上述镇压办法外,还有一个独特的做法,那就是把“持不同政见者”说成是精神病患者并关进疯人院。据苏联国内不完全统计,这类被关押过的“精神病人”,不会少于500人。这种把健康的自由思考的正常人关进疯人院的做法,是对民主、人权、自由的践踏,是一种极不人道的行为。■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责任编辑 黄 钟)

代购代邮

书 名

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	邓 野	38.00	7.00
任仲夷与广东改革开放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48.00	8.00
《亲历记》(一、二)	吴思主编	58.00	9.00
潜规则	吴 思	28.00	7.00
我们忏悔	王克明 宋小明	48.00	8.00
1978 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	于光远	36.00	7.00
牛棚杂忆	季羡林	38.00	7.00
邓小平与 1975 年的中国	张 化	39.00	7.00
一个戴灰帽子的人	邵燕祥	38.00	7.00
叶 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	美 周锡瑞	58.00	8.00
一片冰心在玉壶 叶笃庄回忆录	叶笃庄	68.00	8.00
“四人帮”兴亡(全四卷)	叶永烈	198.00	20.00
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	李敦白口述 徐秀丽撰写	38.00	7.00
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	张化 苏采青	98.00	10.00
君主立宪之殇——梁启超与他的自改革	解玺璋	38.00	7.00
独裁者手册 [美]布尔诺·德·梅斯奎塔 阿拉斯泰尔·史密斯著		42.00	7.00
民主德国的秘密读者——禁书的审查与传播	[德]齐格弗里德·洛卡斯特 英格里德·宗塔格 著	59.00	9.00
大元帅斯大林	[俄]弗拉基米尔·卡尔波夫	198.00	17.00
王明年谱	郭德宏	98.00	11.00
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	茅海建	68.00	9.00
古拉格群岛第一岛	伍宇星编译	39.80	7.00
苏联的最后一年	罗伊·麦德维杰夫	39.00	7.00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	吴庆彤	36.00	6.00
民国人物过眼录	杨奎松	58.00	9.00
改革都有红利吗	雪 珥	38.00	7.00
历史：何以至此	雷 颐	28.00	6.00
定西孤儿院纪事	杨显惠	25.00	7.00
庭院深深钓鱼台——我给江青当秘书	杨银禄	46.00	7.00
杨虎城与西安事变	杨 瀚	35.00	6.00
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 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	陈徒手	32.00	6.00
勃列日涅夫时代	[俄]列·姆列钦	56.00	9.00
政商中国：虞洽卿与他的时代	冯筱才	38.00	7.00
叛逆者——塑造美国自由制度的小人物们	[美]撒迪厄斯·拉塞尔	39.00	7.00
张发奎口述自传	张发奎口述 夏莲瑛访谈及记录	56.00	9.00
思痛录	韦君宜	35.00	7.00
陈独秀全传	唐宝林	128.00	11.00
斯大林的战争	杰弗里·罗伯茨	69.00	10.00
国史札记(人物篇)	林蕴晖	40.00	7.00
国史札记(事件篇)	林蕴晖	40.00	7.00
国史札记(史论篇)	林蕴晖	38.00	7.00
昨天的中国	袁伟时	42.00	7.00
我的朝鲜战争 一个志愿军战俘的自述	张泽石	23.50	6.00
1949 我不在清华园	张泽石	23.00	6.00
回忆与研究(上下)	李维汉	75.00	12.00
蒋介石的 1949：从下野到再起	刘维开	48.00	8.00
蒋介石与国共合战：1945-1949	蒋永敬 刘维开	48.00	8.00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戴 煌	49.00	8.00
难忘的非常岁月	陈瑞生	26.00	7.00
雾霄 俄罗斯百年忧患录(内部发行)[俄]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		280.00	12.00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上、中、下)	陶菊隐	148.00	18.00
共同的底线	秦 晖	48.00	8.00
古拉格：一部历史	[美]安妮·阿普尔鲍姆	78.00	9.00
邓小平时代	傅高义	88.00	12.00
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1956-1957 年的中国	沈志华	58.00	9.00
决战：毛泽东、蒋介石是如何看待三大战役的	金冲及	32.00	7.00
蒋介石：一个力行者的思想资源	陈铁健	48.00	8.00
超越左右激进主义——走出中国转型的困境	萧功秦	48.00	8.00
金正日与朝鲜	高秋福	36.00	6.00
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	托洛茨基著 施用勤译	58.00	8.00
敬畏民意：中国的民主治理与政治改革	俞可平	45.00	7.00
苏北利亚	于 疆	22.00	6.00
天下得失 蒋介石的人生	汪朝光等	42.00	6.00
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	杨奎松	48.00	8.00
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	萧冬连、谢春涛等著	88.00	10.00
读史求实	杨奎松	38.00	7.00
历史的碎片：侧击辛亥	张 鸣	26.00	7.00
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共四卷)	金冲及	128.00	12.00
绝密档案背后的传奇(全十册) 北京电视台卫视节目《档案》栏目组编		314.00	43.00
母亲杨沫	老 鬼	45.00	6.00
血色黄昏	老 鬼	39.00	6.00
血与铁	老 鬼	39.00	6.00
烈火中的青春：69 位兵团烈士寻访纪实	老 鬼	38.00	6.00
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	史景迁	19.60	6.00
李锐反左文选	李 锐	22.80	6.00
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	杨继绳	42.00	7.00
通往立宪之路	刘刚 李冬君	60.00	8.00
走向革命：细说晚清七十年	雷 颐	29.80	7.00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杨奎松	88.00	10.00
地狱门前——与李真刑前对话实录(内部发行)	乔云华	58.00	8.00
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		49.00	8.00
苏共亡党十年祭	黄苇町	26.00	7.00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 I	杨天石	60.00	8.00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 II	杨天石	38.00	6.00
“中间地带”的革命	杨奎松	54.00	9.00
1957 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	朱 正	26.00	7.00
走出个人崇拜	冯建辉	16.50	5.00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薄一波	88.00	11.00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	沈宝祥	39.80	8.00
夹边沟记事	杨显惠	34.00	7.00

作者或主编 定价 邮 费
www.gdzzw.com

图书介绍

《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那一场被称作“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运动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浩劫，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比沉重的灾难。从“开国领袖”到“个人崇拜”，从“集体迷狂”到“天下大乱”。本书将带你回到那段永远难以忘却的历史，去探寻那许许多多令你百思不得其解的答案：一批批党政要员的荣辱沉浮，一位位风云人物的人生百态，一个个知识群体的命运磨难……读这段历史，能使读者清晰地了解“文革”前十年曲折复杂的历史及其经验，真正弄懂“文革”发生的原因及其教训。这是一段中国社会主义走向的探索史，更是一段民族的命运史。

《邓小平与 1975 年的中国》：本书作者发掘了大量当年的文献资料，采访了许多当事人，深入论述了 1975 年邓小平领导和全面整顿的历史背景、指导思想、各领域的拨乱反正举措，以及整顿中邓小平等一批老干部同“四人帮”帮派势力的斗争。向人们揭示了 1975 年这一年中国出现剧烈动荡的深层原因。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北洋军阀，是中国近代一支特殊的军事政治力量，其深刻的社会根源是由中国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所决定。从战争、政变、暗杀、政争、学潮、工潮，什么事情都发生过。共和制、总统制、联邦制、君主立宪制、责任内阁制，样样都试过，17 年统治，13 位总统，46 届内阁，军阀混战，武夫治国，千年帝制难于转型。本书刻画出军阀与政客群体形象，揭露隐闻秘史，军头武夫里穿插着舞文弄墨的冷幽默，阴谋算计里隐藏着颠扑不破的人性冷暖，处处是活生生的历史和发人深思的话题。但它不是教科书上定义好的历史。

《昨天的中国》：本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近代中国的轨迹，回顾了晚清何以在立宪中走向灭亡，并分析了大国盛衰的五大枢机，在作者看来，一向被我们斥为晚清“假立宪”清末宪政，若用一个“假”字全盘否定清政府的立宪，未免过于简单。事实上，清政府的确为立宪做了不少准备，相反，最后导致清王朝的速灭，也与这场宪政有关。下篇则是对辛亥革命及革命后的一些独特思考，作者眼里的袁世凯，是近代中国少有的干才，若不是宋教仁被刺后，革命党人断然发起二次革命，中国极有可能走上宪政之路。袁伟时教授著述以思想深刻、见解独到著称，崇尚“说真话，说自己的话”、“历史在哪里扭曲，就要在哪里突破”。发人深省、给人启迪的观点读者从另一个角度更加深切的了解昨天的中国，从而更清楚明天将要走的路。苦难的过去，理应换来宽舒的未来。引颈以望，还要多长时间？

《勃列日涅夫时代》：曾为苏联党政军最高领导人的勃列日涅夫，在去世多年后人们对他的了解依然很少。一些人认为，勃列日涅夫是一个毫不中用的领导人，他把国家引向衰亡；另一些人则相信，其他任何一个人处于他的地位，都只会给国家带来更大的不幸，而他并不暴虐，信奉一条原则：你活，也要让别人活；第三类人认为，他比后来那些葬送了一个伟大国家的继承者要好得多。在他去世之后数年，苏联开始崩溃。究竟是勃列日涅夫时代导致了这种崩溃，还是继承者们滥用了他们所得到的东西？

本书作者曾任俄罗斯政治周刊《新时代》和《消息报》的副总编辑，与苏联及俄罗斯时代许多高层正要有着近距离接触和深层次关系，他查阅解禁档案、官员日记，进行私人采访，书中披露了大量新鲜真实的史料，给读者带来前苏联由“升平”到衰败的真相。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69 号

邮 编：100045 收款人：北京炎黄春秋杂志发行部
(注：邮购三本书以上，可按总书价的 10% 付邮费)
炎黄春秋 QQ 在线：2368298257

家族一棵树 人生一本书

个人文化 家族文化 姓氏文化

个人文化

编辑出版：三千元五十本起编印个人文集、自传、回忆录，画册、纪念册等。
协议创作：修改润色、残稿完篇，录音整理、采访写作，代修家谱、音像制作等。
编写培训：《怎样写自传》、《怎样编家史》、《怎样修家谱》教材邮购与培训。

家族文化

家史图表：家谱世系图、亲戚关系图、迁徙分布图、昭穆字辈谱、族规家训铭等。
传世家书：家族大事记、家族先贤传、家谱族谱、家史画册、家族音像等。
家族文化堂：家族标志牌+家族文化墙（祖宗像、谱系图、家训铭等）+家族文化柜。

姓氏文化

姓氏图书：姓氏文化手册（单姓）、百家姓实用填谱手册（单姓）。
文化挂图：炎帝谱系表、黄帝谱系表、中华姓氏树、姓氏始祖像等。
礼品用品：姓氏徽章、始祖铜像，姓氏竹简、紫砂壶，家训挂轴、文化衫等。

交流聚会

佳作陈列：民间个人史、家族史，个人日记、书信，家族文献、老照片等。
文献展览：反右、文革口述史；大字报、样板戏；上山下乡、评法批儒等。
交流聚会：老人出书沙龙、寻根修谱讲座、家族纪念会、宗亲联谊会等。



010-68920114、62525116

会馆：中关村海淀图书城25号“家谱传记楼”

单位：北京时代弄潮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网址：《个人出书网》www.grcsw.com 《家族文化网》www.jzwhw.net



愿人人都有作品传世

北京天禾佳诚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是国内一家从事图书合作出版的文化公司，公司成立以来与多家出版社建立了密切业务关系。

代理出版：

- 个人出书：诗歌、散文、小说、生平传记、学术著作等。
- 老人出书：回忆录、自传、诗词、散文、思想理论著作、书画图册等。
- 家庭出书：家庭照片画册、家史档案、家谱族谱、先辈遗文、家族音像等。
- 学生出书：优秀作文集、书画作品集、学生纪念集、孩子成长图册等。
- 学校出书：教学经验谈、教研论文集、名师纪念集、名校成就图册等。
- 博客出书：个人博客作品集、网络专题作品合集、社区网文合集等。
- 旧书翻印：旧书急用少量翻印、书刊资料整编重印等。
- 电子音像：音乐、戏曲、录像摄影、光盘复制、磁带复制等。

另有：合作出书 常规出书 宣传推广 合作教材 录入排版设计 著作/署名/挂名/编著

出书类型：

- A类：国内出版社出版，国家标准书号，可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备案查询。可在国内主渠道（新华书店等）发行销售。
- B类：无书号出版，用于交流与赠送，不进入书刊发行渠道，数量一般在300册以内。

基本价格：

- 1、大32开本：封面用250克铜版纸，赠送勒口，内文用70克蒙肯纸或胶板纸。200页印刷100本3000元，300页印刷100本4000元；排版、设计与增加彩页费用另行计算。
- 2、16开本：封面用250克铜版纸，赠送勒口，内文用70克蒙肯纸或胶板纸。200页印刷100本5000元，300页印刷100本6000元；排版、设计与增加彩页费用另行计算。

（注：A类型代理出版的书，1000册起印；所有书籍无论开本印量越大越便宜。）

服务流程：

作者来电说明书稿详情（如需要公司寄送参考样书）→公司报价→签约支付定金→电脑录入编排校对→报送出版社（如需正规出版）→出版社三审三校（如需正规出版）→邮寄样书→作者终审签字付款→回邮样书→印刷送书（附赠成书光盘）。

欢迎“组稿代理”与“项目合作”

目前，中国中产阶层不断发展壮大，传统文化精神逐步回归，民间文化、家族文化的搜集、整理与出版渐成热点；本公司大力开拓民间文化、家族文化的网络数字传播与纸质书代理出版业务。尤其自《学生出版网》、《老人出版网》、《人人出版网》、《出版发行网》开办以来，深受离退休老人与各地文联、作协、民间作者、学校老师和家长的欢迎，每年代理出版作品近百部；为方便作者就近洽谈与交稿，我公司设立“地方组稿代理”与“编辑出版分站”，请有写作经验与组稿能力的单位或个人洽谈合作。

出版热线：010-58426176 57223540 57273435

传 真：010-58608407 投稿邮箱：5805191@163.com

登录网址：人人出版网：www.rrchuban.com 自费出版网：www.51isbn.com

老人出版网：www.lrchuban.com 学校出版网：www.xxchuban.com

公司名称：北京天禾佳诚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邮编：102218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立汤路188号北方明珠大厦三号楼1509室

A类出版套餐优惠
(新华书店发行销售)

32开1000册23800元起

16开1000册27800元起

A类出版作品展示



B类出版作品展示



“2013中国邮政发行报刊百强排行榜”

炎黄春秋

进入全国期刊50强



中国邮政首次联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期刊协会、中国报业协会，评选出我国百强报刊
评定过程综合了报刊期发量和流转额两个关键指标，按照综合得分情况进行排名

全国公开发行人 各地邮局订阅

邮发代号 82-507

欢迎订阅 欢迎邮购

全年12期：120元

每期单价：10元

北京炎黄春秋杂志发行部
地址：北京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热线：010-68532048
邮政编码：100045

炎黄春秋QQ在线：2368298257
电子信箱：yhcqfxb01@126.com

马骞的检举信与七千人大会

《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读后

随卫毛主席江青

文革中我与枪的五种关系

www.gqzzw.com

计划经济时代的“黑孩”问题

普京时代对斯大林的评价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定价: 10.00 元